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雄师

第二野战军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引言：十年磨一剑 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五大野战军诞生。刘伯承、邓小平执掌第二野战军帅印。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方诸省。

刘伯承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列席）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返回部队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新的任命的。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夺取革命战争彻底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人熟一秋，稻熟一晌。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经过近30年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变化，到了1948年底和1949年初，各自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都在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交换着位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各自的相反方向急剧转化。

还在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之时，毛泽东就预测：

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仅仅在毛泽东说了上番话的两个月之后——1948年11月，形势的发展使他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两个月前自己对革命胜利时间作出的估计，他说：

我全军9、10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前后估计上虽然仅差两个月，但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整整提前了两年的时间。这个两年，使得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军事家都大惑不解，也让后来众多的历史学家难以研究明白。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尽早到来，中央军委在我军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统一全国解放军组织和番号的要求。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该规定把野战军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举世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偌大的北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100多万残存部队退守长江以南。扫平南中国，彻底打倒蒋家王朝已指日可待。这样，以地名命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因此，中央军委遂又明令全军，取消野战军用地区化分的办法，把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6个军。把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把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把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为邓子恢，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为政治部副主任，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为副参谋长。

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委把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未设野战军一级领导班子，下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共11个军。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

此次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第二野战军，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二九师从原来的万余人发展到30多万人，建立了广大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使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战火锻炼，这支部队更是被铸造得能征善战，成为一支无敌雄师。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至三万人的野战兵团。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四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旅），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

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称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称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称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另组 25 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 年 11 月 10 日，原定以第一纵队为基础另组 25 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但后来因形势发生变化，第一纵队在开往东北途中到晋察冀军区时，即留在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 月 11 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八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 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七纵队（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四纵队（不含第十一旅）去东北，组成第八纵队（辖由第十一旅改称的第二十二旅、新组建的第二十三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二十四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大岳军区。随后，第四纵队与第八纵队（不含第二十四旅）合并，称为第九纵队（仍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玺；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寻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洲率第五十五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十七师汇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为军长、汪峰为政治委员。

至 1946 年 6 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它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五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 27 万余人。

从 1945 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一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军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 6 月 27 日，以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后增加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 7 月 14 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东陇海、定陶、巨野和鄆城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四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至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一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并为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五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濮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从临濮集至张秋镇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五师），依次组成第八纵队（辖新组成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旅和第二十四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洲、汪锋之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胜利挺进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八纵队之第二十二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五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十、第

十二纵队和第五、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五、第二十八旅以及第三十八军之第十七、第五十五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的鄂豫军区（有五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三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八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三十八军军直和第四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六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三个军分区及第二十八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三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才干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十二旅、第十七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二十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四、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二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而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方面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战争双方指导者的主观因素。

在1948年底、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与人民解放军拥有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分不开的。刘伯承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日本人阿布秀山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徐奇的一个。”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或是研究历史人物时，为

了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当、具体的评价，往往喜欢采取比较的方法。

不论是中国的军事史学者或是西方的军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军事人物时，最喜欢把刘伯承、林彪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

林彪晚年有野心，阴谋不成乘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让世人唾弃，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所应具有突出地位。林彪与刘伯承一样，历经百战，战绩不菲，曾获有“常胜将军”之称。在红军时期，24岁成为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他则率一一五师。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声名传扬中外。解放战争中，他主掌东北野战军帅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指挥打了一个半多。血战四千街，举世瞩目，全歼廖耀湘，战史称绝。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这些当年他在黄埔的师兄，国民党内有名的战将，被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林彪打仗，大处如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礴；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入扣。林彪指挥的许多战斗，成为了我军军事史上的作战范例。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林彪都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刘伯承与林彪，谁更胜一筹呢？

刘伯承，出身于贫寒之家，崛起于乱世之中。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早在讨袁战争中，就以勇谋双备、用兵神奇声名隆于川军诸将。北伐时，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之重任，雄视一方。南昌起义，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共谋义举。红军时期，他执掌红军军校校长之职，为共产党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将官，并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抗战中，率一二九师，兵新孙武，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岩歼敌，奇招叠出，屡战屡胜，声震敌胆。解放战争中，上党、邯郸、陇海、定陶之战，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率20万之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孤军深入敌人腹地、重围之中，游刃有余，更显出大将风范。淮海大决战，千军万马，风云变幻，刘伯承置全局于掌心，察萍风于独目，大开大合，阵地战、伏击战、攻坚战、运动战，运兵如指，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纵观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的全过程来看，刘伯承更有自己的许多不同之处。

一位日本军事史的研究专家因此写道：

刘伯承、林彪无疑都是战争奇才，两人都有将帅的大气与雄才，然而，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看，还是从战术史上的价值看，刘伯承都胜过林彪。林彪的杰出，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9年短短几年中，而刘伯承却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位置。研究1946年以前的中国战争，除偶尔需涉及林彪外，大多可以不提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却不可以忽略刘伯承。更重要的是，林彪的胜利，常常有优厚的外部条件，起码，他的部队所拥有的条件比刘伯承部队的条件好一些。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取胜的。他在东北一展宏才，也有三个刘伯承孤军挺进中原时没有优势。一是装备，日本人和苏联人都留给他不少先进的现代武器，使他的部队装备上明显优于同时的其他野战军。二是地利，他一进东北，便有现成的地盘和久战于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持，而且始终有北满作为后方。三是东北偏于边关，蒋介石军队装备的补充，兵力的支援都比较困难。而刘伯承一生之战中，一直处于劣势逆境，打苦战、

打险战，常靠智谋和细致才能取胜。他率兵深入中原，外是国民党重兵重围，内无粮草弹药的补给，无后方，无后援、无友军配合，而且北方士兵不惯于南方山地，军队数量装备明显劣于敌军，他却进退不乱方寸，攻守均有条理，很快打开中原局面，改变了全国战场的格局。刘伯承指挥的很多战役，都是战术史上价值非凡的典范战例。因此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比林彪才能更全面、而且更富于创造性。

刘伯承回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之后，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接着又主持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任命了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成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为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为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范朝利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参谋长，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由曾绍山担任，鲍先志任政治委员，郑国仲任副军长，钟汉华任副政治委员，杨国宇任参谋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赵炳润为后勤部部长，杨世荣为后勤部政委。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由周希汉担任，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陈唐任副军长，廖冠贤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军长由李成芳担任，政治委员雷荣天，王启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朱佩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军军长由秦基伟担任，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余洪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为政治部主任，潘焱为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吴机章为后勤部长。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第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担任，王辉球任政治委员，戴润生任副政治委员，杨俊生任参谋长，吴实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军长由王秉璋担任，赵健民任政治委员，萧元礼任副政治委员，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军长由张国华担任，谭冠三任政治委员，昌炳桂任副军长，王幼平任副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战车队，一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孔从洲任副司令员，徐立行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 28 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 1500 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雄师：第二野战军

一、旌旗指江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其三，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

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

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

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

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

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和3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

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 11 月 15 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 60 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 月 8 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 80 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 60 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任务。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 10 月 31 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

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于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 midpoint 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

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 20 岁的姑娘——“胖子”梁良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 10 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 年 3 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端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 3 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4 月 8 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高原地区

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浪！”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

“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

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几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

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二、残照全陵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凤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放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淡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

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

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国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属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国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

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

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

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还有64名投进监狱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月30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

“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

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烦……”

“怕个屁，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决不宽恕！”

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一定按时到会。”

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嘈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

“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查办，老朽绝无怨言。”

“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

杜月笙的话象在平静地湖水里投进一个石子，立即引起一阵波浪。静寂的会场立时又嘈杂起来，巨商们无不为了杜月笙将了蒋经国一军感到快意。

“这条老狗！”蒋经国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不甘示弱地朝会场挥挥手，神情激昂地大声说道：“杜老伯为国不徇私情，精神可嘉，经国钦佩之至。在这里，经国再次告诉杜老伯和到会的各位父老。本特派员衔命来沪的当天就曾告示上海世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只要是祸国殃民的败类，不管是何等人士，我照打不误！”

会场又是一阵噪动，这是对蒋经国的赞扬之声。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名下的一家公司，宋美龄也参与了经营。由于有这种特殊的背景，该公司搞不法黑生意无法无天，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在上海享有盛名。宋美龄利用扬子公司发了多大的财，扬子公司利臣宋美龄的权势做了多少不法的黑生意，恐怕连蒋介石也全然不知。蒋经国到上海虽然“打虎”之声不绝于耳，但孔令侃置若罔闻，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陶启明本来是孔祥熙安插在财政部的亲信，枪毙了陶启明，也并没有吓唬住孔家父子，黑市生意照做不误，对于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蒋经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碍于牵涉到来美龄，苦于下不了决心打这只“虎中之王”。

抓了杜维屏，虽然激动了一下人心，然而却让杜月笙这只老狐狸将了一军，使得蒋经国骑虎难下，进退为难。最后只得把杜维屏交给法院处理。法院左审右审，找不出杜维屏更大的罪行，只判了他八个月徒刑。就这杜维屏也高喊不服，雇佣了多个律师进行上诉，后又改判为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处理杜维屏，本想震住其他奸商巨贾，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太子的风头大挫。

市场更加动荡，抢购风潮不落，有人开始传言太子打虎已经失败。

曾经在赣南颇有政声的蒋经国，陷入苦恼，也被逼进了死角。现在放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鸣金收兵，回师南京；二是务必打住“大老虎”，以再显决心。作为胸怀抱负、年轻好胜的蒋经国，选择后者才是他的性格。因此，蒋经国前后思量，还是把他的尚方宝剑，最终指向了扬子公司。

蒋经国主意一定，一声令下，亲率打虎队浩浩荡荡直扑薄石路扬子公司的仓库而来。

打虎队员撞开仓库的铁门，一拥而入。

库房里的物资堆积如山，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还有粮食、汽油、无缝钢管等等，都是市场紧缺的物资。据报，扬子公司的仓库还不只一处。

此时，孔令侃也乘坐崭新的雪铁龙轿车赶到了仓库，是蒋经国打电话通知他来的。

蒋经国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又看看若无其事的小白脸孔令侃，脸色气得铁青，指着孔令侃向打虎队员大声吼道：“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虎队员一拥而上，把孔令侃从汽车里拖了出来，一副亮铮铮的手铐扣在了他的手上。

到这时，孔令侃的脸色才白得不正常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表哥，表哥！”

蒋经国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手一挥说：“带走！”

孔令侃被抓，首先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深知这位大太子的秉性，手里此时又握着尚方宝剑，为了蒋家的天下，不惜牺牲至亲的头颅，这种事小蒋是做得出来的。

宋美龄得到消息，匆匆打点行装，又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说上海发生了一桩特大乱子，非她亲自去处理不可，然后，就飞往了上海。

宋美龄飞抵上海，蒋经国自知为何而来，但在宋美龄开口之前，却故作不知，满脸堆笑，一直热情招待。

“经国，”宋美龄实在忍不住了，来到蒋经国办公室不足10分钟，开口说道：“我是为令侃的事而来，这孩子从小娇惯坏了，办事没个尺寸，你做

的是对的，但念他年纪尚轻，就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夫人！”蒋经国从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母就一直称“夫人”，虽遭父亲多次规劝、批评，但就是不改口，他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缓缓说道，“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表弟案子重大，经国只能以法论处，否则，将对国家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经国，”宋美龄听了蒋经国这些丝毫不给情面的话，气得不行，但还是强忍住说道，“你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这次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大家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希望你能给母亲这个面子。”

蒋经国一语九鼎，绝不松口：“夫人，国事重大，经国不敢徇私枉法，望夫人理解我的苦衷，收回成命。”

宋美龄见蒋经国毫不松口，只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电报时，国军已在东北遭到惨败，华北吃紧，他正在北平布置军事防务。看到夫人火烧火燎的电报，不敢怠慢，立即飞抵上海。

泪水和柔情是女人征服男人最有力的两件武器。宋美龄也不例外，为了说服蒋介石迫使蒋经国放掉孔令侃，她把这两件武器都用上了。蒋介石答应宋美龄放掉孔令侃，把蒋经国调回南京。上海“打虎”运动遂告结束。

“扬子案”传出，上海市民群情激扬，这一特大丑闻，立刻喧器中外，蒋太子一病三月不起，翁文灏内阁倒台，起草经改方案的财政部长王云五退位。物价的涨势犹如决堤的狂潮，“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金圆券直线暴跌，上海中央银行前，挤满哭天号地的人群，自杀者每日不绝，一副末日的惨景。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不能免。

借外国人的钱，买外国人的枪，然后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动统治者乐此不疲的事情。在这方面，蒋介石干得更出类拔萃，为其他反动派所不能比。解放战争进行了三年，死人数百万，大多是被外国人造的枪弹打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初，扬言“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共”，他胆子这么壮，嗓门这么高，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有外国主子——美国主子的鼎力支持。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前方的仗还得继续打下去这大笔的军费从哪里来？他只好乞求于美国的支持。问题是，此时美国的态度决非内战之初可比了。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军事装备，但共产党的军队不但未见被消灭，而且日见壮大，蒋介石只是充当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美国的杜鲁门政府逐渐感觉到，靠蒋介石是不能实现美国人在中国的意图的。1948年10月，以“中国最仁慈诚挚之友人”自居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看着蒋介石处境之全面恶化，曾向美国国务院致函试探对华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去函对司徒雷登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其中有这样的几节：

“执事（指司徒雷登，下同——作者注）5月26日报告，谓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现政府将仍无力阻止共产主义。执事又谓，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

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将继续个人统治，此项个人统治之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执事于6月14日的报告中，当陈述蒋委员长保证同意执事之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与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即顾祝同——作者注），而亲自指挥作战。”

“在执事8月20日报告陈述中，执事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国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执事10月16日报告谓：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加多。执事又谓，此时已嫌过时，除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任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执事10月22日报告中，谓我方军事顾问认为，国府军事组织，在人力、物力及士气上，似已遭受过大之损失，以致在此方面，任何努力均难成功，国军已完全丧失战斗意志，致美国政府现已难寻得有效方法，以改变现时局势。执事又称，重振中国反抗共产党侵略之意志，实属必要，唯所需之领导者，则至今尚付阙如。”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蒋介石又向美国伸出了乞援之手。11月9日，蒋介石亲自给杜鲁门写信，要求他迅速给以增加军事援助，表示愿意以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务与权力，并切实执行顾问团对作战的意见，作为增加军事援助的条件。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坚定声明，他在信中说：“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

杜鲁门对蒋介石不再有以前的热情了。他在给蒋介石的复信中仅表示可依已签定的援助计划执行，而没有增加军援的表示，并

委婉地拒绝了重新发表对蒋介石政府支持的声明。

美国国务院更通过司徒雷登，明确向蒋介石公布了他最后能够接到的以前尚未兑现的军事援华数目：

关于加速军火之运输，美国国家军需部正在尽力将自1.25亿美元赠款项下购买之军用物资，加速运输。据陆军部非正式报道，包括中国请购之3780万美元的枪械与军火内之全部军火，可望于11月中旬在西岸装完，在12月初抵达中国。在此项计划下，并尽力使其它物资可以运输。国家军需部同时致力设法运输盟总可先垫借之枪械军火，此项物资可于11月间运达。循中国政府之请，由1.25亿美元赠款内，支付1.03亿美元之援权函，已由国务院送达财政部。依照中国之指示，该部已付予中国政府，或予美国陆海空军部以该项，总数中之7700万美元。其余之600万元，将于12月25日付清。除却美国在1.25亿美元赠款项下援助中国政府外，更无其它军事援华办法。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复信和美国国务院的信函之后，寒心透了，半天没有出声。

杜鲁门的信，是宋美龄边读边翻译的。她看到蒋介石极端痛苦的样子，心中甚是怜惜。她轻轻走到蒋介石的跟前，不无爱怜地说：

“大令，国家虽重要，但不是你个人的，但急坏了身体可是个大事。想一想，是否还有其它补救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蒋介石面无表情他说，“美国人变卦，其中有别篇文章，我不能让李宗仁美梦成真！”

蒋介石停了一下，两眼直盯盯地望着宋美龄，歉疚地接着说：“我看只好劳驾夫人去美国一趟了，你到美国去，亲自找马歇尔，找杜鲁门，向华盛顿陈情，切切不能停止对华的援助，切切不能只听司徒雷登的一面之辞。”

夫人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是成功的，以前蒋介石曾深受其惠。和美国人打交道，和夫人相比，蒋介石自感弗如。宋美龄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此紧要关头，自然不会推脱。

11月28日，宋美龄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勘乱任务。”她带去了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权力方案，以及让美国人来管理美援和让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允诺，希望美国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中国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并核准一个给中国的军援与经援的三年计划。但宋美龄在美国的频频活动却收效不大，她得到的是未有过的难堪和冷淡，满怀希望而去，充满失望而归。后来宋美龄曾说，她和蒋介石今年过了个“最不快乐的圣诞”。

杜鲁门对蒋介石冷淡，并不表示美国已打算放弃对中国的干涉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再打算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不干涉中国，就显示不出美国强权者的霸道；不挑动中国人打内战，就不能从中国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是块肥肉，世界上所有咬过中国的殖民主义者都深有体会。能咬住中国这块肥肉，就决不松口，这是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既定政策，只不过认为再继续依靠蒋介石以军事抵抗共产党，已经不是聪明的办法，而必须另换药汤

了。

“兄弟不和邻里欺，将相不和邻国欺。”这就是蒋介石此时的处境。

1948年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邀请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聚餐，宣读第二天将要发表的引退文告。宣读以后，他神情激动地大声说道：“我并无意离开，但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不愿意离开宝座，这是他的心里话，但他又不得不离开

47

他的宝座，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人生都有转折点。淮海战役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转折点。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涯也将会随之结束。聪明的美国人清清楚楚地看透了这一点。因此，还没等淮海战役结束，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社论：“蒋介石失败了！……当前最有效的步骤是蒋介石辞职，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蒋介石已不能代表美国实现在中国的利益了，它要改换新的代理人。

李宗仁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一位副总统的。他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手中却毫无权力。在南京总统府内，子超楼上总统办公室的对面一一八号房间是副总统办公的地方，因为无公可办，“门虽设而常关”。他为表示对蒋介石不给他公事可办的抗议，干脆就不去办公室。在哪里闲着不都是一样？还不如戴着副总统的桂冠携夫人到处游山玩水，有人曾美称他叫“旅游副总统”。他经常在紫金山上望江兴叹：“诸

葛孔明曾形容‘石头城’是‘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我看似龙成不了龙，看似虎而成不了虎，只能作这石头城的一块石头，高可谓高，却上不着天，下不沾地，高高擢在山顶，形成摆设，供人赏玩，悲哉悲哉！”李宗仁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但机会终于等来了。

就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那篇直言不讳的社论的当天夜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访了李宗仁

会见了司徒雷登，李宗仁兴奋至极，连夜与武汉身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通话……

第二天李宗仁夜访何应钦……

第三天李宗仁与“国舅”宋子文共进午餐……

第四天，以既反共又反蒋自称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在南京一家杂志上公开发表《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的奇文……

李宗仁顿觉福星已高照头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蒋介石闻之则大惊失色，如大难临头一般。在《祝蒋赴美休养一路平安》文章发表的当天夜里，他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到了官邸。

当日夜，毛人凤用秘密电台给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发去急电，内容是：令沈醉即将省站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京另有重任。

第二天深夜，一辆不为人注目的小轿车从警备森严的国防部高级招待所飞驰而出，直奔蒋介石的官邸。车内坐的，即是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

他下车后，即由早候在门前的一位侍卫副官引路，匆匆走过角道，迈上台阶，屏住呼吸，进入蒋介石的书斋。蒋介石正坐在沙发上，叉着双手，闭目养神。沈醉两脚一靠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沈醉奉命来到，请总统训示！”蒋介石连连点头，站起身一副和蔼的样子跟沈醉握手，然后，关怀备至地问寒问暖。沈醉一一作答。这之后，蒋介石才笑吟吟的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立刻心领神会的回答：“毛局长一切都吩咐好了，请总统放心！”

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在他的危难之秋，又耍起了流氓性子。美国人不顾和我老蒋多年的交情，落井下石，除掉李宗仁，让美国人死了这条心吧！

蒋介石惟恐沈醉还不理解自己的苦衷，不无沉重地说道：“早年我曾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在今天还是对的。当前党国形势严重，但本党内部却有人趁机捣乱，我既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对付内部那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捣乱。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首先把内部整顿好，就会给共产党可乘之机。所以，我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了。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只许做好，不许出半点差错，更不能把事情泄露出去！听说你是神枪手，过去曾为党国出生入死，这很值得赞赏！这一回，更应不惜一切代价，赴汤蹈火，去完成任务！”

沈醉唯唯诺诺地一个劲儿点头称是，并表示：“请总统放心，为了党国的事业，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临走时，蒋握着沈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党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解决。”暗杀李宗仁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天，沈醉又到保密局，与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四个人商量具体步骤。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一是担任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还决定，对

于桂系的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也采取对付李宗仁同样的办法。

当时，李宗仁的住所在傅厚岗后面，经过沈醉等人几天的实地观察，知道李的坐车在进出转弯时速度必须慢行，所以认为，如果此时从马路两边同时发枪，可以十拿九稳。为了保证“绝对能完成使命”，毛人凤还特别挑选了两个人协助沈醉，一个是秦景川，此人是在军统看守所担任杀人工作的；一个是王汉民，原为东北惯匪，后被军统收罗。两人在军统中都以“枪法准确”深受“重视”。再加沈醉，也是军统中有名的“神枪手”。由他们担此“重任”，定会“万无一失”。

沈等为了便于随时侦察，在李宗仁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他们认为，这样的布置，一面便于掩护侦察；一面可以在决定行动时，在这里多站几个人，而不易被发觉。这个据点，由军统骨干分子吴德厚去负责。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工作据点，并下了命令，如发现李宗仁到机场，要立刻向毛人凤报告，以便让毛人凤通知空军，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又因当时桂系有一部分部队在安徽境内，为了防止李宗仁以视察部队为名乘火车出走，又在江南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小木房，派人摆设香烟摊，进行监视。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人开设了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工作。

此外，“特别行动组”在白崇禧、甘介候等人的住宅附近，也作了类似的布置。毛人凤特意为“特别行动组”配备了辆速度最快的小汽车供其使用，以备李宗仁乘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可以随时进行追杀。

正当蒋介石密谋杀掉李宗仁的时刻，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人物，也没闲着。他们虽然没有胆量直言杀计，但其实质都一样，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李宗仁天性软弱，往往是思有余而行不决，所以龙争虎斗多由他的亲密伙伴、广西同乡，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具体实施。

此时，白崇禧正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里日夜绞尽脑汁思虑着倒蒋的计划。

白崇禧曾想过在此紧要关头再次举起公开反蒋的大旗，用武力对抗蒋介石。但他又很快否定这种想法。因为老蒋现在手里还有相当实力，如采用军事手段讨蒋，势必造成双方分裂，自相残杀，使力量削弱，与共产党对抗的本钱就更小了，蒋桂如公开分裂，则桂系也难以代表整个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目前表面上还需要维持蒋、桂间的团结，用另一种力量促成蒋介石下野，使李德公能取而代之。这样既可把老蒋的残余军事力量抓到手，又可得到美援，与共产党或谈或打，本钱大了腰就硬。

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不用兵使老蒋乖乖下野呢？这些天白崇禧为此真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孙子》、《吴子》、《司马法》到《六韬》、

51

《三略》等兵书又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不流血倒蒋的妙计。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前几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几位名人从上海、南京乘轮船经汉口入川时，白崇禧曾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设宴招待过他们。据梅贻琦等人说，宁沪一带要求和谈的呼声很高，盼望武汉方面有所行动，促成国共和谈，以息刀兵。当时他听了不置可否，现在想来，却是一着妙棋。“我把中南几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把老蒋打个措手不及。对！就用这个办法逼他下台。”

这样一来，由桂系发起和平攻势，在政治上便可先得一“人和”，目下沪宁一带既有求和之望，他在汉口通电主和，必得广大民众及各阶层的响应。老蒋再要打，就会失人心；如共产党拒绝和谈，也会负人望，主动权便会操在李、白手中了。老蒋的仗已打到这般田地，他必不肯罢战求和，作城下之盟，打又不能打，和又不能和，到时只得被迫下野，到时德公就可以上台。以长江为界，江北由共产党搞，江南由李、白来搞，弄个南北朝的局面倒也不错。这个办法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欢迎，因为这总比老蒋把本钱输光，把疆土丢尽，到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要好一万倍。

就是从军事上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利的。不但对老蒋起到缓兵之计的作用，就是对共产党也是个缓兵之计。和平的通电一发，便可堵死老蒋向华中抽兵的借口，华中的兵力便可以保存下来；共产党方面，也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如此，江南、西南便可编练二线兵团，即使和共产党一定要打下去，桂系也可在西南站稳脚跟。白崇禧越想越得意，“小诸葛”如今要胜过“大诸葛”，孔明都不曾有如此妙计！

他很快就给蒋介石拟成了电稿：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英、美、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这份倡和电报发出后，蒋介石未予理睬。白崇禧迫不急待地又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对蒋进一步施加压力，电报说：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邻，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白将第二封电报发出后，便立即授意河南、湖南两省议会，同时以民意机关代表名义，公开呼吁要求和平，其中尤以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致蒋介石总统的电文最为直言不讳，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其中“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候国人自决”几句话，不胫而走，迅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接着，湖南省长、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和平，他的电文，措词比白崇禧更为激烈。在华北地区战云密布，徐蚌一带炮火连天，国共两党军队正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候，蒋介石的后院起火，在华中地区却出现一片和平之声，实在让人难以捉摸。京沪一带，关心国事的人奔走相告，以为局势将有某种转机。一时间，文人学者，商绅市民，无不踮足远望南京，看看蒋总统将如何采取应变动作。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都在朝着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方面迅速恶化，他暗杀李宗仁的计划也在加紧实施。

在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发出和平通电的当夜，蒋介石对毛人凤进行了紧急召见。

当日晚，毛人凤接到蒋的电话后，一面命令秘书通知沈醉做好一切准备，一面匆匆忙忙赶到蒋介石的宫邸。

毛人凤一进门，已在此等候的蒋介石劈头就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报告总统，按照您的吩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您下命令了。”毛人凤喘着粗气立即答道。

“好，很好！坐，坐下谈。”蒋介石听毛人凤说一切准备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示意毛人凤坐下谈。

毛人凤坐下后，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刺杀李宗仁的准备工作，蒋介石不住地点头肯定。当毛人凤说到“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他的座机击落，然后以飞机失事为由对外公布”的刺杀方法时，很符合蒋介石的心意，便打住毛人凤的话说道：“唔，嗯，好，这个好。”

要杀死李宗仁，对于蒋介石来说，简直和处死笼中的一只鸟雀般容易。他只要一个点头，一个暗示，李宗仁便会立刻死于非命。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真相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桂系首领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会通电举兵讨伐他，而且国人也将不容，更何况现在美国人对李宗仁颇有好感，他们也一定会激烈反对，弄得不好，将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以收场。如果在空中干掉李宗仁，以飞机失事为由，向外界公布李宗仁的死因，那就谁也抓不到把柄了。

问题是，连蒋介石也知道，前一阶段李宗仁游山玩水了一番，但近些日子却深居简出，副总统办公室里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他会坐飞机到外地去了。如果李宗仁一年半载不乘飞机，这空中暗杀的计划不就泡了汤。蒋介石想到这里，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毛人凤，说道：“不妥，不妥。”

“总统，”毛人凤见蒋介石一连说了两个“不妥”，又狠狠地说道，“到李的住宅进行狙击最有把握，而且随时可以动手。我已作过认真观察，李宗仁寝室外面的外面安装的有变压器，因此，我已布置安排在首都电灯公司里两个成员，等需要行动时，则以借检修变压器为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扫射，而且可以进到院子里面进行狙击。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剧烈的毒药，不管子弹射中人的任何部位，哪怕是擦破一点儿皮，都会立即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看来，有毛人凤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绞尽脑汁地精心布置，李宗仁是难免一死了。

毛人凤讲完，蒋介石没有再说话。不再说话就说明已是无话可说了。再往下面，就要靠毛人凤的心领神会了。作为一国之君，是不会亲口说出“杀”字的。毛人凤不知在蒋介石面前接受过多少杀人的密令，但从未听到他说过一个“杀”字。等一切暗杀工作准备就绪以后，蒋介石开杀的命令不是通过嘴里说出的，而是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手势下达的。根据毛人凤多年的经验，只要蒋介石那双深邃的锐意重重而又森冷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异样的冷酷，闪过快捷的寒光，两张薄薄的眼皮往上一抬，两只眼珠迅速定住不动，几秒钟后，两张眼皮往下一眨，右手抬起来，再往下果断地一摞，这时，开杀的命令即已下达，毛人凤即可进行他的杀人勾当了。

正当毛人凤全神贯注地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时，而蒋介石迟迟没有表示。他的右手并没有抬起来，而是背在身后，在室内慢慢地步履沉重地来回踱着步。毛人凤今晚感到异常纳闷，蒋总统可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优柔寡断过。以往，毛人凤一应召到办公室，往往还没开口，蒋介石那眼皮已经一抬

一眨，右手接着拾到半空，这死神之手只要往下一摠，毛人凤就会双腿一并，说一声“是”，便辞了出来，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后，便就会有人命归黄泉。

“去吧！”蒋介石忽然停住步，向毛人凤轻轻一摆手，慢吞吞的说道。

毛人凤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话，仍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不动。

“回去吧，回去吧！”蒋介石又不耐烦地连连摆了两下手说道。

毛人凤的耳朵没听错，是让他回去。于是他啪地打了个立正：“是！”敬了个礼，抬眼迷惑地望了一下蒋介石，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毛人凤刚抵家中，侍从室的电话又急召他赴总统官邸。但他到客厅后，蒋又命侍从副官叫毛人凤回去。如此这般，又折腾了两次。毛人凤一夜没睡，蒋介石一夜也没有睡成，但刺杀李宗仁的行动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那天晚上迟迟下不了杀李宗仁的决心，并非他优柔寡断，并非他为情所困，而主要是投鼠忌器。白崇禧发出倡和通电之后，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请黄绍竑到武汉，以八万港元的重金包租陈纳德一架飞机，飞到广州，转赴香港，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来武汉主持与中共和谈，李济深本是桂系的老大哥，又与中共有密切联系，若李济深到了武汉，和谈大门一开，他蒋介石将处于何种地位呢？紧接着白崇禧又强迫汉口中央银行将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扣留重庆兵工厂停泊在汉口江岸码头准备东运徐州战场的械弹。在这种情况下，杀掉李宗仁，不但干事无补，反而会火上浇油，这种局面使蒋难以收拾。再者，美国人换马的决心已定，连司徒雷登也明言相告“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须”。和美国人彻底闹翻了，以后连西北风也无处喝了。

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提醒他，在这种四面楚歌，身临万丈深壑之时，只有忍耐才可能会出现转机。而现在有可能实现这种转机的，恰恰只有李宗仁。一个活着的李宗仁比一个死了的李宗仁对他

更有利。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让李宗仁活着当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主持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至于李宗仁能否实现蒋介石让其继续活着的目的，这大概是李宗仁、蒋介石本人都无法左右的事情了。

三、第四次握手

近现代中国波诡云谲，国共两党有过四次“握手”。日暮途穷，国民党发出乞和声明。

邓小平斩钉截铁：长江不是分界线！毛泽东胜券在握：中国决不允许再有南北朝！蒋介石阴阳怪气：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巨哟！张治中满脸愁云答记者问：此次和谈如履薄冰，前途凶多吉少！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

3月31日，邓小平最后审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以总前委的名义发出。4月3日，军委批复：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在作战部署上，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庆至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三野战军部队，以适应南京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别组成东、中、西突击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南京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的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鉴于镇江、江阴段敌防御部署兵力较强，为保证东集团的渡江突击，除加配炮兵支援作战外，还决定东集团比中、西集团晚一天发起渡江作战，以减轻敌人对东集团的压力。为保证第三野战军中、东集团的渡江突击，第二野战军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为便于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率轻便指挥所进至合肥附近，统一协调组织各集团的行动。

总前委对西、中、东各集团的具体作战方案也作了明确规定：

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35万人，分布于湖口与枞阳镇之间实行渡江作战。其中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区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地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后，第三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以保证截断敌人之退路。第四兵团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中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第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30余万人，分布在长江裕溪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县地段进行佯攻，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第八、十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各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35万人。东集团的渡江地段为黄港至三江营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做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截断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芜湖和镇江的敌人。

为了保证西集团渡江后右翼的安全，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的20万人一部进占浠水、蕲春、黄

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一部进占武汉外围的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进。

关于渡江的时间，总前委在2月份给中央军委打电报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渡江作战，天气是个重要因素，4月初以前，长江沿岸雨少水小，风浪较小，利于我军水上作战。

这一年的天气好象也在催促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过长江去。往年，5月份才出现的淫雨天气，这一年在4月份已降临长江沿岸。

春雨绵绵，瑶岗终日被淹没在茫茫的雨雾之中。在等待渡江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的长。时间已是4月上旬，长江的水一天天在上涨，中央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但就是看不到中央下达渡江作战的命令。

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第一号指挥员的邓小平，比任何人的心里都更焦急。此时，他正站在指挥部偌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一条蜿蜒曲折的绿带把中国的疆土劈为两半，心中愤慨不已，自言自语道：“长江决不能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界线！”

北平，香山。

夜色陵蒗，此时的北平城，灯火阑珊，在四十里外的香山南麓，一座叠石环抱的庭院，亦灯火通明。这是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党中央搬到北平香山还只是几天前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在像上海、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里发端的，但由于自己力量的弱小，敌人的力量强大，在城市待不下去，被迫钻山沟、下湖泊，到中国最落后、最难以生存的偏僻地区求发展、求生存。从1933年党中央机关撤出上海，到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整整16年时间。16年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这时间可就不能说短了。16年前，不少党员刚参加革命队伍时还是个不怎么懂事的农村娃，但16年之后，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新中国还要依靠他们领导建设呢！在这16年中，党的队伍变化确实大大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换了好几茬，党的队伍成员牺牲了百多万，扩大了几百万。到进北平城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所剩无几。此时党的领袖毛泽东两鬓已见银丝。

还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激动地宣布：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毛泽东深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

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鉴于历史上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由于领导人的骄傲和队伍的腐败，很快又失败了严重教训，当中央机关从西柏坡临出发前，特别意味深长地说：“我们

61

不能做李自成！”并且给周围的同志认真他讲了李自成的故事。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了皇帝的宫殿，忙着做皇帝了。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将军刘宗敏忙着刮地皮，严刑杀人，不讲政策了。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也吃喝玩乐。他们骄傲了，完全不顾北边还有清兵入关。明朝的将军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领着清兵打进关来，他们还不赶紧抵抗。牛金星还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刘宗敏也是一味蛮干，弄得北京城鸡飞狗跳。那还不失败？！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一路被追得屁滚尿流，连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清兵追杀死了。李自成是农民领袖，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

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防止党内骄傲和腐败现象发生的问题，是重视的，头脑也是清醒的。

鉴于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尚未肃清，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党中央迁往北平后没有立即住进城里，而是住在香山。

香山是北平西郊群峰之一，重峦叠嶂，花木茂盛，清泉潺潺，幽雅别致。从元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在这里建筑离宫别院，清朝建的更多。乾隆年间在这里大兴土木，一气建了亭台楼阁 28 景。后来，香山诸景遭八国联军的破坏，残存的景观寥寥无几。

2 月初，彭真、叶剑英布置中央社会部对西山进行清理，重点将双清别墅进行了整修。当时双清别墅破败不堪，很不象个样子。水池子早已干涸，满院子乱枝败叶。房子只剩下个空壳子，墙皮斑驳，地面坑洼不平。中央警备团派人修缮了一番。修好后，又发现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房子墙角藏着一颗手榴弹，可把工作人员吓坏了。

夜虽然很深了，但这正好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办公的时候。

此时，在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会客厅里，党中央的五大书记正在笑声朗朗，纵谈大局，研究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站在偌大的军用地图前，右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左手叉在腰间，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现在，地图上蓝色的圈圈已经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的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情况比较复杂，还得需要认真对付，但那至多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了。

毛泽东忽然转身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南京的代表几时到？”

“后天，听说张治中正在溪口请示蒋介石，然后才能来。”坐在一旁大沙发上的周恩来，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不紧不慢的说道。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面和我们进行和谈，背后还是蒋介石说了算。”接过周恩来的话，毛泽东用浓重湖南口音说道：“当然喽！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我们都是要谈的。和平的旗帜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以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我们的部队刚打完大仗，休整一段再渡江对我们更有利。”

朱德抬头望望毛泽东，微笑着说：“主席，小平多次来电催问，说我们啥子时候让他渡过江去，部队都着急喽！”

任弼时因为重病在身，半躺半靠在沙发上，但精神很好，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月底。4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的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就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了喘息的时间。”

“这就是敌人谈判的目的。”朱德接过任弼时的话说道：“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二百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挨着任弼时坐的刘少奇，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问题：“现在蒋

63

介石正加紧做

美国人的工作，希望美国人直接派兵干涉。现在许多人也担心，如果我们渡江，美国就会派兵，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烟蒂往地上一掷，愤愤地说道：“中国不会再有南北朝，你美国就出兵好了。美国不就是仗着它有原子弹嘛，我们偏不怕！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这笔帐迟早是要算的！”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江，不能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综合起来看，美国统治者内部，现在对在在中国的问题上争吵不已，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干涉也难。1月26日，美国已正式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种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于1949年4月才到期，并且艾奇逊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国会已经通过了。另外，当我渡江部队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原来暂停的船只又开始为蒋军运军火。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出兵直接干涉我们过江的可能性小，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敢。但是，在我们作战准备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我们现在渡江部队的兵力部署，就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制定的。二野、三野一齐渡江。二野紧靠三野渡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二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总之，我们准备拿出二百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的地位。”

毛泽东最后总结似地说道：“不管是蒋介石也好，还是美国人也好，谁都阻挡不了我们统一中国。我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下来。和南京的谈判，结束的时间最晚不能拖过4月下旬，至于打嘴皮子仗”，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看了看周恩来，继续道，“还是恩来担当，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渡江作战部署不变，具体工作，朱老总再督促一下。少奇同志抓紧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弼时同志嘛！”毛泽东谈到这里停下来，深情地望着任弼时缓慢地说道：“以逸待劳，静心养病，如有大事，我们会向弼时同志请教的。”

会议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结束。

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蒋介石“引退”而去，李宗仁“统”而“代”之。

当李宗仁第一次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心里真有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滋味，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总算离开了，这使他感觉就象从心里掀掉一块大石头一般轻松。他小心翼翼地坐上那张蒋介石经常坐的巨大办公桌后的坐椅上，这是九五之尊啊，这是泱泱中央之国庞大冗繁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坐上去实在让人心潮难平！

他本是来自西南边陲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八个，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村里人都叫他“老九”。老九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初到城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谈不免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老九”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却如鱼得水，步步升迁。想当初，当他走出农家，投身行伍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日，总统前面虽有个“代”字，但毕竟可以号令天下，“总”而“统”之了。一种巨大的满足使他飘飘然有些陶醉。

白崇禧在逼蒋下野之前曾对人说：“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

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老蒋是耍你的，他没办法干下去了，让你当替死鬼，干不得。但他（指李宗仁——作者注）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

当时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话不以为然，而当他坐在总统办公室椅子上的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已体会出白崇禧话的味道了。

李宗仁官迷心窍地认为，只要取得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只要蒋介石走开，他自己便有办法。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李“代总统”，未免也有点儿幼稚。要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任何“法”都是因人而异的。同样是一种“法”对于有些人来说，至高无上，丝毫冒犯不得；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形同虚设，无法无天。

国民党的“宪法”没有帮李宗仁多少忙。

玩权术，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阴狠狡诈，搞人这一套，是蒋介石的专长。蒋在“引退”前，早把一切算计周全，岂能让李宗仁真能“代”而“统”之不成？

蒋在“引退”前三天，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下命汤恩伯为专任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蒋的意思很明显，要让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把江南军力紧紧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

蒋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派薛岳接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这些人，全都是一色蒋的亲信。通过这些任命，蒋把人事棋局全摆好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空位子，让李宗仁坐上去。

春节前夕，李宗仁为树立代总统关心部下的形象，命令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给首都卫戍部队每名士兵准备一元现洋，初一这天，他将亲率政府阁员前往慰问。

那天，李宗仁起得特别早，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有集军政首脑于一身的寓意。夫人郭德洁，穿件银灰色裘皮大衣，显得雍容华贵，这将是她第一次以总统夫人露面的机会，无论从穿着打扮上，还是言谈举止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总统府官员刘士毅一大早便奉命到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取钱去了。

按照李宗仁的吩咐，这天劳军由他亲自率领，到雨花台、狮子台一带看望官兵、发放赏银。规定10点钟以前，内阁部长和五院院长乘车到总统府门前会齐出发，但赏银必须在9点钟之前领出运到傅厚岗官邸。

但一直等到10点半钟，刘士毅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报告总统，没……没钱啊！”刘士毅一见到李宗仁便气呼呼地报告道。

“怎么回事？你慢慢讲。”李宗仁不免大吃一惊，强压着激动的情绪平和的问道。

“银行说没钱可支，拿不出这么多现大洋。”刘士毅又说。

“他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总统要几万元慰劳首都卫戍官兵，他们都开支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你再去责问他们，叫他们无论如何把钱给我弄来，否则前线官兵岂不说我言而无信！”李宗仁火气还是没能压住，没有钱怎么去劳军呢？而且每个官兵发一元大洋的消息，他已向卫戍司令张耀明和副司令覃异之讲过了，这话怎么能再收回呢？

“我都快把嘴皮磨破了，他们开始说没有钱，后来会计科长说，蒋总裁有令，银元全部运往台湾存放，自他下野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除非取得总裁的手令，方能支领。”刘士毅唉声叹气地说道。

“岂有此理！”李宗仁大声斥喝道。果然如此，老蒋真要让他当傀儡，连开支几万元的权力都不肯交给他，这代总统还算什么。

这还不算，还有一件事差点没让李宗仁晕过去。

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是孙科。蒋介石下野以后，孙科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偷偷地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春节前阁员们也都悄悄地去了上海，节后行政院便在广州办公。孙科把行政院一搬走，南京便剩下李宗仁这空头总统了，这代表政府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不可谓不毒。

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郭德洁也认为自己也成了中国第一夫人。本来，满心欢喜，把傅厚岗69号李宗仁代总统的官邸装饰得一派节日气氛，准备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里尽情地庆贺一番，岂料想，过了一个他们有生以来气氛最为暗淡晦色的春节。

节日一过，李宗仁便火急火燎地直飞广州，要孙科把行政院搬回南京办公。

李宗仁到了广州，对孙科苦口婆心，劝说加哀求，请他回南京，可孙科就是不为之所动，最后干脆以身体不适，需在广州治病为名拒绝重返南京视事。后来在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的多方压力下，孙科被迫辞掉了行政院长职务。

让谁来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呢？权衡再三，白崇禧提议让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因为何与李、白曾经合作过，多年来彼此关系较好，且何应钦也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以何组阁，既可维持总统府和行政院一致的行动，又可争取蒋派系其他人的合作。李宗仁便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带着他的亲笔信函到上海邀请何应钦来南京组阁。可是不论白崇禧和吴忠信怎么说，何就是不答应到南京接任此职。最后，只得李宗仁亲自出马，到上海进行劝驾。

此时，何应钦正在上海闲居。终日在他的公馆里养鸟种花，不闻时事。其实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那颗埋在胸膛城府极深的野心，并没有丝毫消沉。

何应钦正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他料想李宗仁一定会请他出山帮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民国十六年在南京曾有过一段“蜜月”的历史，而主要是因为，老蒋虽然下野，但仍在幕后操纵，那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李、白是难能调遣的，非得请他发号施令才行。想当年，保卫南京，血战龙潭，第一军就靠他指挥，才与第七军击溃了孙传芳的几万大军。当然，这些年来，他在蒋介石的手下也算混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但总觉得不顺心，因为在老蒋面前，他永远像一只老鼠似的提心吊胆过日子，老蒋的那双眼睛，像鹰一般犀利，直盯得他心里发怵。“西安事变”，他心怀“大志”，力主出兵讨伐张、杨，但被宋美龄等识破诡计严加制止。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蒋介石的那两只眼睛无时不盯在他的身上，似乎不在他脑后找出两块魏延似的“反骨”来永不罢休。陈诚青云直上，慢慢取代了他的地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把他推到联合国去当有名无实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回国后，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国防部长，但却没给什么兵权，徐蚌两地区 100 多万国军交由白崇禧指挥。但谁知白崇禧不领情，拒绝指挥，结果徐蚌会战一败涂地，紧接着白崇禧又心怀叵测，举起倡和之旗，此时，何应钦才看出桂系野心之大，令人震惊，他们要逼蒋下野，取而代之。何深怕受到牵连，便以徐蚌战败引咎辞职，躲到上海，以观时局。不久，桂系名义取得胜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他怕老蒋怀疑他与李、白勾结，便跑到蒋的心腹汤恩伯的别墅里隐居起来，每日只带一名副官，到山上游玩打猎，以示淡泊。听说孙科辞了行政院长，他立即回到了上海，估计李宗仁必然会来找他出面组阁。从内心来讲，他对行政院长一职仰慕已久，老蒋硬是不让他如愿。现在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对他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但老蒋会让他再和李、白搞在一起吗？老蒋是绝不会忘记民国十七年那快伤疤的。想到这里，何的心里像猫爪挠心，很不

69

是滋味。

李宗仁来上海后，何应钦还是不敢应允。李宗仁明知道是因为害怕蒋介石不同意，但只有气愤，而无可奈何。此时，李宗仁深感他这个代总统的无能为力，脸上火辣辣像被谁打了耳光似的。但是，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总统的架子，低声下气地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央求让何应钦出来当行政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正式就任行政院长。

李宗仁既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了个代总统，他就想给世人有个好印象，也想显示一下这个“新”总统与蒋介石的不同风范。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采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这很显然，只要将政治性事件引用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触犯戒严法的罪名，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汤恩伯就是这样办理的，他在2月11日发表谈话时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

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威胁情势。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汤恩伯这番做法，把代总统款允，一笔勾销。

李宗仁上台后，下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给硬硬实实在地顶着不办。

李宗仁以上这些措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个样子给国人看的，或者说是为了打击一下退避幕后而实际操纵的蒋介石。

李宗仁争个代总统当，一不是为了国人，二不是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准备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不让共产党的军队打过长江，划江而治，弄个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当然，李宗仁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看得清楚，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如果解放军一过江，一切将无从谈起。他现在已经到了在谈判的条件上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虽是屈膝言和之电，但此时李宗仁却有胜者的感觉。李宗仁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的名义，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对话，这本身就抬高了李宗仁在党内、国内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蒋介石所做不到的，这是李宗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占了蒋介石上风的一个结果。人的感情如此之复杂，有时候屈辱和自豪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愫却能同时由一事情维系在一起，实在让

71
不可思议！

人不

3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条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准备的必要材料，前往北平。

紧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宣布，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将于4月1日由南京乘坐“空中行宫”号专机，飞往北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郭沫若曾对他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这个人对于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信义！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卖国的一些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奇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造就了奇特的历史人物。由于他这种特殊性，在国民党战败求和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自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作用，与共产党和谈周旋的责任，实在是非他

莫属。因为，他在共产党面前有面子，他可以为国民党力争到最有利的条件而能为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容忍；因为他对蒋介石一贯忠诚，国民党内反对和谈的势力必有所顾及。

本来，李宗仁一上台时，就想改组内阁，用所谓“刷新内政、促成和谈”的招牌收揽人心。他曾想让张治中任行政院长。张治中不愿接受，回兰州去，仍作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回兰州前，李宗仁对他说：“你不做行政院长可以，但是，你一贯主张和谈，我现在和谈，你回去之后，要快地回来。”

张治中心里明白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空有虚名，而且虽然蒋、李各怀鬼胎，但都是以和谈为幌子，以备战为自保的目的去进行和谈的，这样的和谈是很少成功的。所以张治中一回到西北，便决心不再离开，并给南京发电辞去和谈代表。怎奈李宗仁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京，担起和谈重任。许多朋友也大义相劝，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既然你一贯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张治中见大家盛情难却，乃于2月20日乘李宗仁的座机从兰州飞返南京。

张治中返京的那天，何应钦，白崇禧等南京军政要人都去机场迎接。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异常恶劣，云层极低，又有蒙蒙细雨，能见度只有200米。其情其景，倒似南京的政治气候。飞机盘旋了很久才得以降落。张治中一下飞机便一语双关的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张治中一住下来，李宗仁左右的人就向张大发牢骚，都说蒋介石表面是“引退”了，事实上则在溪口指挥一切，处处掣肘，李宗仁的一切想法根本行不通。张治中觉得，南京的情形表明，看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劝蒋出国。但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这次下野可不象前两次下野那么潇洒，不但几百万精兵被共军打得丢盔卸甲，而且又是让桂系逼迫下台的，一句话说不通，必招致蒋龙颜大怒，自己与蒋20年的关系就成泡影。

张治中是个秉性耿直敢说敢作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蒋介石此时出国，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实际对蒋也无害处。张乃下决心要去冒下这个风险，以斗胆去劝蒋介石出国。

他又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蒋介石的两个亲信张群和吴忠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张群和吴忠信此时也认为，这时候蒋出国实为上策，于党国和他本人都有利，支持张治中的想法。

蒋介石是李宗仁的眼中钉，如蒋能远走高飞，当然是求之不得

73

的事情，所

以，李极力支持张治中早日成行。刚好那时候吴忠信也要去溪口看蒋，张便与吴一同前往。

张此次在蒋介石住处共逗留了八天，前五天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后三天和蒋一起转住溪口。张治中和蒋介石此次谈话范围很广，主要有：

一、关于劝蒋出国问题。本来，这是张治中见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被蒋先发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3月3日见到蒋介石的当天，双方略事寒暄之后，还没等张治中说明来意，蒋介石就脸色一沉愤怒地说：“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此后，张治中连再提一提让蒋出国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当时张治中很感纳闷，这劝蒋出国之事，只有李宗仁、张群、吴忠信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是极端秘密的，怎么一下子竟捅到了报纸上呢？

原来，这事是“小诸葛”白崇禧干的。他指示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了这一消息。白的用意，是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洋。张治中离京当日，南京各大报纸上纷纷登出“据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正前往溪口，劝蒋出洋”云云，搞得南京沸沸扬扬。

但“小诸葛”这次并不聪明，岂不知蒋介石向来我行我素，别人怎么说怎么看的影响对他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反而给蒋一个发泄的口实。

二、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张、吴请蒋表示意见。蒋则反问他们的意见。张治中说：“南京方面的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进行，把全国的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额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在政治上，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必要时，国民党可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问题，过去中共曾搞过“三三制”，可以考虑，最近还有人提出了“六六制”的建议，但不外乎是使双方在未来的政府里，保持平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它各项，都可以考虑。”

蒋听了之后，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南京主动提出，他说中共方面，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团成员问题，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人参加的传闻。吴忠信在蒋面前，表示坚决不干。

蒋说：“不干也好。”

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

蒋说：“这是值得考虑的。”但转而又说：“你恐怕是摆脱不了的。”

CC系的彭昭贤和“太子系”的钟天心，原在南京和谈代表的名单之列。但中共广播，说决不会接受像彭昭贤这样的代表。对此，蒋介石又说：“在东北籍的立、监委中遴选最好。”

三、关于党务问题。他们也谈得很多。蒋介石对张治中及吴忠信承认，国民党党务确实不振，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健全国民党组织，要作详细的研究。

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

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

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

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

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谈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

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再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您对中共怎样估计？”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

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時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

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理，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戮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譎，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譎”，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中共实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借此来企图吓唬住解放军过江。可惜毛泽东是个“专拣硬柿子吃”性格的人，决不会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时，毛泽东对待李宗仁是不会采取象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方法的，没有诸条反驳，不打嘴上官司，或许因为李不是对手，或许对李是一种争取，或许现在已无必要了，或许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总之，中共的态度，是谈要真谈，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谈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团成员一方面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接触，一方面与林彪、林伯渠、

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进行该谈，主要是想就战犯问题及渡江问题达成共识，中共早就宣布，无论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蒋、李最主要的梦想，就是解放军不过江。一个说只要过了江其它问题都好谈；一个说只要不过江，一切问题都好谈，很难取得一致，因此，原拟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谈判未能如期举行。

四、箭在弦上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周恩来：国共两党绝不是兄弟之争！刘伯承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士兵向军长发起挑战。刘伯承：气可鼓而不可泄！秦基伟：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保证第一个打过长江去！

4月13日，香山双清别墅。

一夜没睡的毛泽东，顺手关上桌上的台灯，起身走到窗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疲乏的筋骨，双目久久凝视着窗外蒙蒙亮的天空。

他的思绪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方……

这几天，和平谈判已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从南方发来的电报也明显增多，对因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问题甚感忧虑。

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

“每年农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

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

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恩来同志：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

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

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

“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

“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

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大狭隘一点，

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

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

“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

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1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

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

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

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竞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

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

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士兵和军长进行革命竞赛，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鼓动部队士气的效果。

淮海战役使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战后补充了大量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部队出发时，正赶上连续大雨，指战员冒着暴雨和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冷冷地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水湿的衣服紧裹住全身。连续的大雨，使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泥水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脚，有些地把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泥水里，有的成了泥人。

行动异常艰难，情绪格外高昂，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充满困难的行军途中，部队的宣传员用快板给大家鼓劲儿，有一首《胜利》快板这样唱道：

长江天险不可怕，毛主席早已有计划。蒋匪主力被消灭，剩些零星不顶打。长江水有几千里，他守住这里守不住那。咱们翻江倒海过江去，蒋匪统治一齐垮。解放江南老百姓，革命功臣人人夸。

还有一首《爱脚》的快板，诙谐生动，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

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第二万一起了泡，穿破、挤水、煤油调，千万莫把皮撕掉，宿营让我洗个澡，将来总结行军时，给我记一大功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军长秦基伟亲自下伙房做饭，并指导炊事员怎样才能把饭菜做得更好，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大不相同。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使北方来的战士听不懂，到处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沿途尽是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气候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部队就进入了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长期活动在这里，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弟兵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部队长期盘踞，给人种下了极端仇恨的种子，尤其是匪首张涂和他带领的匪徒，人民提起来无不咬牙切齿。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干线的联接点。经过国民党军队的长期蹂躏，城市冷落，商业萧条，墙壁上还残留着敌人暴政的遗迹：伪镇公所绘制的“生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等标语。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生下孩子给老蒋，打下粮食给保长，黎民百姓饿肚肠。”敌人强迫抓壮丁造成了许多悲剧。潢川第二区小流店村的青年农民胡胖子、吴庄材，不愿给蒋介石

当炮灰，都叫自己的母亲用菜刀砍断了右手。青年农民李成海为了逃避当兵，让妻子用针刺破了他的眼珠，变成了瞎子。

大别山是这个部队的诞生地。当年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第十二师师长，带领部队长期战斗在这个地方。在部队到达新城时，他回忆说：内战时他曾来过这里四次，并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过伤。当晚他住的房子，就是当年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

部队经过湖北和安徽交界地区时，必须越过高大险峻的唐家山。这给炮兵部队增加了巨大困难，指战员谨慎地在峻峭的山崖上行进，遇到牲口不易通过的道路时，便把大炮卸下来扛着走。为了不影响进军，副连长成祥瑞扛着 173 斤重的炮身走了一里多路，驮手于润流独自扛着 197 斤重的炮腰爬过了三里高的大山。有一次牲口摔伤不能走路，营长贾文先扛上 50 多斤重的炮前架，爬过了五里高的山峰。当炮兵部队愉快地唱着歌到达宿营地时，驻地群众非常惊奇，以无限钦敬的语气说：“你们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山呀？从前‘中央军，炮队死了好多牲口，几次都没有过得来呢！”

大别山对革命有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弟成千上万地涌进革命部队。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许多人经过千锤百炼，已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指挥员。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他的家乡在湖北省黄安县，当他还没长到枪高，只有 13 岁时，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九师秦赖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象第四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地区。

3 月 25 日，部队经过麻城北面一个叫大河铺的集镇，这里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的家乡。他怀着激动地心情回到了离别了 20 年的家乡，一进村，发现一切都变得不认识了：原来相当热闹的一座市镇，现在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他家里的房子已经变成废墟，父亲、哥哥、弟弟都被敌人杀害，只有 70 多岁的母亲侥幸活下来，以行乞为生。周希汉军长是湖北麻城人，他回到故乡后，竟找不出哪一堆长满荒草的败墙是自己的家门。李成芳军长是 16 岁离家出走当红军的，这次他率领部队恰巧经过他的家乡麻城李家河。部队走进村庄时，村里的人都挤在村口欢迎他。但他几乎一个人也认不得了，好半天才看见他的叔叔李清义。李老先生悲愤地对他说：“你走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了。1932 年 3 月饿死了你爹，7 月间又饿死了你娘，全村 16 家被遭害死了 54 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给白军拆了。……李成芳军长又跑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她的儿子和李军长一起参军，但早已牺牲了。屋里冷落得凄惨可怕，破烂不堪的四壁被烟熏得漆黑，挂着一条条雨水冲成的印痕，满地灰尘，满屋蛛网。应着他呼唤的声音，从草堆里站起一位瞎了眼的白发老婆，抱着李军长痛哭，半天才迸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了。成芳，快带队伍打过去，给我们报仇呀！”

大别山地区经历了种种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民对革命的坚贞不移的忠心。大别山人民以全力支援大军渡江南征。到处建立了支援前线司令部、供应站，日夜抢修公路，抢修桥梁，调集渡船。他们象当年爱护红军战士一样，准备了大批雨帽雨伞，到处搭起彩楼，设上茶水站，沿路欢迎大军的红旗，一直摆到江边。

第十五军取捷径，以战备姿态隐蔽出动，直出望江、宿松。历经 20 天，行程 1500 里，连克湖北省英山、罗田及安徽省太湖、望江四城，按预定计划在 3 月 27 日占领望江、华阳镇和宿松以东的老洲头一线江岸。在华阳镇及江字号滩头阵地，歼敌刘汝明部一个营；在老洲头，宿松保安团五百余人向我投降。军主力于 29 日进至太湖、望江地区，控制江北岸以华阳镇为中心的滩头阵地（包括长江及附近大小湖泊），掩护兵团主力展开于沿江北岸一线阵地，做好渡江准备工作。

第四兵团以第十三军为左纵队，第十四军为右纵队，则于 3 月 18 日到达光山、潢川地区待命。3 月 20 日，刘伯承命令第四兵团歼灭麻城、浠水、广济之敌，伪装南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态势，牵制敌人，以掩护第二野战军右侧背之安全，让野战军主力在安庆、望江段渡江。3 月 24 日，第十三军在麻城地区与敌一七六师之一部接触，经两天战斗，迫敌退至麻城西南之中馆驿，我军占领麻城。麻城战斗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直逼信阳南下的行动配合，迫使白崇禧将安庆夏威兵团的主力调于九江、武穴、一八八师从潜山、太湖西调黄梅。四野先遣兵团于 4 月 1 日占领信阳后，一部向麻城、宋埠、中馆驿推进。第四兵团 4 月 5 日由麻城推进，穿过湖北与安徽的边境，于 4 月 11 日到达宿松附近。兵团主力在宿松、黄梅地区集结。这一带全是丘陵地带。宿松城西南 40 多里有黄海湖。我军先头部队陆续进驻到黄梅湖沿岸，利用湖泊进行渡江训练。

4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半，刘伯承一行到达第十五军司令部驻地华阳镇。

事前接到通知，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早已在村口等待首长们的到来。

“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刘伯承来到军司令部，刚一坐下，便笑呵呵地问道。

“指战员的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只要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先遣军保证一举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秦基伟满怀信心地对刘伯承说道。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现在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但我们部队要做好一切立足打的准备，在这点上一定要给指战员讲清楚，名义上是蒋介石下野了，实际上还是他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当不了蒋介石的家，也当不了国民党的家，桂系的白崇禧也是顽固好战分子。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想搞南北朝，这也是痴心梦想。毛主席早已讲得清清楚楚，解放军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刘伯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们军是第二野战军的先遣军，担当首先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的艰巨任务，困难很多。第二野战军的大部队能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上岸，与你们军能否完成战斗任务密切相关。现在关键中的关键，是利用当前和谈的时机，认真做好准备，把渡江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想到，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现在部队有什么大的思想反映？”李达接着刘伯承的话问道。

“现在我们是胜利之师，”秦基伟一边给首长们的杯里斟着茶水，一边说道，“虽然 20 天走了 1500 余里，但部队的斗志仍很旺盛。因此，有的战士流露有轻敌思想，认为敌人是败兵之师，已不禁打了，为什么还和他们和

谈，干脆打过去算了。”

这时，刘伯承停住记录的笔，温和而严肃地说：“现在这个问题要注意，总前委来电，让我们对推迟过江的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

的重视，我们要向各级指战员讲明白，和国民党和谈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和谈，不管谈成谈不成，从处理国际或处理国内

问题的角度看，对我们党都是有利的。所以毛主席说，国共和谈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因为和谈，推迟了解放军渡江的时间，这也是政

治的需要。但这样可能使部队产生松劲儿情绪，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野司这几天准备把师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讲讲这个问题。”

接着，秦基伟等十五军的领导，把他们的作战准备工作，向野司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随后，刘伯承又请秦基伟等陪他到江边，视察和看望了正在练兵的部分部队。

野司的首长走后，第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又专门开会，进一步研究了野司首长的指示，讨论了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应该说，第十五军的渡江准备工作做得是比较充分的。

水上作战，对于十五军来说还是头一次。由于江河作战更加困难复杂，战前的准备工作要求更高。在部队出发前，刘邓首长就已告诉十五军的领导，渡江器材和渡江技术是准备工作的核心，要尽早准备，并指示要在4月11日前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准备15日开始渡江。

在十五军抵达江边的第二天，秦军长跟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到江边勘察地形。

华阳镇渡口一带，江面宽2000至3000米。我方纵深地势平坦，多沟渠，湖域宽阔，便于部队屯集渡江器材和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长河连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沙滩，便于登陆。敌人有两个控制滩头的制高点，左为黄山，右为香山。守敌是汤恩伯集团刘汝明部六十八军一四三师，位彭泽（不含）至茅林洲地段。牛矶、香口、灯塔东南无名高地及黄山，香山上有关集团工事。近岸有堑壕，水际有鹿砦等防御设施。两山鞍部为炮兵阵地，纵深未设防。据此看来，望江、华阳镇地区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出发地，香口至茅林洲段可预定为突击登陆地段。

为做好准备，十五军领导责成各师，建立了三种专门委员会。由侦察、保卫、敌工部门组成情报委员会，以动态观察、捕捉敌探、过江侦察或佯动侦察等手段，查明敌兵火力配置、活动规律、警戒程度；由作战、训练、通信部门组成战术研究委员会，搜集水文、气象资料，研究渡江战术，拟定作战方案，组织水上练兵和战术演习；由政治部、军械、后勤和民运部门组成后勤委员会，保障粮草军需，征集购置各种渡江器材，组织船工，收容伤员。另外，全军抽调300名干部，协同分区开辟建设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各级首长直接参与某一组织的领导。

江河作战，船是最基本的条件。敌人由江北南逃时，沿江北岸船只大都破坏或劫走，给我军造成极大困难。十五军到达江岸后，派出部队协同地方政府向群众宣传动员船只。沿江本有许多靠船为生的船家，因为国民党军队害怕解放军渡江，强迫把北岸的船只拉到南岸或毁掉，那时候，有的船家便悄悄地把船划出长江，在湖泊里装上沙土沉下去，以躲避蒋匪兵的迫害。如

今一听到我军渡江，便兴奋地自动把船捞起来加以修补；有些地方日夜不停地为部队建造新船。首先到达江边的十五军，在八天内，就筹集大小船只 443 只，渡江前共筹集大小船 748 只，组织训练水手 1400 人，一次可以载渡一万人。群众还同部队指战员一起，把民用船改造为战斗船。用土袋、湿棉被等加强了船只的防护能力，增桨加橹以提高船行速度，利用竹、木、稻草制成救生圈，准备棉花、桐油、石灰等以备堵补弹孔。为了便利伪装，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涂抹船身、帆篷，使水船一色。

4 月初，部队开始集中水上练兵。按兵种，作战任务分别进行。突击人员着重进行上下船的队形动作、水上射击和攻占滩头阵地的战术技术训练。江中队形，一般以指挥船为中心，保持一定队形。基本要求是：按指定的登陆点，各船用最快速度，直奔敌岸，所有船只应向最前面的船看齐，自然形成不规则的队形。各渡船靠岸后，主动互相配合消灭当面之敌，尔后向中心合击，夺取预定目标。渡江的后续梯队和预备队，则着重山地、河川、水田战斗的战术技术训练。

部队水上练兵，历尽艰辛。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尽管在找船时，各师就通过组织干部战士“谈水”、“看水”、“试水”，初步打消了大家的畏水情绪，但要从“陆上虎”变成“水上蚊”并非易事。战士们乘船在大浪滔天的湖上兜一圈，五脏六腑都得翻过来，呕得昏天黑地。经过一段紧张的水上练习，大部分人学会了摇橹划桨，一部分人学会了掌舵和撑帆。许多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都变成了水手。部队的各种人员也都结合自己的任务进行训练。卫生员演习水上抢救，3 分钟可以把伤员从离船 100 米处运到船上；电话员演习水上架线；通讯员也演习水上送信。……

在部队准备渡江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而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夜里，薄雾弥漫着江面，东风飞卷着浪潮。正在江北岸放警戒哨的一个侦察员，忽然发现江面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顺着急流漂近岸来。侦察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捆芦苇，上面还紧紧地趴着一个人。侦察员用力把这人从水里拉上岸来。只见他光着身子，穿条短裤，冻得直发抖。只听他断断续续地问道：“你是解放军

同志吗？”当侦察员回答他正是解放军时，这人“哎呀”一声，抓住侦察员的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可找到你们啦！”

这人连忙从嘴里取出一只手指粗的瓶子，交给了侦察员。只见

瓶口用蜡密密实地封着，里面卷放着一封江南人民请求解放军赶快打过长江去的信，和一幅标着南岸国民党匪军布防情况的地图。

地图上和信上的字特别小，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送信人是借着夜色的掩护，巧妙躲过敌人的岗哨，来到江边的。

面对白茫茫的江水，送信人把小瓶放在嘴里，顺手拖起一捆芦苇，

跳进江，朝北岸慢慢地游了过来。他刚游到江心，风紧浪大，芦苇直在江心里打转转，一阵阵浪花把他卷下去一次又一次，他挣扎着。

从天黑 6 点钟开始下水，一直漂到早晨 3 点多钟，整整和狂风恶浪搏斗了九个多钟头。凭借着“要死死在江北，信和地图一定要送到解放军手里”的信念，终于到达了北岸。

这位勇敢的江南人民使者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所有见到和听到的人。战士们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立下誓言：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 月 16 日下午，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当李宗仁接到黄绍竑将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的消息时，便急电召白崇禧等人来商量对策。

黄绍竑一飞到京；李宗仁便命人将他接到傅厚岗六十九号官邸，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黄绍竑从皮包里取出文件交给李宗仁，并加以说明道：“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更改的定案，签字日期定在20日，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无论政府签字与否，他们都要渡江。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李宗仁把文件草草地看了看就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拿过文件，在文件上急速地搜寻着什么。文件本来就不长，他很快也读完

“真难为你啦，像这样的条件居然也带得回来！”

白崇禧看完，把《国内和平协定》往茶几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道。黄绍竑忍着气，看了看李宗仁说道：

“像这样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承认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中共是作了让步的，我方提出修改意见四十多处，共方接受了半数以上。”

“接受什么了，”白崇禧拍案而起，冲着黄绍竑吼道，“我的条件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共军不能过江！”

黄绍竑鼻子哼了一下，冷冷地说道：“这办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把话讲死了：不管南京当局在这个协定上签不签字、共军都要过江。”

“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说罢，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李宗仁一声不响地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会议不欢而散。

白崇禧的态度，黄绍竑回南京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说李宗仁倡和还有点和平的真心的话，而白崇禧倡和则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抵抗到底，他心目中答应共产党的和谈条件的核心是不准共军过江。并且随着国共和谈的正式交涉，共军一定要过江的消息不断从北平传到南京，他的思想和蒋介石越来越靠拢。前几天，他曾给第三兵团司令官张金发过一封密电，说：

“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说服白崇禧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可能性不大，黄绍竑寄希望于李宗仁。虽然白崇禧在桂系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从以往的历史看，在有些问题上，只要是李宗仁一定要坚持的，白崇禧尽管不情愿也是会听的。例如1930年，桂系联合冯、阎欲取中原而进攻武汉，但因黄绍竑所部动作迟缓，贻误战机，使桂系遭到惨败。回桂后，白崇禧、张发奎坚决要清算黄绍竑而李宗仁坚持不让，白也从了李宗仁。后来黄绍竑投蒋，白崇禧对之恨得咬牙切齿，而李宗仁挡住白崇禧对黄的发难，送给黄一大笔路费，并和白崇禧一道盛宴为黄饯行。所以黄绍竑认为，说服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还是有可能的，只有李宗仁在协定上签了字，白崇禧岂能和李宗仁闹翻不成！

白崇禧走后，黄绍竑向李宗仁问道：“德公，你觉得这个协定如何？”

李宗仁长吁一声，说：“我们是斗败的凤凰，还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底消灭我们，得势不让人哪！”李宗仁从茶几上

捡起《国内和平协定》，一边翻着，一边继续说：“这个协定够苛刻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虽然现在失败了，但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不好让人接受。”

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

“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

“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

在逼蒋之际，李宗仁似乎是胸有大志，但现在已是心灰意冷，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事还是让老蒋定夺吧。”

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汇报。

蒋介石看了协定，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我要处置他们，一定要处置他们！”说完，竟把协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最后，打的意见逐渐成为会议的主调。

为了拖延时间，南京在18日广播说：对和谈条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问题尚在考虑。又谓黄绍竑因血压高，不及于4月20日前返北平云云。

桂系范围内讨论不出名堂，而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当意见，在张群到溪口以后，他立即让蒋经国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去电，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应付的措施。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对和平协定作最后的决定。

会议一直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几位部长，另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白崇禧令不知者纳闷：他没有参加这个他应该参加的会议。

在会上，吴铁城嗓门最大，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他说：

“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讨论的那个和谈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作主张，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既然这样被共军吃掉，还不如一打到底，即使那样彻底败了倒也痛快。”

中常委们不管是主张打也好，或是主张和也好，但有一点他们的感觉是共同的，这就是国民党已近灭亡。不知是出于他们对党国的感情，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不知谁在会上首先哭泣出声，引得会上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如丧考妣，好不悲伤凄凉。

作为会议主持，是得拿出意见的，何应钦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总结性地说道：

“两日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原来中常委和谈声明的。但从北平拿回的协定，与中常委和谈声明的原则相差甚远。共方协定的前言，皆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

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做法。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共有四次大的和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失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个协定中看不出共产党的宽阔胸襟来，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好，否则何至于此？签不签这个协定，我们都是一个死。我的意见，不能签这个协定。”话说完了，何应钦才觉得还有个代总统存在，又补充了一句：“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这时李宗仁听到“总统”的称呼，一点儿也没有刚上任时荣耀了，像立时受了极大屈辱而又不能反抗似的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他说道：“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一战到底，怎么办都行。”

4月18日，南京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调，并表示：倘不能实现原定的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发布了宣传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此时的蒋介石，则一反几个月来的抑郁情态，又像松缓了一段时的弹簧一样，倏地跳了起来。他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让前方各将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和共产党最后一拼：

“令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守住长江，保住西南……坚决抵挡住共军的进攻！”

“令孙立人，加速编练新兵……”

和谈彻底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一场新的恶战已在眼前！

五、风雨下钟山

4月21日，百万大军开始实施渡江战役。一千多里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数万条船铺天盖地向江南岸冲杀而去！

南岸凶狠抵抗。四班18个突击队员17人伤亡。一

九团“渡江杀敌第一功！”

“追云号”飞机慢慢升上天空。飞机上一位长着国字脸型的中年男人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的进军命令，通过收音机，通过扩音器，通过油印的报纸和传单，迅速传遍长江前线的阵地，传遍长江北岸的村镇，在全体指战员间引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4月21日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命令，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120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四万人，敌纵深地区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置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我第四兵团当面的守敌是刘汝明的六十八军，战斗力较弱，防御正面宽达百余公里。其一一九师防守湖口至彭泽段，一四三师防守马垵至毛林洲段，八十一师防守毛林洲至东流段。由于防线太长，兵力不足，企图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交叉火力网式的防御体系，并以舰船巡逻江面。

第四兵团根据野司命令，作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

十五军为四兵团第一梯队，任务是：突破香口、茅林洲段之敌人江防，占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尔后向至德方向发展。左邻为五兵团十六军，向东流方向突击，右邻为本兵团十四军，在彭泽、马垵间突破；十四军为四兵团第二梯队，随十五军之后跟渡。

敌判断我们从华阳渡口入江，人的划力加水的流速，船只只能在灯塔以东靠岸，遂把江防重点摆在灯塔以东，火器配备密集，沿江布设鹿砦，灯塔附近，特别是灯塔以西礁石参差，岸崖陡峭，不便上陆，敌未作防范。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为攻敌出其不意，决定把主突出点选在不便登陆的灯塔、香山、香隅附近。一来这里是敌一四三师的右侧翼，也是该师四二九团两个营的结合部，利于部队撕开口子；二来从此处突击，可避免长时间在敌炮火下作横向运动；三是部队上岸后可径取香山，断敌退路，打乱敌部署，保障向纵深发展进攻。灯塔东南虽有一个敌防御支撑点，但面积不大，部队可集中炮火予以摧毁。为贯彻上述决心，四十四师一三二团二营的出发位置选在目标上游两公里之江字号，以保证顺流取灯塔。后来的事实证明，刚好打了敌人一个空当。敌四二九团副团长被俘后供称，对部队出此奇兵，他们始料未及，侧背一告急，全线不敢恋战，遂即瓦解。

东路军在华阳、香口之线的强渡战斗，是陈赓兵团的主攻方向。

在长江北岸华阳镇及周围的江边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大炮。

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部，设在华阳镇“江字号”滩头东北江堤上一个简单的工事里，前面是奔流的江水，右边紧靠水沟。水沟连接湖。此时，从江边到湖心，在长达六公里的水面上，密排着伪装成银灰色的船只，等待着战斗号令。

接受了渡江突击任务的一三团，20日夜里准备了一个通宵。

在北岸的江堤上，稻田旁，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愉快紧张地检查着各种武器，包扎着炸药包。隔江望去，南岸阵地上矗立着高高的灯塔，两侧两个大地堡，左面大红土堆是敌人的集团工事。灯塔后面是刘汝明部的营指挥所，向左右伸出了弯弯曲曲的交通沟，沟前突出无数的机枪掩体和暗堡群，指挥所背靠两个山包——香山和黄山，山腰一条红土线，是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敌人狂妄地认为：天险长江加上重重工事，定会阻止我军前进。

4月21日中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突击部队和炮兵营以上干部，召集到指挥所，又作紧急动员，亲自把军党委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授给两个突击团，并要求指战员：不顾疲劳，奋勇前进，再接再厉，功上加功，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完成突破长江的光荣任务。

十五军的一三团第三连，被指定为渡江突击连，听到进军命令，指导员拿着上级授予的红旗，严肃地向全连战士和船工们宣布：“这红旗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一个坚决的命令，要我们今晚插到江南去！这个任务是我连多次请求才争来的，上级相信我们，关心我们，这是我们全连的光荣！”

4月21日下午15时整，这个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果断地命令：

开炮！

试射开始了，全线几十门重炮都瞄准一个目标，炮弹全都落在长江对岸香山脚下的灯塔附近。炮手何明远因手势过重，炮弹在超越目标五米的黄土堆附近爆炸了，另一位炮手马德云，立即修正了五个米位。但第二发弹又没打中灯塔，落在了敌人灯塔旁边的工地上。马德云又向左修正了一下。第三发炮弹发出，对岸敌人的灯塔立即冒起一团白烟，灯塔应声倒地。灯塔被打中了，象一支火把一样燃烧起来。站在北岸堤上的指战员，立刻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打得好，打得好，把敌人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上级给炮连记功的命令，跟着就传遍了整个阵地。

16时45分，炮兵进行效力射。经过试射，摸清了敌人的炮兵位置。炮兵营周文渊副营长根据敌炮的速度和方向判断，判定敌人的炮兵位置一定在敌观察所后面200米处的公路旁。于是把炮都集中2400上，一道命令齐发射，一排炮弹同时飞向对岸黄土山后面，紧接着第二个排射又飞向原来的弹着点，两排齐射，把敌人黄山后面的炮阵地一举摧毁。秦军长亲自打电话给炮兵营长赵军：给该营全体同志记功，并再三叮嘱：“你们打得好啊！整个部队都很兴奋，大家战斗信心更足了。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火力，消灭一切渡江障碍。”

天逐渐黑下来，突击部队的勇士们扛着军、师、团授给他们的红旗，迎着微风登上泊在湖边船上，随后，大小船只全部冲出水沟，沿着长江北岸堤一字排开。江风紧吹，江水滔滔，船桅如林，群帆如画，十分壮观。

19时30分，突击部队全都到达华阳镇进攻出发地位，炮兵开始压制射击。

23时，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四十四师的突击部队利用有利的天气变化，第一梯队数百只大小船只，象一只只离弦的箭，一齐向江南岸出发。

一三团第二营，由“江字号”进攻出发地直指灯塔以西，第二营由长沙口直出灯塔以东；第一三一团第一营向土矶滩前进。此时，数百条战船，漫天盖地的向江心疾驶。各级指挥员的灯，红红绿绿，在船尾闪闪发光，好象夜空的群星闪耀。

当突击队驶到江心时，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几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敌人发现了突击队，接着就射来猛烈的炮火，掀起冲天的水柱。有的战船中弹引起大火，有的船被打沉了，落水的同志不等救护船赶来，就拿着武器奋力向南岸游去。这时，突击船对敌展开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强大炮火也开始了摧毁性的压制射击。此时整个江面硝烟弥漫，不计其数的大小战船喷吐着火舌，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飞速疾进。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大家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真英雄真好汉，就在长江南岸见！”喊声震天，相互鼓舞彼此声援。

一营三连指导员高声喊道：“咱们是模范连，从来没有落过后，大家要争取更大的荣誉，真英雄好汉快把船开快！”

指导员的喊声未落，突然这条船的老船工王彦先腿部中弹，倒在舵旁，战船陡然调转方向。指导员连忙伸手抓住船舵。卫生员急忙挤过来给王老汉包扎。战士张国正把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往背后一推，从指导员手中抓过船舵，大声向全船的同志们喊道：“我保证咱们这只船掉不了队，走不错方向。保证第一个靠到南岸，就是负了伤，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光说不算，江南检查！”

这时，受伤的王彦先老大爷却颤巍巍地挣扎着站了起来，要张国正把舵交给他。敌人的枪弹打得江水飞溅，大家都劝王大爷赶快坐下。他却又抄起一只桨，插到右舷划起来。右翼侧射的火力很猛，船帮上不断飞起碎木片。指导员抓起一条湿棉被披在老大爷的身上。这时没有任何人下命令，船头上的战士唰地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为老船工遮挡密集的子弹，突然一道闪光，船身猛烈一颤，船上的桅杆被拦腰打断了。桅杆连同风帆，一下子倒进浪滔汹涌的江水里。而另一头的绳索却还系在船上，江水从左舷涌进来。张国正机警地把住舵，船身才算平稳下来，但船舱里已进了半槽水，船头用沙袋垒的机枪工事也滑进江里去了。老船工王彦先，叫拿斧子赶快砍断绳子，船身才算又平稳下来。

船已失掉帆，便不能控制方向。指导员和战士们都万分着急。纷纷拿起木棍、铁锹、洋镐、木板以及所有可以划水的东西，用来划水拨船，船继续向前疾驶着。

对岸突然出现一股火舌，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浪，燃起一尺多高的黑红色的火焰。两三分钟工夫，方圆四五十米的江面上，变成一片通红，堵住了战船的水路。指导员焦急地注视着对岸，观察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是在靠滩头的那个地堡里，左右都有机枪阵地，后边还有一挺机关炮在不停地射击。指导反命令船上的轻重机枪、特等射手一齐向火焰喷射器手还击。恰好，这时我们的大炮也朝这个方向打来，友邻各船的火力也向这里压来。但是残留的火焰仍在燃烧，船身一接近，就烤得人们脸上发痛。

船上的战士一个个英勇无比。机枪班的战士们端着枪站在船头扫射，所有的伤员都在坚持战斗。

张国正此时也负了重伤，他一面用负了伤的左臂把舵柄紧紧夹在腋下，吃力地支撑着；一面用右手拿着挂在脖子上的汤姆枪射击。

对岸的敌人已经注意到了这只突出在前面的船。附近四个地堡和红土堆两个地堡的八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密集的子弹一齐向这条船“盖”来，船被打漏了。战士们赶紧拿麻袋堵，用油泥塞。战士们全力摇橹，眼看滩头在望。

这时，指导员大声命令：“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

老船工王彦先把长褂往腰里一塞，站立起来，和张国正一起调整船头。

突然，一个沉甸甸的东西落到了船板上，指导员一看，是个美式手榴弹，伸手抓住又把它仍回了岸上。

距离岸上只有三十几米了，船身忽然一震，搁浅了。二排长见状大声喊道：“水手下水拉船！”随后纵身先跳进了江水里。他露出半截身子，一面端着卡宾枪射击，一面大声喊道：“指导员，红旗！”

指导员听见喊声，立即把红旗交给四班长高玉声说：“快下！江南、江北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呢！”

四班长接过红旗，大声向指导员保证：“请指导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右手抓着一束手榴弹，左手举着红旗，转身跃进江中。四班的战士也一个个跟着跳入江中。指导员指挥着六班和轻重机枪掩护，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前进着。

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指导员的身上。原来是张国正，鲜血从他的右臂上缠着的绑带里渗出来，军衣的前胸全烂了。

张国正望着指导员说：“我完成任务了吗？”

渡江前夕，张国正向党支部交出了入党申请书，决心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并且在突击队员的提名录上，写下英雄的壮语：“我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打过长江去！我只有一个要求，完成任务牺牲后，在支部大会上批准我入党，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我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指导员说：“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张国正听罢，拼力喊了一声，“同志们！上啊……”便闭上了眼睛。

江边的枪声和喊杀声交织着，指导员领着六班和机枪班，跟着四班，涉过一片稀烂的泥浆，迅速登上南岸，冒着枪林弹雨，直向敌军的心脏冲杀过去。

第六连的任务是攻占灯塔。这个连的突击队是38名勇士，分成三个突击班。第二班爆破占领滩头阵地，第三班迂回灯塔小路，第一班插入敌人纵深。

六连的船刚到江心，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许多战士被打伤，站在船尾的舵手也负了伤。

连长这时一边亲自掌着舵，一边向战士们喊道：“胜利就在今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正在摇橹的战士史国荣应声喊道：“渡江立功，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要第一个登陆，第一个爆破地堡，第一个上灯塔！”

这时，又有一颗炮弹在船尾爆炸了，通讯员和司号员负了伤，连长罗金印的头部，被弹片划开了二指长的口子，血从头上流到面颊、颈上，袄领上被血浸湿了一片，但他仍然高高地站着，紧握着舵，指挥着航向。

二班副高玉生也挂了彩，他顾不得伤痛，高喊着，和战士史国荣等六七个人一起，紧紧抓住两只橹，拼着全身的力气使劲摇。战士们拿着木板，划

水，有的用钢盔划水以增加船的速度。

敌人又向空中发射了四五颗照明弹，空中一片通红，战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的枪炮一齐向他们射来，子弹打在船头的铁锚上直冒火星。

一颗炮弹落进中舱，第三班七个人伤亡了六个，船在水中直打转。敌人的猛烈扫射，穿透了船板；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进后舱，第二班的班长和三个组长都挂了彩，只有三个新战士没有负伤。

敌人的弹流如雨，江水不住地从洞穿的船板舱里往里灌，情况十分危急。连长罗金印血流满面，仍然镇定地站在船尾掌舵，坚决命令：“发扬硬骨头精神，加快速度靠岸。”全船25个伤员，轻伤的自己包扎住伤口，再替重伤的包扎起来，没有一个喊痛，没有一个人惊慌。

第一班长李长泰见二班伤亡大，请求代替二班担负爆破任务。忍着伤痛，正在摇橹的二班副高玉生抢先说道：“不，那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一颗炸弹，也要完成任务，死也要死在灯塔上！”双腿受了重伤的二班班长王顺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从嘴唇里迸出一句话：“一步……一步爬，也要……爬到灯塔。”

船从灯塔右面靠岸，正对着敌人的火力点。雨更大，天更黑，敌人集中人力封锁渡口，六、七处地堡里冒着红火，子弹在指战员的身边乱窜。

船终于靠岸了，二班副高玉生第一个跳上岸，打了一颗手榴弹，直扑到敌人的哨棚里。二班战士潘福兴、苏臣、宋天学跟上去，顺着敌人的枪眼塞进去两个炸药包，大地堡被炸得飞向了空中，敌人吓得顺着交通沟逃跑。跟着又扫过去一阵机枪，在集团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一班班长李长泰，右胳膊被打断了，左手拿着手榴弹，大背枪，身影在火光中一闪，也冲了上去。当他向灯塔冲去时，连长罗金印率领史国荣等战士，已经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灯塔上。

在六连突击船上的勇士们争先恐后登陆的时候，五连三排的突击船正开到离岸30米处。对面是两个敌人的大地堡，机枪的弹雨迎头泻过来。七班副邢松山奋不顾身地扑进江中，战士周庆兴紧跟着也跳下了船。两人迅速涉水到江岸，岸边滑溜站不住脚，邢松山连爬三次都跌了下来。周庆兴着了急。拿不下当面两个大地堡，后续部队就很难靠岸。他连忙攀着荒草爬到敌人交通壕跟前，雨大泥滑，他一下子跌进了敌人的工事里。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四个敌人冲出地堡扑上来，头一个敌人按住他，在地上扭成一团。周庆兴抱着同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毫不犹豫地拉断了手雷和的导火线，朝着旁边的三个敌人甩过去。“轰”的一声，三个敌人被炸飞了，剩下的这个敌人从地上爬起来就跑，周庆兴又扔了一个手榴弹，立即跟着追了出去。

七班副已经带着突击战士赶了上来，他们冒着大雨冲击，与第二排突击队拿下灯塔右面敌人的一串碉堡，和山顶上的大碉堡。

五连一排长崔元德，带领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单独由香口东500米处登陆，穿过敌人的火力网，插入敌人纵深，坚决勇敢地攻上香山，威胁敌人的侧背，积极协助第十连抢占了香山与黄山鞍部敌炮兵阵地，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第七连一排长王世英，渡江前已病了好久，半边脸肿着，又患重感冒，腿上还长着疮，虽已三天多没吃饭，仍然坚决要求率领突击队渡江。

战船离开江岸后，船头摆有两挺机关枪，王世英站在中间，一面指挥船只前进，一面高呼口号鼓励大家。当船到达距离南岸10多米时，船碰上石头被搁浅。对岸三个地堡里的机枪构成交叉火力，一齐对着船猛烈扫射，几个

同志接连负了伤。情况十分危急。船在这里稍一停顿，就会造成很大伤亡。王世英虽然带着病，又不会游泳，但他拿起绳子往腰里一捆，勇敢跃入水中。大家关切地喊着他，他却头也不回，猛扑向前，把船猛拖到江边。王世英又急忙爬上岸，双手紧抱住一块大石头，高声喊道：“大家赶快冲上岸！”突击第一组迅速下了船，把正面大地堡的敌人消灭了。他又架起跳板，其他突击组相继冲上了岸，消灭了左右两面的大地堡。

四十四师另一个模范连一三一的第三连，临出动前，连长周九景仍然不放心，又把班长以上干部召集在一起，一个一个地问道：“准备好了没有？任务弄清了没有？”“负伤也要上到江南岸，坚决完成任务！”

三连分乘三条战船，一、二排的船，并排走在前头，三排在后面成梯形。

周九景连长坐在船头，凝视着江中的一条黑线，黑线正中有一个最高点，就是南岸的黄山头。战士们奋力划着。

船刚到江心，就被敌人发觉了，炮弹打过来，空中亮起照明弹，紧跟而来的是敌人的重炮轰鸣。我军的数十门大炮立即回击，炮弹怒吼着从头顶飞到对岸，敌人的滩头阵地霎时就被硝烟吞没了。船工倒下了，战士们接过来；头一个负伤了，第二个又跑到船头上。机枪连二班三只桨都被打折了，战士们用铁锹拨水。船被打漏了，战士们就把屁股坐到漏洞上，船开到离岸不到50米的地方，一颗炮弹正落在船头上，江水翻起一阵浪花，船被冲回江中。敌人地堡里的火力也喷射过来，炸弹和枪弹不停地在船前船后爆炸。

四班的船共有突击队员18个和两个船工，有17个负了伤。江水不断向船里流，机枪也出了故障。班长杨德道沉着地鼓舞着大家：“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他用汤姆式枪掩护着负伤的张玉富掏水，其余负伤的同志一齐摇着桨。一发炮弹又把船尾炸碎了，杨德道也负了伤，船里灌满了水，眼看着就要沉没。岸上的敌人看见了，喊叫着要他们缴枪。杨德道愤怒地端起枪射击，跳下水去，手也扒，脚也蹬，奋力涌上岸，还救出赵成章、赵连芝两个重伤员。五班、二班的突击队也飞快地登上了岸。二班机枪手王天才端着机枪扫射着冲锋。五班长王玉魁的重机枪封锁住右翼的大地堡。连长周九景一连扔了三颗手榴弹，都在地堡跟前爆炸了。敌人四处逃命，战士们迅速控制了滩头阵地。

经过30分钟紧张激烈的战斗，突击部队的大部船只于21日23时50分前靠了岸。炮兵部队适时地支援部队冲击，并拦阻敌第二梯队反冲击，保证了步兵顺利登陆。象潮水般登上南岸的突击队，宛如无数支锋利的尖刀，四面八方一齐楔入敌人的纵深。敌人被割裂了，没命的溃逃。在交通壕里，在山岗上，敌人遗弃的尸体、步枪、军服、大米，还有穿不及的棉裤，带不走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各个突击队从不同的方向同心合击，迅速占领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旗，插到了山顶上。

按照兵团首长的预定作战方案，第十二军为右纵队，在八保洲强渡，其突击师首先攻占彭泽、马垱间沿江登陆场，控制彭泽东北高地；四十一师（归十二军指挥）附山炮、战防炮一部，控制三号洲，阻击九江敌舰东援。

八保洲、小孤山守敌系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一四三师各一部。敌一四三师一个营及望江县保安团据守江心八保洲，以一一九师一个加强排防守小孤山。在八保洲及沿江南岸山麓，敌人筑有交通壕及地碉防御体系，马垱是敌舰停泊点。敌在兵力不足情况下，以浅近纵深的一线配置，企图依托长江

天堑，以南岸低层阵地与各制高点和机动舰艇构成拦阻线，封锁江面，阻我渡江。

战役开始前，十三军突击队的100多条船，大部分掩蔽在龙湖和内河里，距起渡点600多米，中间隔着高大宽阔的江堤。一九团三营挖开了一条长达600多米、宽五米、深四米的引河。为防止敌人发觉，暂未将江堤劈开，只是在下面挖了一个拱形大洞。直到20日夜间，才劈开江堤，挖通引河，将100多只木船拖进江水，在突击营的起渡点杨家墩一字儿排开。

副军长陈康、三十七师副师长赵华青，最后视察了炮兵阵地、渡江船只、起渡地区和突击营的准备工作，赵华青给突击队员作了临战动员。21日凌晨1时，月色朦胧，江水汹涌，突击队员们个个英姿焕发地蹲在战船上。每只船上都有一个指挥员、一挺机关枪、两个机枪手、三个水手和船工，十几个战士。突击营长刘泽先、教导员陈占楼、副营长黎云龙、副教导员王吉友，各自站在自己的指挥船上。与此同时，在一九团的炮兵阵地上，由20门山炮、八二迫击炮和12挺重机枪组成火力队，分别瞄准了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五个土木结构的地堡等射击目标。顾永武把指挥全团的重担交给赵华青，自己带着几个随行人员乘一只木船，参加到一营的突击船队中。

1时40分，一声令下，突击船队齐向八宝洲敌滩头阵地冲去。

船队在距敌滩头300米时，被敌发觉，立时炮弹和机枪子弹向突击船队射来。同时，北岸的我军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也一股脑儿洒向敌人阵地，第一排齐射的炮弹，准确地摧毁了突出在敌滩头阵地前沿的一个大地堡。紧接着又一个齐射，打塌了两个土木结构的敌碉堡，将守敌埋在了地碉里。齐头并进的二、三连的船头上，数十挺机枪也同时向敌阵地猛烈扫射。顿时，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主要火力点，几乎全部被我军的火力消灭或被封锁。只剩下两个隐蔽的地堡、几个单人掩体和一段不到60公尺长的战壕仍在进行抵抗。

顾永武坐的指挥船，紧跟在二、三连的船队之后。风帆下，只见滔滔江水之中，船桅如林，飞弹似雨。八号船的舵手负了伤，水手张志有，立即把舵柄握牢，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拼命地摇桨。

敌我火力交织，在敌人滩头阵地的江面上、一片火海，火光把江水、人面、江岸都映得通红。

冲过1200米宽的江面，突击队仅用了15分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在八宝洲上空升起。

第一批登上敌人八宝洲阵地的突击队员，是二连连长张宝珍、指导员赵小祥带领的二、三排。二连登岸后，遭到敌人隐蔽火力的扫射，几个战士牺牲了，两名班长负了伤。但他们不顾一切的猛打猛冲，迅速消灭了顽抗之敌，抓了20多个俘虏。三连三排的突击队员进展比较顺利，由于前面的敌人火力已被我炮火消灭，所以他们一上岸后，仅在登陆点留下几个战士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其他大部则越过已被摧毁的敌人地堡，越过沙滩，涉过一段杂草丛生的沼泽地，直向敌人的纵深扑去。

凌晨2时，一连连长张合芝率领的突击队员也登上了岸。九班长曹福琴扑到一个敌人的重机枪地堡前，把手榴弹塞进去，地堡里的敌射手和弹药手立即上了西天。六班长王有顺，冲进右侧敌人的另一个重机枪地堡，抓住了滚烫的机枪筒，同敌人扭打起来，最后把敌人消灭。

在第一突击营攻占八宝洲敌人主阵地的同时，突击二营和突击三营，从

左、右两侧迅速前进，消灭残敌。第二营向复往洲右前方的张升洲方向发展。七连连长秦三须、指导员王庆和率领战士们搜索前进，先后捕获了30多个溃散的敌兵，敌人的望江保安团早已逃之夭夭。第三突击营在营长郭学文、教导员张云成率领下，很快地推进到鳞字号洲上去。五连副连长李安锁带领二排的突击队，率先登上这个小洲，在一道弯弯曲曲的堑壕前，遇到一群抵抗的顽敌。战斗英雄王引生带头冲上去，连扔了三个手榴弹，后面的几个战士扑进敌堑壕，活捉了一个副连长和40多敌兵。至此，八宝洲敌阵地全部被一九团占领。

八宝洲之战，一九团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第四兵团党委授予了“渡江杀敌第一功”的锦旗。

西自香山，东至矛林洲，蜿蜒20里的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到处是炸药包突破的废墟，到处飞起各色的信号弹，到处吹响胜利的号角，到处传出胜利的欢笑。几百只战船，数千名勇士，战胜了困难，越过天险，打破了神话，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到4月21日晚20时，第二野战军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到23日，二野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二野和三野在千里江面上同时平行横渡，使敌人防不胜防。数处突破，全线震撼。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乃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

从22日晚起，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的三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祁门、石埭（今石台）溃逃。安庆守敌一七四师也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歼于吴田铺地区。解放军乘胜进占青阳、高埕、至德（今东至）一线马垵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三野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李宗仁从少年习武开始，戎马数十载，转战多半中国，护法立战功，统一广西，北伐显神威，尤其是台儿庄大捷，更使他扬名中外。但他和共产党打仗，却显得力不从心。千里长江防线，号称天堑隔阻，但一夜之间全线崩溃。当然，这也实在难以怪他。

蒋介石被迫“下野”，关于江防的计划也带回了溪口。

1月25日，蒋介石把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心腹军事将领秘召溪口，召开“轻型”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下野”、李代总统上任的新的形势变化，制定具体的江防部署。

经过几个人研究，最后决定：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以湖口为界线，湖口以东归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45万人。湖口

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 40 个师，约 25 万人。这 25 万人当中，部分是蒋系，大部是桂系。会后，蒋介石专门派人把湖口以西的决定，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把湖口以东的作战部署，秘不示人，尤其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密。

蒋介石的京沪作战方针意图很明显，就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待机进行反攻。

蒋介石把李宗仁当猴耍，让共军消灭白崇禧，使代总统作丧失京城的罪人。李宗仁一上台，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共军和谈，以求不动刀枪而保住南中国半壁江山；一方面积极进行长江布防。岂知，这边李宗仁让国防部拨款修建南京的防御工事，那边汤恩伯却正在秘密地拆运江宁要塞的大炮，运往上海。

汤恩伯按照蒋的指示，制定了如下长江防御指导要领：

一、敌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部队，由镇江沿江公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二、敌如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绥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绥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三、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四、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童、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源、黟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滨、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

五、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墟、棕阳等地之阻塞。

对于蒋介石的长江布防方案，国民党中，凡不足装糊涂的都会明白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在一次国防作战会议上，因对此计划不满，和汤恩伯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汤恩伯一语重千钧，使蔡文治听了连大气都不敢再出。当时，汤恩伯满脸怒气，嘶吼道：“我只知道服从总裁的命令，你再敢多言，我枪毙了你！”

整个长江防线，共 115 个师 70 万人，在湖口以东，兵力稍强，平均每华里 300 人。在湖口以西，每华里不足 100 人。国民党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竟如此空虚，就是诸葛亮再世，恐怕也无计可施。

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江南敌军人心涣散，厌战情绪严重，对和谈抱有希望，从将军到士兵，备战废弛，昼夜寻欢作乐，解放军还没有开始打，都已作好了逃的准备，这样的军队焉有不败之理？

当渡江战役开始后，李宗仁赶紧给白崇禧打电话，商量对策。白崇禧向李宗仁献策道：“眼下，南京是守不住了，上海方向我们不能去。我的意见，为了保全两广和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意见深表赞赏，但又担心蒋介石从中作梗，使计划难

以实现。

白崇禧又对李宗仁说：“和他摊牌！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天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

李宗仁觉得，白崇禧的话虽难听，但也指到了他的疼处。即使是个代总统，当时也够窝囊，自己确实太软弱了，既然老蒋下了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不然，自己不但当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

经白崇禧这么一鼓捣，李宗仁长了精神，以少有的口气对白说道：“我不能做林子超，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蒋摊牌！”

4月22日清晨，在隆隆炮声中，李宗仁、白崇禧一同飞抵杭州，和蒋介石摊牌。

此时，蒋介石住在杭州宽桥航校。

这是蒋介石自1月21日下野以来和李宗仁的第一次会面。

李宗仁还没到蒋介石的住处，蒋已在住处门口欢迎客人了。

两人虽仅隔三个月没见面，但都觉得对方在三个月里变化很大。老蒋脸上颧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李宗仁那平素饱满的国字脸，现在瘦得棱角分明。

从南京和李宗仁一同来杭州的，除了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

当李宗仁一行来到会客厅以后，蒋介石与大家稍事寒暄，就领着李宗仁来到会客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闭门秘谈。

李宗仁牢记他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因此，来到小屋，一坐下来就说道：

“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有何见教？”

“德邻兄，”蒋介石诚挚地笑着说，“南京失守，我以为没关系的，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你要继续领导下去，不必灰心，我支持你的。”

蒋介石很清楚，现在局势一片混乱，上海命运难卜，台湾尚未部置好，上海的金银财宝还正在抢运，现在他还得在幕后观风向，等机会，李宗仁的这块招牌还不能丢。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我是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得了呢？我看，我还是辞职的好，以谢国人！”

“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这样想。现在谁也代替不了你。时局已到了这种地步，你继续领导下去才有希望，我支持你到底！支持你到底！”蒋介石说话时，态度是极恳切的，看不出有半点的虚情假意。

意。

“在军事上，目前应以确保两广和大西南为主，汤恩伯部应放弃上海，向浙西和赣东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犄角之势，防守浙、赣、闽一带，阻止共军西犯。”

“关于军事指挥权，皆在敬之的国防部，你完全可以要敬之下命令，按照你的意图部署，我绝不会过问。”开空头支票比谁都慷慨，说归说，做归

做，蒋介石深谙此种游戏的玩法。

“顾墨三的总参谋部与何敬之的国防部今后是什么关系呢？”李宗仁对蒋的慷慨许诺，并不放心，因为老蒋一向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的。

“这个吗！”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此时的李宗仁想要什么，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给，至于能否拿到手里，那只有鬼才知晓。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何敬之是国防部长，我看由他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负责。”

只要你老蒋不插手军事，我李宗仁就指挥得了何应钦，也就指挥得了军队。李宗仁忽然觉得老蒋并不是那么难讲话，问题是以前自己太软弱，想到这里，李宗仁又想到了钱，说道：

“现在军费开支很大，金圆券暴跌，能否从台湾运出部分银元供军政开支用？”

“好的，好的，需要多少，尽管派人到台湾去取就是，这是国家的钱，代总统有权支配。”蒋介石的态度诚挚万分，李宗仁说什么他都答应。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即使有些早就想好了的话，此时也开不了口啦，这就是李宗仁。

白崇禧一直坐在会客厅里，与何应钦、吴忠信等人漫无边际的闲聊。李宗仁摊牌的结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那间小门终于开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白崇禧从他俩的脸上望去，顿时感到一惊：他俩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满意的微笑，这是妥协的结果，而决不是摊牌所能有的表情。如果这样，两广和大西南就没有指望喽！白崇禧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白崇禧先于李宗仁辞别蒋介石飞离杭州，赶往汉口指挥军事。李宗仁飞回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飞机在明故宫机场着陆后，便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声和炮击声，激烈的战斗正在首都郊外进行。街上行人绝迹，店铺关门闭户，满目凄凉。本来，在宽桥航校返航时，何应钦曾劝李宗仁同他一道飞往上海，明日转飞广州。因政府阁员已用10架巨型运输机全部运送到了上海，南京除卫戍部队外，政府机构已全部撤离。按理李代总统也无再返回南京的必要了。但是，李宗仁对何应钦道：

“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担心在撤退中会发生抢劫的事件，我如不在场坐镇，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李宗仁回到南京，赶紧给设在孝陵卫的汤恩伯司令部挂了个电话，询问部队的情况。汤恩伯这时正集中200辆卡车，准备逃往上海，想不到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李宗仁突然又飞了回来。汤恩伯向李宗仁报告：

“报告李代总统，恩伯已于今日下午4时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江阴要塞以东的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沿铁路及公路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亦退往上海，第二十八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随后，汤恩伯劝李宗仁赶快离开南京。

当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坐镇。天黑以后，南京城外，大炮轰鸣，枪声不绝。李宗仁一夜辗转不眠。

用过早餐，李宗仁带随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汤恩伯已在飞机场等候他。

“请问代总统，飞上海还是广州？”汤恩伯问道。

“广州。”李宗仁说完便登上座机。

“追云”号飞机升空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李宗仁从飞机舷窗俯视，只见下关和浦口之间的茫茫江面上，浪花飞溅，炮火如织，舟楫如林，共军正蜂拥过江，……这时，不禁使李宗仁想起“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悲凄地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李宗仁突然命令机师：“改变航向，飞桂林！”

“追云”号改变飞往广州的航程，直往桂林飞去。

4月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夹道人群的欢呼声中开进南京城。

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夹道欢呼着：“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

“解放军同志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南京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艳的红旗。这儿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上，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头一座房子，便看见蒋介石“宝座”。写字台的日历，翻开到4月23日”。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

陈毅于27日早饭后乘车离开了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已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登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

本来预定，刘伯承率二野机关在4月26日到达南京，但因风雨所阻，到29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取得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才突然想起：偌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于是前来请示刘伯承。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和警备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立即坐车赶来。

1949年4月26日，南京军管会成立。4月29日，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到职视事。

邓小平是4月27日进入南京的。这天，从中山码头走来两名军人，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个子不高，步履轻捷，腰板挺直，走起路来透出八面威仪，这就是邓小平。身后的小战士是他的警卫员。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谁也没坐。邓小平显得轻松愉快，和车夫亲切地边走边谈。没有人想到，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个黄包车车夫几乎并着肩进了南京城。

共产党为什么能把中国人的心磁石般的吸引过来？与黄包车夫一起徒步走进南京的邓小平用行动作了最好的回答。

4月28日，香山，双清别墅。

绿荫环抱的庭院清幽静谧，双清泉水瀑瀑流动，泛出朝阳的金辉。

这几天，毛泽东一反渡江战役前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吃得好，睡得好，习字吟诗，精神欢悦。

用完早餐之后，毛泽东来到凉亭小憩。

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号外，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

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右手轻抚膝部，嘴里念着喃喃出声。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恰好被摄影记者萧冰看见，“咔嚓”一声摄入镜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南京解放”的捷报犹如诗情的催比剂，看完号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毛泽东脑海里也定稿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六、千里追击

江南追敌，刘伯承下达六字令：猛打、猛冲、猛追！胖子俘虏承认：我就是——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哪！我的马没有跑过你们的两条腿！蒋介石要亲眼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攻下奉化的。5月16日，溪口白岩山深处哭声震天。

白崇禧带着大胆计划回到桂林。阎锡山写完纪要，觉得已被蒋介石打得鼻青脸肿。

蒋军长江防线一击即破，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料之中，但蒋军演逃之快，似乎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他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司令员叫作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他边沉思边说：

“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

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承命令陈赓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三、第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4月25日，十五军遵照野司的指示，从香隅板地区出发，作为四兵团的左纵队，向江西乐平、上饶方向进击。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风景如画，但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昼夜兼程。不管气候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冲击。所过之处，只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蒋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仇恨。

29日黄昏，十五军先头部队四十四师攻占乐平。30日，军主力部队进至乐平以北地区。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蒋军的狼狈溃逃，使指战员十分鼓舞，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部队中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情绪，加上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影响到预定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断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应有伴随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正如刘伯承所料，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

上逃跑蒋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办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之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慌，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辐重及小俘获所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在战术上，刘伯承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及时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5月2日，四十五师在漆工镇追上了敌一四三师。激战两小时，歼敌一部。为保持追击势头，军令该师以小股部队监视截留该部敌军，主力部队直奔上饶。

5月4日，敌一四三师余部窜至德兴县龙坑岭，双龙亭崇山峻岭当中，企图凭险苟延。十五军第二梯队四十三师奉命攻歼，一二七团八连连长刘子林率领突击队，经过激烈战斗，攻陷敌双龙亭要点，为部队打开了通道。然后部队将该处敌军包围，首先通过喊话，劝告他们投降。敌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遂大部缴械，一四三师被全歼，俘敌师长阎尚元以下2400人。

5月3日，兵团首长根据新的形势，令十五军不再进击上饶，径取横峰地区，相机占领铅山。此时四十五师已临近上饶。为大量兜击歼敌，改以四十四师执行此任务。四十四师于5月4日疾行140里，奔袭铅山，歼敌交警第七、八总队1500余人。同时，四十五师攻占了横峰、上饶、葛源、广丰，并于上饶车站截击敌兵车一列，俘敌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至此，浙赣路为我截断。

千里追击。

第四兵团指定十三军为右纵队，从长江南岸彭泽马填、马路口地区出动，沿石门街、陈营街追歼逃敌，向太阳进击。

4月24日，十二军开始向南追击。25日拂晓，先头部队三十七师，在石门街咬住逃敌六十八军的尾巴，斩歼一部。26日，又在童子渡追上逃敌尾部，再歼一部。

此时，军部获得消息：敌六十八军在景德镇稍事休息后，企图于28日经石镇街、万年向东乡逃窜，欲与白崇禧集团靠拢。军部令十二师加速前进，先敌出石镇截击该敌，遂歼敌六十八军直属队一部及联勤七分院等400余人。敌见此路不通，改循乐平、贵溪路线南逃。

29日晚，十三军追至关王庙、朱山桥一线，在朱山桥地区扭住逃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部队当夜冒雨出击。

30日，十三军某团三连进抵南江庄时，发现一股敌人，正由玉门山沿着公路逃跑。该连立即把三个排分成三路，勇猛冲上1000多米高的陡山，攀着树枝，爬下悬崖，直插敌群中间。第二排跑步前进，渡涉了深过胸部的水沟，敌人猝不及防，被压缩到了山凹里边，一齐举起手来，大喊“饶命”。部队从泥坑里拉出第一群俘虏时，其中一个胖子竟吓得哭了起来。在进行俘虏登记时，那个胖子开始说他是师部书记，负责登记的同志看他像不像，就给他解

释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这个胖子才承认说：“我就是——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呀！由小孤山撤退下来，一直连夜奔跑。那天坐船过河，我把骑的马也扔了，最后还是给你们抓住了。”

桂系匪军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和他的残部，溃散在万年的万克园中。4月30日，被十三军二十七师咬住，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战士牛三保发现有三个敌人蹲在一个水潭子里发抖，一看见牛三保，就都举着双手爬了出来。第八连连长李德瑞走来时，其中一人看到李的胸章和短枪，晓得他是“长官”，马上苦笑着说：“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个字，咱俩是兄弟哩！”李德瑞问他们是什么官，他结结巴巴地说：“排……长。”

在押送他去俘虏营的路上，他叹息着说：“从安庆到现在，突了十几次围，还是被你们捉住了。”

当从一个俘虏群走过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俘虏，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跳起来，马上向我方领队的指导员说：“报告长官，他就是师长！我们在安庆做生意时，被一七四师抓来挑行李，肩膀都压肿了。我们向这个师长要求释放，这家伙反而痛打了我们一顿。现在我们要揍他，请长官允许我们报仇！”说着他们俩卷起袖子，向这家伙跟前跑过来。

指导员进行劝阻，他们还都愤恨的说：“不行，非揍他不行！”随后，从那个俘虏的口袋搜出了一枚黑色角质图章，上面刻着四个隶书体字“吴中坚印”。这样一来，吴中坚便不敢再抵赖了。

十三军三十七师在5月3日解放贵溪。三十八师、三十九师主力穷追逃敌八十一师，合围弋阳。

5月3日拂晓，三十八师先头部队一一二团一举突入弋阳。此时，敌八十一师大部已退过信江南岸，并纵火焚烧江上浮桥，企图阻我追击。一一二团以疾风般的速度尾追敌后，冲过正在燃烧的浮桥。同时，我三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弋阳城南，对敌形成合围。敌六十八军副军长王振声、军参谋长杜大中见逃窜无路，即率敌军一部向我投降，弋阳即告解放。随后，王振声等协助我军，乘坐汽车追回已越河逃窜的敌八十一师大部。此役敌投降官兵，有王振声、杜大中、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副师长刘青浦等以下4000余人。此后，我三十九师一一五团又出浙赣进入福建，歼敌500余人。

十四军担任第四兵团后卫，循十二军路线日夜兼程前进，直出东乡、鹰潭。

十四军先头部队四十师，于4月27日从至德下隅坡出发，向乐平、余江、鹰潭方向疾进。5月5日解放鹰潭重镇和东乡县城，敌人闻风逃走。

此时，敌十八军所属七十五师、十八师，正在金溪、南城、临门地区设防抵抗。我四十师即于8日越过浙赣线，沿着鹰（潭）南（城）公路南下，部队排除万难，猛进穷追，三天两夜跃进了320余里，解放金溪、南城；沿途我军且战且走，歼灭敌七十五师一部。该敌的头子是胡璉，十八军已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十八军军长胡璉只身逃走。现在的敌军部队是刚刚重新征补起来的。因为他是头一年我军的手下败将，一路上闻风而逃，我军坐汽车都追不上。我军互相鼓励：“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5月9日，在金溪以北青原桥地区发现敌情，先头部队兴奋得忘了疲劳和饥饿，一口气追了三个小时，行进了55里，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扭住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茅家岭地区歼灭敌人一个营。残敌南逃。我军解放金溪、南城后，敌向南丰逃去。

久受敌人残酷压迫的江南人民，怀着重见天日心情，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军开到哪里，鞭炮放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纵情地狂欢起来。

我军到达铅山河口镇以东 10 多里的江村时，截歼从上饶逃向铅山残匪的战斗正在附近村庄进行着。在枪炮声中，江村人民举起挺高的竹杆，杆头绑着大块的红布，下面悬着九串鞭炮，村里男女老幼簇拥着战士欢呼。他们指着杆上的红布说：“红布就是欢迎红军回家。”

我军开进河口镇大街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成人的海洋。成百成千的群众纵情欢呼，鞭炮不停地响了 20 多分钟。五里长的河口镇，完全沉浸在鞭炮硝烟浓雾的笼罩之中。

许多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事先就准备好了粮食、柴草、鞋子等，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追击敌军的道路上，群众不但热情地送茶烧饭欢迎我军，还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修竣敌人破坏的桥梁，送情报，作向导，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战斗热情。

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攻占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的同时，第三兵团分别占领金华、衢县；由粟裕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于 4 月 27 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党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经两天战斗，8 万余人悉数被歼。5 月 3 日，第三野战军的七兵团，占领杭州。自此，浙赣线 800 余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 月 16 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兵分几路，向浙江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不知是何种心态所使，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可闻了，蒋介石却还在溪口没走。

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是硬撑脸面给部下看？还是自知一去永远难返而对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愫使然？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几日来，尽管他用劲儿攥起那几月来越来越瘦弱的拳头说：“我要指挥反攻，我要看看他们怎样攻下奉化？”但此时也只是一腔激愤。

他的大公子蒋经国，则要比他现实。败了就是败了，该走还是要走的，难道不走要当共军的俘虏不成？

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蒋经国耐不住了性子：“父亲，太康号前几天开到定海去了，俞局长和王世和的家眷都随军舰走了！”蒋经国最知道父亲的脾气，语气虽急，但仍没敢直言“走”的字眼，但含意很明显：这里除了我们家之外，再没有其他家眷了。

“共军过了嵊县了吗？”看来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共军如还没过嵊县，那怕什么，来得及的。

俞济时赶紧趋前一步说：“看情况共军已过嵊县，目标象是正向象山港挺进。”

有了俞济时的这句话，蒋介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离开溪口，空中和陆路都不安全，也不太可能。只有象山港水路一条道了。于是，蒋介石长叹一声，对蒋经国说道：“到你祖母坟前告别罢，你去把方良和孩子们也叫来。”

儿媳、孙子都来以后，蒋介石领着一同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刚一站在母亲墓前，就已经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长跪不起，倏地，大哭起来。

要是蒋母在天有灵，也必为之感动万分。

失败是痛苦的。而且败得这样惨！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

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

对母亲的墓庐叩拜之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扶下，向山下走去。

下了凤凰山，几辆轿车早已等候。

蒋介石再回首望望这座美丽山峰，慢慢地钻到了汽车里。

别了，慈庵，别了，丰镐房，此一别。今生再难相见。剡溪水淙淙长流，武岭山烟雾迷朦。蒋介石潸然泪下。

蒋介石这次回溪口，给人讲是为了主持祭祖进谱大典。

蒋氏的修谱之事早在 1947 年秋便开始了，由吴稚晖和陈布雷率领一批饱读经书的大儒主笔。这一修谱不得了，蒋氏和北京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攀上了亲。还引经据典，说蒋氏祖先原为周公旦的后裔。周公第三子封于蒋国（今河南固始县），后世子孙则以国号为姓，改姬性蒋。此后，蒋氏子孙绵延不绝，称得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蒋介石对修出了这么让人荣耀的祖谱，非常满意，因而开祠堂门进宗谱的大典异常隆重，从上海请来了京戏班子，搭台鸣锣，一连唱了三天大戏。大开宴席，遍请宗中父老。

在此期间，蒋介石遍游溪口名胜古迹，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样的多情。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他最常去的地方，除了蒋母墓，也就是雪窦山了。

雪窦山，可谓溪口名胜之首，位于溪口镇的北方，是四明山支脉最高峰，海拔 600 米。山中有一块百顷平地，古刹雪窦寺便建在此。此寺是佛教禅宗十刹之一。蒋介石为此寺题额“四明第一山”。寺前是一道深谷，崇崖壁立，如同斧削，这便是千丈岩。两条清澈见底的小涧从寺底左右环绕而过，在寺前汇合，由岩顶直泻而下，水石相击，喷薄如雪崩，此为有名的“千丈岩瀑布”。王安石曾咏诗赞美道：“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瀑布对面建有“飞雪亭”，也是山中一景。由西北上行，山岩壁立，陡峭险峻，攀上岩顶，便是一块平地，形同一巨大石台，称之为妙高台。台上古柏森森，台下鹰翔幽谷。举目四望，群山偃伏，山下田畦庐舍历历在目。1927 年，蒋介石看中这块地方，就在山崖上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蒋介石和宋美龄夏天常来此避暑。

此外，雪窦山还有“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地。雪窦山真是处处是胜景。1920 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回乡，曾咏诗鸣志，曰：“雪山名山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隐成莫退之。”如今，蒋介石功未成，也无法隐退在此了。

蒋介石的车队，从溪口沿剡溪而下，40 公里即到达宁波镇海港，这是从溪口出海的传统路线，但这次蒋介石没有走这条线路。他估计到，解放军一旦进军宁波，必然抢占镇海港，堵住宁波守军的出海口。那样，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出了。因此决定不走宁海而走象山港。从嵊县到象山港全是山路，这样靠两条腿走路的共军就跑不过他的汽车轮。他就可以从容地退出溪口，往象山港，乘军舰出海。

蒋介石此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返故里。

5 月 25 日，解放军第三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解放了溪口，或者说是进军路过了溪口。因为这里早已无国民党军队的一兵一卒了。

溪口镇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部队进镇前，专门进行了纪律教育，防止战

士们出于对蒋介石的愤恨作出影响纪律的事情。

一八三团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镇。该镇镇长——据说才上任两天，是蒋介石离开溪口前特意挑选的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镇。街上的行人不多，店铺照常开门营业。

一八三团穿镇而过，继续向前推进。随后开进的六十一师师部和一八二团，驻在了溪口及其附近的村庄。六十一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丰镐房。第二天，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等相约，到镇上各处转转。经镇上人指点，出镇登上白岩山，来到蒋母墓，看了孙中山的手迹，也看了一天前蒋介石挥泪洒别的坟冢。墓侧不远有几间平房，上有蒋介石亲笔题名“慈庵”，大家知道这里才是蒋介石真正的住所。

进了慈庵，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表面看平平常常的几间平房，里面却十分豪华，家俱设备全是最新式的洋货，住在这里要远比住丰镐房舒适得多。师政委王静敏很有感慨，评论道：“这倒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在宋美龄的卧室，大家发现了一件奇事，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香，却搞不清这清香发自何处。还是师政治部主任李清泉眼尖，他发现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雅致的挂屏，上面薄薄地敷着一层土，一株不知名的兰花，就凭着这点绿叶青葱，傲然吐芳，满屋幽香盖源于此。这个发现使大家赞叹不已：“这个女人还挺有一套！”

六十一师在溪口驻扎了两天，27日奉命攻取定海，全师向宁波集结。溪口是沿海到浙东山区的必经之地，再加政治的原因，这个小镇虽是个只有900人口的弹丸小镇，却留下一个营的部队驻守。

桂林，文明路130号，李宗仁私宅。

窗外淫雨淅淅，烟波弥漫，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度过的，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抑郁沉闷。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院子后边雨中朦胧的杉湖。

几天来，他还在回想着4月22日和蒋介石摊牌的情景。

那天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小屋秘谈时，口口声声要把人事权、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统统交出来，但实际上老蒋的鬼主意早就打好了。

仅隔一个多小时，吃罢饭大家都坐在会客厅里，蒋介石郑重其事地宣布：

“现在是党国危亡之秋，党政联系需要加强，党内一切隔膜、成见是非应该消除，因此，中正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正当主席，德邻兄当副主席，今后凡是党的重大决策，先提到‘非常委员会’审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这也是孙总理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言毕，吴忠信、王世杰等极力附和，而李宗仁却两眼直冒金星，差点儿没气得晕了过去。摊牌的结果，仍是要做一个傀儡角色。但蒋介石玩的把戏又让李宗仁有嘴咬人，而无处下口。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是国民党的总裁并未辞去，蒋介石说同意把政府的权力都交给李宗仁，但并没有说把党的权力也交给李宗仁。现在党的总裁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做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同意呢？

白崇禧后来得知了详情，骂李宗仁：“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

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

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林。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

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 and 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

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

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

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已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递给李宗仁一分函件，说：“德邻兄，蒋先生已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希望你尽快赴广州主持军国大计。”

李宗仁接过蒋介石的复函，认真地阅读：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考。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成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委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了六个条件，蒋介石答复了五条，而后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李宗仁把函件往桌上一放，未置一词。

阎锡山见李宗仁心有不满，说：“关于蒋先生出国之事，他恳求德邻兄允许他居留台湾，现在国家败亡，他深感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李宗仁打断阎锡山的话，冷冷说道：“是呀，他居留台湾，我居留桂林，

各得其所岂不正好？”

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白崇禧突飞桂林。原来白是接行政院长何应钦的电报，匆匆返桂的。何告诉白，蒋介石答应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军费开支之用，并又从台湾调拨一批银元供政府财政费用。因为阎锡山这次来桂林时，陈济棠也一同前往，白是回桂林让陈用黄金换港币的。当然，白拿到这批黄金，抗蒋的劲头自然也有所减弱，也顺便劝劝李宗仁回广州执政，看看事情的发展再说。但对李宗仁主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意见，这时白明确表示反对。

李宗仁此时虽为代总统，实际上是光杆司令。钱在蒋介石手里，军队在白崇禧手里。孤身一人，不论是与中共重开和谈也好，还是在桂林另组政府也好，都万难成事。而且，历史上从来都是李、白不分，分开就一事无成，如果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他这个总统不啻一块废铜烂铁。

痛苦归痛苦，无奈归无奈，5月8日上午，李宗仁又登上去广州的“追云”号飞机。

李宗仁自4月23日返回桂林，前后盘桓半个月，结果一事无成，在蒋的软硬诱骗、阎锡山的劝哄、白崇禧的逼迫下，重新到广州做了蒋介石的傀儡。

正当蒋介石等在上海、广州、桂林勾心斗角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千里大追击也正迅猛地继续向纵深推进。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5月初斩断浙赣铁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解放了赣东军事重镇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和鹰潭一线，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的联系，粉碎了敌人企图沿浙赣线再设防线的计划。此时，从长江岸边一直被解放军追击下来的刘汝明兵团残部及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李延年残部，因在浙赣线难以立足，都拼命地向福建境内逃窜。

同时，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围歼隅守上海的敌人。为了扩大战果，配合第三野战军主力作战，第二野战军首长，遂命令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轻装前进，向福建境内追击逃敌。

5月8日，第四兵团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电示十五军以两个师轻装昼夜兼程，务于10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截断逃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者达百里，无法集结。遂决定一面前进，一面收拢。军首长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并要求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的态势。

从5月8日起，四十四师兼程疾进，两天两夜强行270里，于10日强行包围了建阳城，突袭刚从水占（建阳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五十五军残部。稍后，与五兵团一部在此会师。

四十五师部队，于5月9日上午横跨大松岭，越过闽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进入福建，即以每天90余里的强行军速度，晚上到达崇安县城，解放了这座产武夷茶的名城。各部进军神速，各连提出进军的口号是：“抬起两条飞毛腿，奋勇追歼捉战犯！”“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创造铁腿班，追歼作战作模范！”这时我军虽然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些交通工具，但大部队追击，主要靠的还是指战员的两条腿。

十五军解放崇安、建阳两城之后，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是四十四师部队，于12日5时，自建阳公路向南疾进，13日晨6时，进占闽北最大城市

及敌空军基地建瓯。刚从建阳逃来喘息未定的敌第六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几小时前已经闻风逃走。在建瓯我军生俘其后卫五十五军八十六团及交警大队 300 余人，汽车 10 余辆，汽车修理厂一座。

敌五十五军残部向山地遁逃，我军留下小部分清剿残敌，主力继续追击。我军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也加速了我军的追击速度，14 日抵达福建北部重要军事供给地南平。此时，各路汇集来的残敌，自以为已经侥幸脱险，遂在南平停留喘息。直到四十四师的先头部队抵到南平附近，敌军才发觉。我军勇猛直入，残敌张皇失措，溃不成军，又被我生俘 600 余人，缴获汽车 30 辆。敌五十五军自皖南逃跑以来，被我穷追 1600 多里，至此终于全部被歼灭。

十五军的另一路四十五师部队，于 12 日自崇安轻装取捷径前进，一三三团一昼夜急行 150 余里，猛扑建阳东北的水吉县城及其东北 20 里的回龙镇，全部歼灭正在回龙企图渡南溪南窜的敌京沪杭国道护路队、京沪杭编练团、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共 1000 余人，缴获汽车 30 余辆。这时由于建阳、水吉的迅速解放，由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残敌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陷入包围，进退两难，经我一击，全部被迫向水吉以东山地溃散。我军跟踪追击，歼敌第九十六、九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 2000 余人。

5 月 18 日，十五军奉令结束福建境内的追击作战。经过各兄弟部队的协同作战，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十五军渡江后，日夜兼程追击 26 天，前进追敌 1500 余里，进行主要战斗 12 次，歼敌 120000 余。部队整日处于阴雨泥泞之中，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打，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斗。我军指战员都表现了奋不顾身，坚决执行命令的顽强拼搏精神。当时，南方闷热多雨，又终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部队的每天增加着里程：120 里、130 里，后来增至一天急行军 150 里。大多数人的鞋子都跑烂了，指战员的脚上原来的血泡还没好，而新的血泡又磨出来了。在丛山深林里行进时，常常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之后才能通过。

著名的战斗模范连队一三三团第三连，在向水吉追击的途中，沿着崇溪河的西岸，走过树木丛密的崎岖山路，黄昏到达目的地山边镇，刚要准备做饭，团长李钟玄在望远镜里发现河南岸有敌人在做饭，便向一营长蒋连义说：“部队不能休息，赶快想办法渡过河去，再追！”

担任前卫的三连立即行动起来，指导员马上就集合了渡江立了特等功的十几位英雄水手，进行动员和组织，连长张小堆去观察地形，副连长刘贵明领着去找竹杆、门板作筏子。这时侦察连缴获了三只小船，三连立即乘船渡过河去，未发一弹便在上游俘获了七只船和 120 多个敌人。岸上的敌人象受惊的兔子，立即拼命向山地逃跑。

和第一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看着地图马上命令：“我们爬过这座 20 多里的大山，迂回拦住敌人！”

当时三连有 20 多人没鞋穿，打赤脚，一排有五个人脚上磨破了泡，二排有九个人的脚上流着血，三排排长董虎法、六班班长陈克清脚痛得都成了拐子，一拐一拐仍跟着部队前进。

副团长和营长商量，把任务交给二连或一连。三连连长、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代表全连向副团长请战：“我们是前卫连，任务应该交给我们！没鞋子，打赤脚没关系，只要看到了敌人，我们决不会让跑掉！”

副团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又对他们说：“那就把脚破了的和没鞋子的留下来。”

这一来，有 20 多个没鞋子和脚破的人都慌了。机枪手袁守生马上请求道：“我是机枪手，我不能留下！”

六班长陈克清站了起来：“我是班长，我不能留下！”

光着脚的段孝芳说：“我是淮海战役解放的，我应该为人民出力，我不能留下……”

20 多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指导员非常感动，就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齐出发了。

他们轻装急进，迅速迫近残敌逃奔的大庙村和叶当村。匪军正围着大火烤衣服，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抢老百姓的东西，乱成一片。

三连立即行动。副连长带二排沿河沟直取大庙，连长带三排通过稻田、水沟，拿下了叶当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有的同志过河沟时也掉了鞋子，脚踏在稻茬子都刺出了血。

枪声一响，敌人大乱，刚进村子的敌五十五军残部 340 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村中敌人尚未杀死的猪还在惨叫，大米在锅里浸着，菜在锅里烧着。敌军俘虏惊奇地看着打赤脚的解放军指战员，感叹说：“你们真行：追的我们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厉害！厉害！”

七、“八一”魂归

“八一”魂归，22 年后再相见。在赣江江心有几叶荒凉的小洲。南昌外围战，江南追敌中的最激烈之战。四进南昌，陈赓感慨万端。复兴岛上的复兴梦。蒋氏父子俩有了共同语言。蒋介石嘱咐毛人凤：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载着破灭的梦想和无尽的忧伤，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第四兵团经过千里追击，挺进浙赣线，控制上饶至东乡段 200 公里铁路以后，密切注视着南昌、九江的敌人，准备配合第四野战军兄弟兵团，相机解放南昌。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继二、三野战军突破长江下游江防之后，又于 5 月 14 日由蕲春、黄冈间胜利渡江。此时，陈赓四兵团十四军解放临川、进贤两城，形成对白崇禧集团侧背严重威胁的态势。

5 月 16 日，四兵团遵照野司首长的指示，以两个军西出丰城和樟树镇，并争取在赣江西岸截歼南逃之敌，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十四军于当日立即出动，向丰城、樟树一线出击，侧击白崇禧集团。并准备西渡赣江，向高安及其以南地区机动歼敌。十三军并附十五军一个师（第四十三师），尾随十四军右侧前进，矛头直指南

南昌是一座革命名城，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诞生在这里。

在 1927 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勾结起来，对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屠杀。

在党和革命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27 年 8 月 1 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9 月 9 日，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亲自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2 月 11 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在广州举行了另一次武装起义。正象毛泽东在高度概括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指出的，革命失败，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开始，真正有了共产党自己的军队。

南昌还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给这座光荣的城市带来了极端黑暗的日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而其中有多次——1931 年 7 月到 9 月的第三次“围剿”，1932 年 6 月到 1933 年 2 月的第四次“围剿”、1933 年 10 月到 1934 年 10 月的第五次“围剿”——都是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进行的。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拖到南昌被杀害，敌人在这里杀害了江西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方志敏。在南昌的各个监狱里和赣江江心那些荒凉的小洲上，曾经囚禁过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那严峻的岁月里，南昌几十万人民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经受过数不尽的灾难。

如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即将彻底垮台，南昌也将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之

中。参加解放南昌的第二野战军指战员无不为了承担这样的光荣任务而感到自豪。

5月16日，四野先遣兵团一部在武汉附近渡江，盘踞长江中游的白崇禧集团，当天便慌忙弃阵南逃。17日，武汉三镇完全解放。四野即沿粤汉铁路南下，19日解放咸宁。在武汉以东渡江的四野先头部队，相继解放阳新、瑞昌，飞兵南进。铁路沿线的白崇禧部第四十六军，放弃九江，仓皇南逃。这时进抵樟树以东地区的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与四野南下部队遥相呼应，形成对南昌敌人夹击态势。驻守南昌的敌军，表面上故作姿态，大肆吹嘘“坚守”南昌，实则惊恐万状，开始向赣江西岸和沿赣江东岸撤退，伪江西省主席方天，在我大军刚刚突破江防，就已逃之夭夭，奔向赣州。敌人在逃跑时，横征暴敛，大肆抢劫，对南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三十七师是十三军的前卫师，在16日接到兵团进军命令后，轻装疾进，尽管天下大雨，两昼夜便跃进了300余里，5月19日进逼抚河。

同日，十三军三十八、三十九师在李家渡渡过抚河，向丰城以北挺进。十四军四十二师向樟树敌人发起攻击，四十一师进至拖船埠东约五里的龚村，击溃南逃之敌一七五师与四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两个营。该敌见南逃道路堵塞，当晚又向南昌回窜。20日我军进占樟树，并在樟树南北线准备西渡赣江。

回窜南昌的敌第四十六军一八八、一七五两个师，企图抢占南昌东南、抚河岸边的谢埠市。阻止我进攻南昌之路。可是，敌人迟了一步，5月21日拂晓，我三十七师前卫一一团，冒着倾盆大雨已从南昌东南30里处渡过抚河，进占谢埠市，迫使南昌伪县政府及伪保安团一部向我投降。

我军继续向南昌挺进，当三十七师一一团第三营前进了五里多路，于晨7时刚刚抵进南安冲、北安冲的时候，退集在南昌的敌一八八师和一七五师共约万余人，在崎岖不平的丘陵地上，分三路从王村、喻村、陈村方向，对该营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压我退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敌军主力集团撤退。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情况，我三营的指战员毫无惧色，英勇地投入战斗。敌我双方都在争夺坚固建筑物。数群敌兵已爬上屋顶，用十多挺重机关枪向三营扫射。同时，敌人的山炮、迫击炮也疯狂地轰击着谢埠市和抚河渡口。三十七师后续部队因被敌猛烈炮火封锁，无法渡河，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用望远镜隔河相望，万分焦急。只见成群结队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赶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围攻。三营扼守的南北安冲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战斗不到二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300人以上。随三营一起行动的一一团长吴效闵、政委张谦顽强地指挥着部队向敌人猛烈还击。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各连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负伤，有的连队伤亡超过一半，有的连队伤亡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北安冲村子里水塘的鱼虾漂起了一层，到处血水横流。当敌人突入三营阵地时，勇士们就和敌人白刃格斗，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砸，用拳头打。就这样，敌人连续发动的七次进攻都被打退了。

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开始了。炮火更猛烈，兵力比前七次更多。最前沿的八连指战员，伏在道旁的水沟和稻田里，沉着应战，待敌离阵地四五十公尺时，营长安玉峰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成批地倒下去。敌人在八连阵地碰了壁，又转向七连阵地进攻。七连的勇士们也同样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七班副班长祁州平负了重伤，鲜血染红衣服，但他仍端着枪射

击。战士许德明腿负重伤，当三班长发现时叫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离开前沿阵地。

敌人使用两个营的兵力，向三排的阵地反复冲击，三次进犯都被打退，当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从三排的右翼迂回过来。这时别的班都接受了其它任务，坚守三排阵地阻击当面敌人进攻的，只有高小堆这一个班，而且除三个人外，其余的都负了伤，子弹也快打完了。班长高小堆马上机智地布设疑阵欺骗敌人：他把负伤同志的军帽拿过来，放在工事前沿上，忽而在这里对敌人打一梭子机枪，忽儿跑到那里打步枪，再跑到另一个地方甩出手榴弹。数倍于我的敌人始终未敢前进一步。一直坚持到我后续部队到达。

东湖贾村、王庄、王段冈一线阵地上，战斗同样激烈。第四连战士朱林，被炮弹炸伤了两腿，但仍紧握着手中的机关枪，在阵地最前面射击敌人。在王庄阵地上，两个连的敌人猛攻五连第一排的阵地。敌人集中整营的火器对准他们，排长王福居和敌人拼了10分钟手榴弹，又和连长许建举各自抱着一挺机枪猛烈扫射，击毙敌人50余名，率领全排坚守住了阵地。

10时许，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和一一一团团长陈兴建率领该团渡过抚河。这时，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敌一八八师师长指挥下，向我军冲过来。只见二营副营长李明一马当先，率领一个加强连，占领了一片坟地。在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连、排长先后倒了下去，机枪手也都牺牲了。此刻，李明从血泊里拿起一挺轻机枪，架在一个坟包上，由四个战士轮流压子弹，一口气打了三箱子弹，枪口都打红了，打死了100多个敌人。接着一一一团其他连队相继投入战斗，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以80多人伤亡的代价，强占了板溪李村、大陇湖村、牌楼秦村一线，及时阻止了敌一八八师的进攻。

而在此时，十华观和大塘李村已先为敌一七五师占领，敌处优势，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14时，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由十华观至大塘李村之弧形线上全线向我再次反扑。我一一团三营遂又陷入优势敌军的包围之中。战斗更加激烈了，在肉搏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副营长李东海带的两个连只剩下了六个人，他的右腿负了重伤，鲜血不停地流着；而跟随三营氏安玉峰的两个连，能参加战斗的也所剩无几。在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汇集在南北安冲之间蔓草丛生的坟地里，和吴效闵、张谦带领的参谋、警卫人员一道，每个人坚守一个坟包，继续与敌人进行苦战，毙敌数以百计。

为了解除一一一团前卫部队被围的困境，14时30分，后续部队一一九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该团团长顾永武、政委何云峰率领下，继续冒着敌人炮火渡过抚河，向十华观进行迂回侧击，将敌一七五师拦腰切断，杀敌数百人，俘敌290余人，全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敌遭我猛烈打击后，丢下上于具尸体、伤员和枪炮，退回南昌城内。南昌外围的战斗，三十七师共伤500余人，这是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千里追击战斗过程中，所进行的较大战斗之一。

南昌战役前夕，陈康率兵团司令部随十四军部队前进。5月17日，进驻鹰潭镇，司令部就设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公馆里。5月20日，兵团司令部进驻进贤县城。

5月22日拂晓，我军向南昌城挺进，守敌弃城逃跑，在追击道路上，我军在南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对溃退之敌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把敌人的后尾部队全部歼灭，5月22日，南昌城宣告解放。这是四兵团渡江战役之后解

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5月23日上午，十三军三十六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的率领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整个南昌都沸腾了，30万南昌人民沉浸在欢腾的海洋里。

上午8时，十三军三十七师的雄伟行列，从南昌南面的顺化门进入市区。在我军的军号声与口号声中，工人、学生及市民们都拥挤在街头。千万面五色缤纷的小旗在空中飞舞，我军各兵种组成的行列，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走进这座革命的名城。

南昌解放以后，陈赓及兵团司令部仍驻在进贤县城。

6月5日，以陈正人为首的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

6月6日，陈赓进驻南昌，兵团司令部移驻南昌郊区的莲塘，陈赓住在交通大楼。

这天夜里，陈赓心情异常兴奋，写道：“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往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我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作战中负伤，返沪医治，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这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也。”

陈赓在南昌共停留了五天。6月8日，陈赓由陈正人、邵式平陪同，观看南昌市容。陈赓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他曾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述：“今日应陈、邵之邀，巡游市街。街市较十数年前，确为繁华。国民党统治以来，乡村破产，田地荒芜，人口大减；但城市繁华，人口亦增，乃是国民党抢粮、抓丁、盗匪遍地，又加以大肆屠杀，人多弃乡来城，造成畸形发展状态。过万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1933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解南昌后，蒋匪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回忆昔年此事中，我曾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日则己为此室主人矣！盖我三十七师师部即驻节于此。”

兵团司令部的同志们，都知道南昌对陈司令员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在南昌有着特殊的经历，所以一些同志围在一起，一定要他讲讲前三次进南昌的故事，有一天晚上，陈赓和大家坐在一起，讲了他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赓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为迁就汪精卫，让陈赓把特务营交给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随周恩来秘密到了江西，参加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部队撤到会昌时，遭敌优势兵力堵击，部队严重受损。

撤退时，陈赓走在队伍的最后，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手腕的骨头被打折，不能动弹，陈赓为躲过敌人的搜捕，把身上的制服脱掉，把腿上流出的鲜血抹了一身一脸，躺在地上装死。结果，搜查时，敌人在陈赓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陈赓一直在地上躺了三个小时，不能走动。下午，叶挺率领部队进行反

攻，方把陈赓救了回来。起义军占领了会昌城，陈赓被抬到城里，见到了来这里的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人。异地重逢，分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向福建的汀州。汀州有家医院，是傅连 办的，陈赓被送去治疗，受到傅的精心照料。后来，傅连 对此曾有过一段回忆：“起义军营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了，住在附近医院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轻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道：象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谨慎而持久的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保存下来了。”

陈赓在傅连 的医院住了些日子后，带伤随部队进军东江，因其伤重，不能跟部队行动，在 1927 年的 10 月中旬，经过千辛万苦，经由汕头、香港到达上海，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才把左腿上的伤口治好，将折断的腿骨接了起来。

陈赓出院后，化名王先生，留在上海做了四年秘密工作，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惩治了一些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的叛徒分子。

1931 年，陈赓被党又派到鄂豫皖红色区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团长，不久调任第十二师任师长。

在 1932 年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陈赓指挥胡山寨战斗，不幸右腿又被敌人打中，膝盖处负重伤。遂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右腿一拐一拐地离开部队，在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时，由于口音不对，答话也有差错，被民团盘查住。幸好，给了一些钱，民团把他放了。

在晚上，他刚在一家饭铺住下，又碰见民团来查店，因为口音不对，又被民团查住。民团问他：“从哪里来的？”陈赓回答：“从樊城来买桐油的。”民团又问：“住在樊城什么地方？”这一下子难住了陈赓，因为他从没去过樊城，对樊城不熟悉。但陈赓知道樊城滨临汉水，就顺口答道：“住河街上。”这一蒙还真蒙对了，樊城确有一条街叫河街，而且是桐油商聚集的地方。虽然陈赓对答无误，但民团看他这个打扮不象本地人，准备第二天带他到南阳城里去。

当晚，那四个民团也在饭铺里住了下来，而且让陈赓睡在他们的中间。陈赓看见势头不对，便找到店铺老板，掏出 20 块银元，说：“我有 8 块钱，在柜上存起来。”暗示这钱是给老板的，请他帮忙。同时，陈赓和那几个团丁神侃，说他除了做桐油生意之外，方便的话，也捣腾点儿大烟什么的。说得几个团丁烟瘾大发。受了贿的老板也在旁边敲边鼓，说：“今天这里，抽的、喝的都有……”那个老板随即买了鸦片烟、酒肉等东西，把四个团丁灌得酪配大醉，昏昏入睡，陈赓趁机跑了出来。

自古英雄多惊险。陈赓从南阳逃出，一瘸一拐，历尽千辛万苦，走了好几天，到了郑州。还没时间歇脚，在街上又被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叫住，问他：“你不是陈赓吗？”陈赓立刻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在黄埔军校一

期学习时的同学，现在胡宗南手下做官。

陈赓很快镇定情绪，见那个同学对认他有些迟疑，仗着会说多种方言，从容地摇摇头，用上海话说道：“阿拉弗性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依格位长官认错人了哦！”因陈赓十分沉着，那个同学信以为真，说：“真有意思，我那个朋友是湖南人，跟你长得一个样子。”说完扬长而去。

事不宜迟，此处不是久留之地，陈赓赶紧乘车离开了郑州。

不久，陈赓辗转到了上海。仍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伤。在牛惠霖、骨科专家牛惠生（牛惠霖之弟），胡兰生大夫共同的精心治疗下，很快伤就好了。

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工作。

陈赓性格豪爽，爱讲笑话，善逗乐，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和拥护。

在上海治伤期间，因他以前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认识的人多，当时白色恐怖又很厉害，党内时有叛徒。党组织怕陈赓出事，一直将他隐藏在秘密的地方，但陈赓好动，确也把他憋得够呛。

在准备离开上海的前一天，3月24日，陈赓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想解放一下，去看电影。恰巧跟一个党内的叛徒坐在了一起。那个叛徒故做姿态，陈赓虽不知情，但也觉无拉扯的必要，遂把那个叛徒骗出戏院。一出戏院，陈赓就跑，但因双腿两次重伤，留下后遗症，稍瘸，跑不快，被那个叛徒拖住，两个人扭成一团，相互厮打，那个叛徒忙吹口哨，招来巡捕，将陈赓逮捕。

陈赓被捕之初，曾遭鞭打、电刑等酷刑审讯。后来，宋庆龄带着许多记者前来探视，和巡捕房交涉，才停止酷刑。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审判会。当日和他先后被判的还有罗登贤、廖承志等四同志。叛徒王云程等人在法庭上作证。

在法庭上，陈赓毫无惧色，慷慨讲演，高声唱国际歌，闹得法庭措手不及。

“审判”结束，陈赓等被引渡给上海公安局，进入国民党当局的魔掌。敌人怕他逃跑，在他的牢房里，特安装铁柱子，把陈赓和铁柱子铐在一起。

在上海期间，中共党内“大名鼎鼎”的大叛徒顾顺章曾来劝降，送来的礼物被陈赓扔得遍地都是。

不久，陈赓又被押解南京。陈赓善于逃走，这在国民党内小有名气。队上海起身始，敌人就把他和另一个同志用铁锁链锁在了一起。

因为在北伐时期，陈赓在蒋介石最危难的时候替他出过大力，救过蒋介石的命。在押解陈赓的列车到南京时，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拿着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他。并转达了蒋电报的内容，意思是说，陈赓在北伐时有特殊的历史，要劝他“悔过”，加入国民党，自会有锦绣前程。

陈赓在南京，以顾顺章为首的中共叛徒分子轮番劝降，陈不为所动。“黄埔同学”则故意穿着镶金边的将军制服和闪光的皮靴，来炫耀他们今日的“辉煌”。他们给陈赓说：蒋介石对黄埔军官有特殊的感情，何况陈赓对蒋有恩，如果“回心转意”，以后自会比他们兴旺发达。

由于陈赓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了这个“囚犯”绝无仅有的“殊荣”。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他，审讯他，劝他“回心转意”。

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第四次对红军的“围剿”，敌人就把陈赓押解到了南昌，列车在去往南昌途中转车，蒋介石派亲信吴忠信专程到南浔迎接。

这就是陈赓所说的第三次南昌之行。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押解到南昌的。

到南昌之后，敌人把他安排在南昌市区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这里正是当年南昌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蒋介石先派了他的秘书邓文仪，前去“看望”，并带去很多礼物。

邓文仪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 3000 毕业生，就统治中国 30 年；黄埔有 1 万多名毕业生，至少能统治中国 80 年，蒋的愿望，就是争取让每一个黄埔毕业生，都回到他的身边……”陈赓在黄埔时就是有名的好口才，蒋介石的秘书他是不难对付的。

第二天下午，陈赓被押去见蒋。陈赓本是有名的大胡子，在监牢里关了几个月，胡子长得老长，经多次受刑，衣服污秽破烂。在见蒋介石前，邓文仪给陈赓抱去了一大堆新衣服，有绸子衬衣，哗叽长衫，还有礼帽、鞋子等。邓要他把新衣服换上，胡子刮掉，收拾干净，并说：“你去见先生，穿你的衣服多没礼貌！”陈赓愤怒地驳斥邓文仪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子，这是讲的什么礼貌？”

陈赓被带到科学仪器馆，安排在一个宽敞的客厅里，周围满是卫兵。

陈赓坐下不久，就听到皮鞋声。

“陈赓哪里？陈赓哪里？”陈赓一听就知道是蒋介石在门外说话。

蒋介石为了保持他的尊严，故意在楼梯上用他那一口浙江口音，意思是表示他来了，好让陈赓出来恭迎他。

此时陈赓却拿着一张报纸看起来。

蒋介石从楼梯上走下来，一看见陈赓，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神态，亲切他说：

“你是陈赓，你是陈赓，还是当年的样子。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板着面孔冷冷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蒋介石不知所措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好久才又说出一句话来：

“你不要那样想不开的，只要你过来，愿意带兵，马上给你一个师长。”

陈赓仍冷冷地说：“今天落在你们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

蒋介石继续装模做样地说：“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剿匪当中死亡 30 多万，中国不能这样牺牲，……”

陈赓说：“国家弄得这样糟，都应当由你自己来负责。是谁发动的内战？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负这个责任。”

陈赓声音激昂，声色俱厉，蒋气得脸色铁青：“你这个陈赓，你这个陈赓，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

陈赓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态度使蒋介石几乎无法下台。沉默好久，正好于学忠来了，蒋才找了个台阶下，对邓文仪说：“你好好说说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这样，蒋介石劝降不成，敌人又把陈赓押回了南京，关进一间很小的牢房，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

后来经过宋庆龄等人多次向蒋介石据理力争，大概也因为蒋介石有笼络黄埔系之意，才没有把陈赓杀掉。

.....

陈赓四进南昌，富有传奇色彩，充分反映了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和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

事有凑巧，正当陈赓率领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南昌欢庆胜利的时候，几乎是同一时刻，16年前曾把陈赓打下监牢作阶下囚的蒋介石，此时也在痛苦地回忆着过去，当然，他不是回忆检讨当时没有杀掉陈赓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在回忆思索，他辛辛苦苦几十年，为什么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彻底败在共产党人手里。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

在上海被解放军攻占的前一天，蒋介石坐“太康”号军舰，从复兴岛驶到吴淞口，与其说是助战倒不如说是观战，来观看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从他手中夺去上海的。

上海黄浦江边有个像片树叶似的小岛，名叫复兴岛。岛的右面是黄浦江，左面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像把快刀似的，把它从杨树浦切割开来。这里离黄浦江的出海口很近。复兴岛东北面的码头上，停泊着装备精良的“太康”号军舰，码头四角，军警如林，江中巡逻的小炮艇，来往如穿梭一般。岛中有一座花木掩映的别墅。蒋介石从溪口退出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溪口是守不住的，尽管他想守；南京也守不住，上海他想守，至少要守上一段时间，那么多金银财宝、机械，往台湾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能守多久？他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并且这只能自己知道。

蒋来到上海后，连日来，在上海市区的金神父路励志社分批召见国军团以上干部训话，命令他们必须死守上海一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再行反攻，他到汤恩伯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总部，听取汤恩伯关于防守上海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作具体指示；他多次接见毛人凤，指示他临走前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民主人士。

他三番五次催促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要尽量加快抢运黄金白银及贵重物资的速度。除此之外，他还需留出相当的时间，对付李宗仁。

早不忙，晚慌张。此时蒋介石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他想忙的事情了。10天前泪别故乡，刚过10天，又要诀别上海，再过10天，还不知道这把老骨头漂向何方？

5月26日晨，蒋介石望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上海半边天，暗自神伤。

夜海茫茫，“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波谷浪峰间跃跃前行，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解放军渡江以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更加棱角分明。蒋经国不离寸步，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的刺激而杀身成仁。

“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轻声地劝说道。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劈头问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失败了？”

蒋经国心里清楚，这个答案父亲最有发言权。从1927年在南京建国，到22年后国将败亡，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父亲一直是一手遮天。当然，蒋经国也是可以说出一二的，就比如几个月前的上海打虎，比如上个月的长江布防.....但这经国能说吗？这问题不是经国敢回答的。

顿时，又一阵沉默。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字字有力，如数家珍似的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 50 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蒋经国，继续说道：

“我们只有另辟溪径，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的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纪纲，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因循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介石好象忘掉了眼前的痛苦，象个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似的，一口气讲了他新的施政纲领。

蒋经国倒是听得很兴奋，父亲这一大堆新思想，和他以前在苏联学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今日，才找到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语言，于是说道：“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么直言恭维蒋介石，作为蒋经国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也来了兴致，小心翼翼地从小本子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知道，这是父亲的日记本。他把折叠着那页打开，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士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父亲刚才对他说的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国家败亡之际，父亲不为失败而气馁，他真为父亲的刚毅和顽强所感动。同时，他也明白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他说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

蒋经国在夜光下看看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遂命令：

“启航！”

“太康”号启动，徐徐离开黄浦江，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蒋氏父子永远地离开了大上海。

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标志着历时 36 天的伟大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八、凯旋五羊城

五羊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胜利形势下的部队整训。中央军委把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没有考虑陈赓和林彪之间曾发生过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郭天民：这个计划将会使部队有大量非战斗减员。林彪：按既定作战方案执行！陈赓：知我者，毛主席也！1949年重阳节，中央军委下达“向广东进军”令。十五军攻占曲江，“海珠桥血案”。陈赓再次“违抗”林彪的命令。

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在解放南昌以后，遂在南昌、丰城、临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一是当时部队正在调整作战部署，二是渡江战役之后，部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态。

渡江作战以来，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整个部队士气高涨，信心百倍，决心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再立新功。但是在少数人员中，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成为部队继续前进的障碍。

这次整训，部队集中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继续进军的准备工作。在学习中，批判了“打过长江就万事大吉”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等不良倾向。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思想。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的指示，使大家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斗志，在全军中进一步提高了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关于第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部署，中央军委根据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的新形势，作了重新调整。

在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进占南昌城后的第三天，即5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四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对白崇禧作战；五兵团三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

兄弟友邻部队互相配合作战，是军旅中军事行动之常事。但把一建制部队划归或者是暂时划归为另一建制的部队指挥，是任何军队的主帅都非常谨慎从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这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问题。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作战中，除了台儿庄大捷之外，这种性质的配合作战，胜例极少。李宗仁台儿庄一役，声名大振。除了他率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取得重大战果，为日寇所惊恐，为国人所欢欣之外，还在于他在此战役中，指挥的并非自己的桂系，也非蒋军的王牌，而是一支诸多部队凑起来的杂牌军，靠这些部队打出如此辉煌的战果，不能不让国人和军事行家对李宗仁的指挥才能钦佩之至。但这样的战例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中是罕见的。

共产党的军队决然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门户之见，不会互相拆台，所以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种配合，在解放军的战史中，可以说很多。

陈赓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林彪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当林彪作为新生进校时，陈赓已经是黄埔第四期步兵科一团七连的连长，既是林彪的学长，又是林彪的上级。

陈赓和林彪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陈赓任国民革命第三师六团

二营营长，林彪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遭到敌人堵击，余部向潮州、汕头方向抵进，又遭敌人围攻，起义部队遭到惨重失败。也就是潮汕地区，发生了陈赓和林彪都终生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指挥部在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带领全营掩护。钱大钧的部队已近在跟前了。他们在掩体后面匍匐前进，突然一跃而起，呐喊着冲锋。陈赓瞄准一个军官，屏住呼吸，放了一枪，可是那家伙却继续前进，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同时他听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急促的步枪声和短促的仿佛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机枪扫射声……陈赓迅速地向两边扫了一眼：他的同志，那些亲密的、同生共死的同志，已经跃出了掩体，准备决一死战。他纵身一跳就跃出了掩体，端起一支步枪，呐喊着向前冲。他盯住了最近的一个敌军，觉得整支枪的份量都集中到刺刀尖上了……他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瘦小的背影朝旁边一闪，陈赓挥动着枪朝他招呼：“林连长，你往哪儿走？”

林彪惊魂未定，忐忑不安地走过来。他刚喊了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就在附近爆炸，距离是那么近，脚下的土地都在震动。林彪的喊声走了调：“我们连没剩几个人啦，撤吧！”

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我叫你带领你们连往上冲！”

“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大少！”林彪一面揉着搓着跌疼的膝盖，一面为自己辩解。

“你再说我枪毙你！”

林彪吓得跳了起来，身体差点儿栽倒。他手扶着墙，看了看周围的人，尖声喊着：“冲啊！……”

后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陈赓和林彪都是共产党军队中的名将，但在职务上林彪要比陈赓高，在红军到陕北时，陈赓曾在林彪作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师长。后来，陈赓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表示，不愿在林彪手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陈赓旅成了刘伯承一二九师中的铁旅。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陈赓兵团要划归林彪指挥，接到军委的命令后，陈赓马上给四兵团的其他领导讲：“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一定要顾全大局，积极配合，不挑选任务，拣重担子挑。”

在中央军委下令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的时候，桂系军阀白崇禧部正在湘赣边境组织防御，企图阻止我军向长沙、衡阳方向前进，迟滞我军向华南诸省进军。从南昌地区赣江西岸撤退的桂系残部，继续在湘赣沿线残害人民。赣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不断派遣代表请求我军渡过赣江西进，追歼残匪。

当时，四野的司令部在郑州，而陈赓四兵团的司令部则在南昌附近，相距2000余里。

追剿白崇禧在华南地区的军队，林彪认为：“为切断白崇禧的退路并将其主力部队一举歼灭在湖南，拟在长沙衡阳地区发起新的百团大战。电令四兵团于7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洲一线，与白崇禧主力决战！命四兵团的三个军为第一梯队，十八军作为兵团的第二梯队。邓华的十五兵团作为四兵团右翼往下插，沿浙赣线，与四兵团南北齐头并进。”

林彪的作战命令下达时，陈赓正在南京开会。由郭天民副司令员召集各军长开作战会议研究。经过研究认为：实施林彪的计划，往西北方向运动，只能侧击白崇禧的尾巴。时值盛夏，部队因酷暑大量减员，如果再打疲劳战，

对下一步围歼白崇禧部队则力不从心。

陈赓队南京返回后，也认为林彪的作战计划不很妥当，让郭天民副司令员向林彪提出意见，建议林彪更改此作战计划。

林彪回电坚持既定作战方案。

陈赓由南昌回到兵团前指驻地樟树镇，正式向军委陈述了个人的意见：据长江北同白崇禧部队作战所知，白狡诈凶险，正面作战不易歼其主力。必须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而此次侧击行动根本不是迂回，构不成对敌之包围。我部人马逾万，稍有动作，极易被敌发现。而一旦发觉，敌即火速退缩两广，于下仗极为不利。又，时值盛夏，北方兵多，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甚多。故建议：充分利用我兵团之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搞大迂回，占广州，堵截敌向广东之逃路。同时也表示，部队正在待命，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

电报同时上报林和刘、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肯定了陈赓的意见。

7月16日，中央军委给二、四野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阳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办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7月17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拟电就“追击白匪之部署再致林彪”，指出：

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属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从7月中旬开始，按照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部署，四兵团向湘赣沿线挺进。

陈赓命令十三军、十四军渡赣江作战，十五军由福建向江西临川开进集结。

很快，十三军、十四军配合四野兄弟兵团，冒着江南盛夏，在樟树至吉安的前线200里上渡过赣江，连续解放了峡江、吉水、吉安、安福、新喻、清江等六座县城。

在吉安附近的战斗中，歼灭白崇禧部二十三军的两个营。另部我军则于同时解放奉新、高安两县城，守敌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向南逃窜，被我在高安以西的扬公圩、泗溪一带截击，其第五二六团大部被歼。我军继续向西挺进，又解放了萍乡以东湘赣铁路上的分宜县城，及其西南安福和莲花间的洋溪，另部解放分宜西北的万载县城。

这次进军，部队各历艰辛。如第十五军各部冒着酷暑兼程西进时，一直沿着崎岖的小路进军。通过隘路的时候，牲口不能驮载，战士们抬着炮身行进，用被单撑伞遮阳，用竹筒自制水壶储水。沿途村庄稀少，经常冒着大雨露宿野外，蚊虫成灾，战士用夹被撑起当蚊帐。由于酷暑炎热，加上过分疲劳，行进途中不少体弱同志中暑晕倒或患各种疾病，各个部队都有数量较多的病员，骡马也有许多生病。部队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

在部队进军途中，也受到了赣西人民的热烈支援，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我军强渡赣江那天，有 40 多只船集结在埠头渡口上，有些女船工也赶来支援部队渡江。在敌人猛烈炮火下开始渡江的时候，船工们争相让突击队员上自己的船。他们一个个戴着红色的布条，努力争取渡江第一船。那天撑得最快的，是刘景山父子的一条船。解放南昌之战中，我军一部渡江迂回敌人，刘景山曾在三湖一带摆渡三天三夜。这次又带着老婆、儿子和儿媳，摆渡我军追歼白匪。他说：“我受了几十年的苦，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自己的队伍来了，可该翻身啦！”

55 岁的刘志汉，和他 16 岁的孩子及 17 岁的儿媳妇，也来摆渡我军，还和刘景山父子展开了竞赛。

刘志汉见刘景山父子的船赶过去了，便对儿子儿媳说：“墨云，宝珍，快！赶过他们去！”他把手中的橹紧摇几下，水花直向船打来，船就象箭一样从斜面里赶上去。炮弹不停地在西岸爆炸，战士们在船头鼓劲，刘志汉更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他说：“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红军从这里走时，没有大炮，现在什么炮也都有了！队伍也大了！”他看着黑烟连续在对岸升起，兴奋得不知如何才好，只是拼命地摇橹，赶过了刘景山的船，当了开路先锋。

某团五连在鹤巢地区追上了白崇禧部一八八师。担任全连搜索哨的四班，先和敌人开了火，全连立即展开火力，投入战斗。

敌人先绕到右翼一排的阵地上，企图占领一排阵地后，从四面包围二排。接连四次进攻，都被一排击退。

敌人看进攻一排不成，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二排阵地。猛烈的炮火，几乎把二排阵地上的土翻了过来。待敌进到距离我方阵地只有 200 米处，刘全声的机枪在左，老战斗英雄蒋心元的机枪在右，交叉着向敌人猛烈射击。蒋心元站起来端着机枪打，负伤后站不起来了，就趴在地上打，再次负伤时才把机枪交给刘振成。

战士们打得急了眼，全都站起来打。10 多个敌人倒下来，剩下的拉着死尸往回跑。排长马小毛右肩被打穿了，头上也被炮弹片擦了一块，脸上流满了血，仍在阵地上检查大家的工事。同时叮咛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这是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啊！”

不久，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向第二排阵地猛射；随后，敌人出动四个排的兵力，分两路迂回过来。四班副耿福成在阵地上来回跑着监视敌人。他看见一个戴大沿帽的敌人，用冲锋枪逼着几个士兵柱上冲。他瞄准就是一枪，大沿帽立刻和脑袋分了家，其他几个敌人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在冲锋枪的逼迫下，敌兵象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接近到我们阵地 30 来米处，刘金声、刘振成的两挺机枪，一齐端起来向敌人扫射，耿福成首先站起来甩出一颗手榴弹，战士王建华一个炸弹正投在敌人中间。接着便一阵手榴弹的轰鸣，敌人又留下几十具尸体退了下去。

敌人退下去后，战士们拾起敌人丢过来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一看，原来敌人过于惊慌，都没有拉弦。

二排长马小毛又负了伤，四个班长全负了伤，全排只剩下了 10 多个人，子弹已经快完了，手榴弹每人只剩一个。四班副耿福成自动担负起艰巨的指挥任务。他向大家说：“同志们，都上好刺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同志们齐声响应。敌人又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向二排阵地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敌人进到 60 多米的地方，再也不敢前进了。爬在地上瞎嚷嚷。

耿福成命令机枪手，远了单发，近了连发。敌人在远处嚷了半个钟头，

才接近到 20 多米处。我军的机枪刚一响，才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就吓退了。随后敌人发动的第四次进攻，也被顶了回去。

待后续的六连赶来，敌人遂即乱了阵脚，丢盔弃甲。

7 月 19 日早晨，我军某团派出的侦察小组，在宜春新田乡上龙源西山岭地区，发现一股敌人。这伙失魂落魄的敌人，一发现我军战士，就赶紧逃窜。侦察组报告团部后，团里决定追歼该敌。

八连一排飞快地抢占了敌人逃进的山左边高地，封锁了东面的逃路；七连和八连的两个排，即从右侧迂回到山后；九连由正面进攻敌人。

由于我军的灵活指挥，一下子就把敌人一个营紧紧包围在一个山头的狭小地带，只有南面留下一个空子：悬崖绝壁。

冲锋号一响我军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凭着装备优良，据守山头作垂死的抵抗。勇士们奋勇向前，营长贾德法带通信班冲在最前边，敌人见状，赶紧打出白旗高喊：“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投降。”冲在最前头的通讯员王文生大声说道：“投降就快点放下武器。”

敌人马上将枪枝挂在前面的树枝上，并且吹哨收拢尚在顽抗的敌军。

当一排冲到另一个山头时，一群敌人把武器放在地上，高举双手说：“我们投降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了。”

其它山头的敌人，也都相继放下武器。这样，我军无一伤亡，以一个营的兵力全歼敌江西省保安第二团第三营，生俘代理营长戴及松以下官兵 230 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

赣江西岸追击战中，状如惊弓之鸟的敌正规军，也同样稀松不经打。

7 月 24 日，某师侦察连的一个小组，在泰和城西南 10 余里大塘下村公路两侧的高山上。发现敌情，双方立即打起来。年轻的侦察连长丁永泰，得到侦察小组的报告，即刻率领 20 名侦察员，冒着烈日自大塘下正北山地，向西越过险峻的黄坑岭，再直扑正南插入敌后，绕到大塘下村的西南，钻入敌人的腹地。

等到天一黑，丁永泰带领侦察员冲进泰和、马家洲间的武溪街，此时一股敌军正沿公路逃窜。汤姆枪组赶紧追赶上去，咬住了敌人的尾巴。枪一响，敌军拼命逃跑；武溪街西南池头村的敌军正在吃饭，一听枪响，连忙丢掉饭碗南逃。我军一直追了七八里，抓到两个掉队的敌人，问清敌情后，丁连长决定停止追击。

这时，马家洲的敌二十三军二一一师师部，和分布在左右侧翼的敌军，慌忙向公路上集中火力，盲目乱射，乱打照明弹。当丁永泰带着这 20 名侦察员往回走，刚到大塘下村西南时，突然发现一股敌军迎面而来。

走在前面的六班长王美善，机警地大声问：“哪一部分？”敌人回答：“六三三团。”王美善高声喊道：“来一个！”随即跑过来敌人一个步兵班长。王美善立即低声命令他缴了枪，逼令他伏在地上高喊：“八连过来！”经过敌人预定的竹哨子联络后，敌八连乖乖地进入侦察员临时布置的伏击圈内。开火只三分钟，敌二十三军一个连就全部缴了械。

敌人还有一个连，原来警戒在大塘下两边的山地上，他们听到背后枪声大作，撒丫子便跑，恰好碰上我们的侦察员，这个连除极少数逃走外，也大部被俘。

丁连长和他的 20 个侦察员胜利归来了，马家洲敌军的炮火和照明弹，却彻夜不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时断时续。

这股敌军是从长江北岸大别山地区，一直被我军追赶逃到这里来的，士气低落，逃亡很多。在我军俘获的敌一一八师一个逃兵的日记上记述：5月14日在九江全连有77人，6月28日在新喻只剩61人。敌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在广水防守平汉铁路时，每连尚有110到120多人。在南逃的两个月中，第五连就逃亡了36人。由于士兵逃亡，这时全团人数最多的连只有70人，少的只有58人。

投奔我军的一个副班长傅根年说：“从湖北广水县南撤的一个多月，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鞋子也不发，十之八九是光着脚逃跑。许多人脚坏了，走不动路，当官的就用枪乱揍。第四十人师的五个逃兵中，就有四个挨过打，这样的日子，准能忍受得了。”

第四兵团在西渡赣江、南下湘边这段日子中，除了日夜进军进行军事作战外，还必须同炎热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在7月下旬，部队进行以“人马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短暂休整，医治病员，恢复战士体力。8月上旬，部队配合四野兄弟部队，沿江西通往广东的公路，并肩向赣南前进。部队抵达赣州南北公路两侧地区，获得沿着粤赣边界五岭山脉一线的前进基地，准备时机成熟，即向南扩展，解放敌人盘踞的广东省。

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余汉谋部。当时余汉谋是广州绥署主任兼广东省主席。该集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属势力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共三个兵团，下辖10个军、28个师共约12万人。另有五个保安团、四个保安纵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共约两万余人。此时，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体系”，以湘南衡阳、粤北韶关（曲江）为布防重点，以保障两广。关于广东省境的具体军事部署，余汉谋又根据伪国防部的命令“巩固粤北，确保广州”，在广东省内组织防御。其兵力部署是：在以曲江为中心的粤北地区，以其主力第三十九、六十三两个军布防，先头伸至南雄、乐昌，为第一道防线。由方天（十三兵团）指挥二十三、七十军，以英德为中心，沿粤汉路及其以东的翁源地区布置其第二道防线。以第二十一兵团刘安滇指挥第三十二、五十军集结于广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上，和以东的从化地区，布置第三道防线。胡璉（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十、十八军集结在潮安、汕头地区，准备策应方天兵团作战。以第一九军、绥署警五团、宪兵第十七团、第二十六团维护广州。敌第六十二军则驻湛江市，维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联系。

自李宗仁从桂林来到广州后，广州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所在。

李宗仁到达广州当日，在飞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把和谈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谓中共“如欲始终以兵戎相见”，并表示他“决将领导政府”，作“坚强之抵抗”。

李宗仁的书面讲话，深受蒋介石的欢迎。蒋立即表示支持，并给在广州的军政人员“民众团体”颁发命令，谓“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

李宗仁到广州后，中华北路的迎宾馆，成为“代总统”的官邸。李宗仁另有打算，他曾和张发奎等人商议，实行两广联盟，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在军事方面，主张固守湘南、赣南，稳定住华南局面，以此争取美援。同时扩编新军，在粤桂两省迅速编组二线兵团，必要时退守海南岛与蒋介石控制的台湾并立。政治方面，以撤换忠于蒋介石的广州市长和警察局长为开端，逐步消除蒋在广州军政方面的党羽，以两广人代之，彻底从蒋手中

夺回广州的军警权和财政权。

李宗仁的这些活动，自然瞒不过耳目灵便的蒋介石。况且，两广职员反蒋在历史上屡有发生，蒋介石不能不防。李宗仁到广州以后，蒋介石密切注意着两广将领的活动。

李宗仁认为，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争取美援为首要，而要争取美援，则要让自己人当外交部长。抓军队，自然应把国防部长搞到手。李宗仁计划，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甘介侯当外交部长，张发奎当总参谋长。

从何处下手呢？改组行政院首当其冲。

何应钦难得清闲，不久之后，何提出辞职，李代总统立刻照准。

准来入阁，李宗仁选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想利用居正实现自己的计划。但居正被提到立法院时，CC系和黄埔系的人马来了个大发动，“发扬民主”，把居正给投票否决了。

阎锡山劝驾李宗仁归穗，给蒋介石效了犬马之劳，不久即被委任为国防部长。选行政院长，蒋又想到了阎老西。阎又当了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蒋说胡适最合适。胡适精通英语，曾获美国博士学位。阎锡山是推荐不出这样的人，桂系想沾手外交，也一样落了空。

在和谈时，蒋介石还觉得李宗仁有利用价值，此时蒋介石也就不再借重李。

而李宗仁在广州的一番动作，连桂系中的亲近在内，都认为再跟着李已经没有什么指望，纷纷作鸟兽散。去台的去台，赴渝的赴渝，李宗仁的门庭，愈加冷落。

7月初，蒋介石准备再到台前执掌帅印，因此，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

对外，蒋飞赴菲律宾，与季里诺举行“中菲会谈”，会后发表文告，鼓吹建立“太平洋反共联盟”，而且准备邀请南朝鲜的李承晚入盟。蒋又另派吴铁城赴日，与麦克阿瑟及日本军政界加强联系。

对内，蒋进一步加强对桂系的打击，分化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对白，利用其现实利害观念，一方面不伤害其现有军权，且若隐若现，以更大的军权作为诱饵，加以羁縻；另一方面也巧妙地暗示白：如不听招呼，他手中的军饷立刻就无处发落。

7月初起，广州方面不断传来蒋介石要来广州的消息，李宗仁也深感这傀儡当着不是滋味，自觉利用代总统这个名目再难有任何作为，故也一再表示，欢迎蒋到广州主持一切。

在这一段时期内，蒋系人物在各方面，也都已为蒋复出做好了准备，只待蒋的到临，使之公开化、合法化而已。7月14日，蒋带领一批人马，飞抵广州。蒋故意把行动弄得神秘秘密，事前不通知李宗仁，在飞机场迎接的，只有陈立夫、蒋经国、余汉谋等几个人。等李宗仁知道后，满头大汗地赶到机场，蒋介石早已进了广州城。

蒋介石到广州后，汽车直驶行政院，当时国民党中央会和中常会正在开会，忽报总裁光临，举座震惊自不待言。蒋随后即到代总统办公厅进行看望。来之前，不通知，说是“怕惊动大驾”，到之后，先拜访，表示礼数甚周，把李宗仁弄得很尴尬。当时，李宗仁向蒋请示，当天举行仪式时，大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大礼服。李宗仁立即派人往香港赶制大礼服。后蒋说要穿军服，李宗仁又穿了军服，胸前佩齐勋绶前往。岂料蒋介石出现时，穿的竟是长袍马褂。行完仪式，蒋一人先走，对李睬也不睬。李宗仁跟在后边，活象

个随从，个中滋味实在难受。

蒋介石住进梅花村 32 号陈济棠的公馆内，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议案，选举蒋为主席，李为副主席。副主席原拟设二人，除给李一席外，另一席给孙科，但为了照顾一下李的面子，最后让孙科作了委员。其他作委员的，有阎锡山、张群、何应钦、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几乎一色蒋的亲信。秘书长为洪友兰，只是给了桂系一个副秘书长的职位，叫程思远当，程一个月后也辞职不干了。

“非常委员会”照规定，总统及行政院的一切措施，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可实际上，蒋总揽一切大权。这不但气恼了李宗仁，更使张发奎怒不可遏。在“非常委员会”通过的当天晚上张发奎来到李宗仁的住处，向李宗仁建议：

“德公，我们一不做，二不休，趁蒋介石在广州，我们把他扣起来！”

李宗仁喟然长叹：

“白华兄，把他扣起来。最多使你能出一口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兵，我们调不动，他的钱，我们从台湾又弄不出来，扣他只能使我们徒招恶名！”

“德公，你只要把老蒋扣起来，便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我们两个团结起来干，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退保海南争取美援嘛！”张发奎颇不以为然他说道。

李宗仁苦笑，说道：“白华兄，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也不会干啊！”

“德公，你胆子太小，斗不过老蒋，只有任人欺辱，两广算是没救了。”张发奎说完，愤然辞出。

在这天的同一晚上，蒋介石在黄埔秘密召见了白崇禧。蒋在讲了一大段蒋、白一贯合作密切的“光辉”历史之后，对白崇禧说道：

“健生，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中央已决定将国府迁往重庆，本党绝大多数的同志要我复任总统，以利勘乱救国，你的意见如何？”

蒋介石表面上是想征求白的意见，实际上只不过是拉拢白的一种手段。蒋的下野，白出了大力，但现在可不是半年多以前的形势喽！白崇禧不同意蒋复出，怕也阻挡不了。所以，蒋介石问过白崇禧，根本就没有白答话的间隙，又接着说道：

“如我复出总统，拟请你来组阁，由你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全部交给你指挥，我们可以胡宗南的部队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你的华中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这样，我们便能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和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

蒋介石的一番话，使白崇禧听得热血沸腾。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召他来此谈话的全部目的。蒋介石已成功地折散了李宗仁倡导

的两广反蒋联盟、反共反蒋争取美援的计划。现在，又要下手折散

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几十年来所建立的特殊关系了。折散两广联盟，再折散李、白合作，李宗仁便无以存身，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将彻底被摧毁。李宗仁倒了，白崇禧能单独存在吗？这在以前是不能

的，现在呢？这大半年来，他对李宗仁是越来越不满。他全力以赴把李

宗仁拥上代总统的宝座，但他从中未得任何好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为了统一指挥两广的防务，他曾向李宗仁要求兼任国防部长。但李宗仁毫无办法，硬是被一个光杆司令的阎老西争了去，而且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李宗仁当代总统，徒有虚名，一点权也没有。现在，蒋介石有意让他组阁，由他指挥全军，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但是，他毕竟和李宗仁合作了几十年！他不能做对不起李宗仁的事。

白崇禧陷入沉默……

蒋介石见白崇禧沉默不语，知道他是下不了和李宗仁决裂的决心，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加紧进攻：

“国家已到了这般地步，难道你还不明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你不干，我也不干！现在只剩下滇、桂、川、黔四省完整的地盘和 100 余万军队，干脆都给共产党吞了吧！我蒋中正正是党国历史上的罪人，你白健生也是罪人，因为在这挽救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中，你不愿意跟我合作！”

“介公！介公！请不要再说了，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介公，一个是德公啊！”白崇禧最后选择了蒋介石。

白崇禧毕竟和李宗仁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认为蒋介石找他密谈这样的事不能瞒住李宗仁，因此，他从黄埔一回来，尽管夜已很深，还是来到了李宗仁的住所，把蒋召见他的谈话内容全都说了。李宗仁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不动声色地问道：

“老蒋的这些话可信吗？”

“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白崇禧很认真地回答。

听了白崇禧这句话，李宗仁心里已明白了白崇禧现在正想什么。也是关心也是气愤地说道：

“现在形势难卜，你以后怎么办？”

看来，白崇禧退路是已经有了考虑，但又不愿让这位几十年的老大哥太生气，就试探着说：

“德公，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

“王八蛋才去台湾！”不知道白崇禧这句话刺激了李宗仁哪根神经，李宗仁竟勃然大怒，挥舞着拳头在屋里大吼起来。

几十年来，李宗仁一直以宽厚忍让的面目出现，对白崇禧等既爱护又尊重，从无粗话，而李宗仁今晚一反常态，使白崇禧惶惑不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经过 8 月份的“人马健康”运动的休整，战斗力恢复很快，指战员们精神旺盛，整装待发，准备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下，将立刻向广东地区进发，解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

9 月 9 日，中央军委给二野和四野四兵团致电，命令：

无论湘南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将其主力退至广西、背靠云、贵，面向广西北部 and 东部，与我对峙。如广东问题不能早日解决，迅速歼灭白崇禧部，解放广西则不可能。为此，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于湘南战役开始后，即向广东进军。

9 月 11 日，林彪下达作战命令：以陈赓兵团三个军，邓华十五兵团二个军、两广纵队、林平纵队等共 22 万人，由陈赓统一指挥，组成左路军，担负左翼战略迂回任务，于湘南作战同时，开始向广东进军，切断白崇禧部向广

东的退路，尔后配合四野中路、右路军歼敌于广西境内。

左路军接到进军广东的命令之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和陈赓主持。陈赓强调：二野四兵团要在林总的指挥下，在叶参座为首的华南局领导下，进军两广。要注意兄弟部队的团结，主动配合，向四野老大哥学习。他指出：“道路拥挤时，我们走小路；住房紧张时，我们住小村；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抢着承担。”

左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全线部队争取9月下旬赶到粤赣边境集结，然后兵分三路进军广东。以四兵团为右路，先取曲江（韶关），尔后以一部兵力直插三水，截断广州之敌的西逃之路，主力沿粤汉路南下，从西和西北方向围歼广州之敌；以十五兵团为中路，先奔袭翁源之敌，尔后主力沿粤汉路东侧南下，以一部兵力攻增城，断敌沿广九路东逃之路，主力从东及东北方向包围广州；以两广纵队及林平纵队为左路，负责切断广州与潮州地区的联系，协同右路、中路军攻占广州。

会后，我军即按计划开始行动。为使部队逐渐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的行军作战特点，陈赓专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行军计划：开始时，每天行军四五十里，叫适应性行军，主要利用夜间天气凉爽时上路，尔后逐渐加快行军的速度，待距曲江百余里时，再采取急行军速度，奔袭曲江。由于部队按此计划行军，高高兴兴，轻松愉快，减少了非战斗减员，保持了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士气。

曲江又称韶关，地居北江上源，南制广州，北控湖南衡阳，为粤北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白崇禧集团向广东南逃的必经之地。解放军占领曲江，就切断了粤汉路，也割断了白崇禧与余汉谋的联系。余汉谋深知曲江得失对于“湘粤联合防线”的利害关系，不断增派援军到曲江，妄图与衡阳之敌相互呼应，使曲江成为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这条防线东翼的重点。9月下旬，余汉谋相继调来第三十九、六十三、九十七军及白崇禧集团的主力第四十六军等部，同时增调第二十一兵团一个军进至英德地区，以策应曲江。妄想凭借“对外封蔽，对内完整”的广东地理形势，负隅顽抗。

9月下旬，我军开始全面向广东进军。

10月2日，我各路大军进抵粤北。

余汉谋一看解放军大兵压境，来势凶猛，生怕自己的嫡系被吃掉，急令三十九军调往英德，仅留非嫡系的六十三军留在曲江。

10月6日，我军开始进击曲江。

为了避免惊动曲江外围的敌人，我军一支轻装部队，头一天由始兴出发，经由始兴西南人烟稀少的老龙坑岭悬崖绝壁的山地迂回前进。正面部队则以惊人的速度，沿始兴至曲江公路前进，追歼闻风而逃的敌人，经130里急行军进逼曲江。

曲江城内之敌惧怕被歼，其六十二军沿北江西岸弃城向南逃窜。当我军7日晨进抵曲江城东河坝时，敌六十三军最后撤退部队用汽油点燃韶关公路大桥后，已向西南逃走。我一三四团二营见桥头大火熊熊，便命部队立即救火。幸好木桥尚未被烧断，经过一阵奋力抢救，使韶关桥保留下来，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迅速地开进曲江城。

10月7日1时，十五军解放了粤北重镇曲江。此时，粤北的大门洞开，敌人沿着铁路拼命南逃。陈赓立即命令先头部队：“敌人弃守曲江而逃，我们必须立即改攻坚为追击，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扭住一股消灭

一股，兼程向广州前进！”

十五军四十五师日夜兼程，每天行程 130 里以上，两昼夜行进 300 多里，于 9 日 16 时，开始向英德城及英德车站守敌发起攻击。

敌守军遭到袭击，顿时混乱。我一三三团七连一班班副郭贵喜，和三班班长葛风荣带领的战斗小组，仅五分钟就冲上了山顶。后续部队紧接着就涌了上来，迅速占领了车站以东高地，将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营打垮。敌人东逃西窜，缴枪的缴枪，逃命的逃命。

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把车站的敌人完全解决并控制了车站阵地。但在英德车站南边的遥步墟大铁桥周围，还有敌三十九军的一个团在负隅顽抗。这座铁架桥架在翁源江上，长达 280 米，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一座铁桥。敌人企图在守不住铁桥时，将它炸毁，以使翁源江南之敌凭险顽抗。

当天夜里，我九连奉命抢夺桥头阵地。临近桥头时，我军掩护冲锋的机枪一齐响，守桥之敌逃向山上、竹林和村庄。

九连战士，三分钟即冲过 300 米宽的铁桥，将敌人已经安装好的炸药导火索切断，大部守敌被歼。

敌人一个团被我歼灭了，遥步墟大铁桥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当日我军即解放英德县城，歼灭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的一个营。

10 日上午，我四十五师进至英德南 50 里的万公桥，遇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进行抵抗，我军向敌发起攻击，占领了两个高地，当晚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11 日晨我军向该守敌发起攻击，该敌在空军和装甲车的配合下，与我激战了五个小时，敌人被歼千余人，向南溃退，下午，我军攻占万公桥的黎洞圩车站。

13 日中午，我军尾追敌人，渡过滔江，14 日在源潭击溃敌一三师、一四七师四个团，俘敌千余人。残敌一部乘火车南逃，一部向西逃窜。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继续追击。当日 20 时直出银盏坳车站，逼近广州城郊。

十四军四十师的先头部队。于 13 日逼近被称为“广州五星城”的清远县城。在我大军越过五岭南下的时候，敌军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攻击，沿着北江，北起连江口，南迄清远城一线，慌忙布置了一道自嘘为“敌人不能染指”的防线。但是实际上这道防线，同样经不起人民解放军的勇猛攻击。

我四十师一一九团，在 12 日傍晚，由英德以南 60 里的下步墟，开始前进，当夜水陆并进，八个钟头疾进 120 里。13 日拂晓，在清远以东 40 里的塘口展开攻击，击退敌二十二军二一一师、二一三师的阻击，到入城为止，只用了九个小时。敌人的这一道防守广州的防线尚未完成，即已为我军击破。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守军部署全部瓦解。曲江、英德、翁源、花县、增城等地相继解放后，广州震动，守敌分经广九铁路、珠江、西江诸方向溃逃。至 13 日，我右两路大军均已进至广州城郊。

虽然在表面上敌人故作镇定，盘踞广州的薛岳、余汉谋等，10 日那天还在扬言要“决心死守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各界反共宣传大会”，而与此同时，却在加紧争向香港、重庆、台湾逃命。美国陈纳德“民航大队”，日夜不停运送这批“高级难民”。那几日渝穗班机，只飞到柳州即回返，目的是多运出一些国民党的头面人物。12 日起，国民政府首脑作鸟兽散，李宗仁逃向桂林，阎锡山逃向台北，余汉谋和薛岳乘军舰溜向海南岛。

10 月 14 日下午 6 时 30 分，四野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一二八师，自北郊进

入广州市中心，并与沿广九铁路自郊区进入市区的一三二师会师，解放了我国南部这一座最大的城市，提前完成了毛主席争取 10 月下旬占领广州的计划。至此，我各路大军共歼敌 22000 余人，解放了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在我军解放广州的过程中，留守广州的敌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海珠桥血案”。

10 月 14 日下午 6 时，正当我军从广州以北、以东方向挺进广州市区的途中，从市区突然传来震天的巨响，霎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我军迅速进入市区，很快查明，这里敌人从广州撤退逃跑以前，丧心病狂地炸毁了连接珠江南北两岸的海珠大桥。

在广州解放的前几天，从敌人内部即传出消息说，要破坏海珠大桥、天河机场、水电厂、电话局等。市民得悉，即由工商业界先后多次派出代表，向市长李扬敬、市警察局长吉章简请愿，反对破坏，但毫无结果。

10 月 14 日下午，正当拥挤的行人车辆通过海珠大桥时，一部敌军来这里宣布对大桥实行“紧急戒严”，所有行人车辆均被赶散，敌军控制了该桥附近的大街小巷。不久敌军又解除了戒严，使车马照常行驶。当时谁都没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敌军实施“戒严”，早已是家常便饭。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已在四座桥墩上绑好了 400 多箱黄色炸药。

当日下午 6 时，桥上像平常一样走着行人和车辆，桥下突然响起轰天巨响，一时浓烟冲天，钢铁碎屑和断砖残瓦四散纷飞。桥下坍时，使桥下 20 米的水面漩成深涡，浪涛和被炸破的船板飞腾冲天，高达几十米，一时南北两岸三里内的房屋墙壁，纷纷折裂倒坍，水泥钢骨碎块飞啸穿空而过，殃及附近十数里区域内的居民安全，群众被炸死炸伤 500 余人。大桥左右死尸狼藉，血肉模糊。珠江北岸东起德政路，西至仁济路口，每家都受了损失，无一幸免。珠江南岸人民受的损害更加惨重。南华中路一带的房屋完全倒坍，西侧排列着的 150 米长的鱼市场，房舍全部震毁，仅在这一带，就有近百名市民葬身瓦砾之中。

从 10 月 7 日我军解放曲江，到 14 日晚解放广州，仅仅不过八天时间，充分显示了我军奋勇前进、雄伟无比的力量！

还在广州解放之前，我军估计敌人的逃跑方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沿西江向西，进入广西；一是沿广东海岸，逃向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

10 月 12 日，毛泽东电令陈赓：如果查明广州一带敌人向广西地区逃窜，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追击。

10 月 14 日，四兵团十五军先头部队和十五兵团部队，在同一时刻抵达广州市郊，后续部队也经陆路、水路不断赶来。

陈赓当即命令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部队不进广州，继续向佛山追击。秦基伟在电话中当即表示：“我们坚决执行！”

接着，陈赓又命十四军军长李成芳，迅速占领三水，堵敌西逃。

14 日晚，十五军攻占佛山后，继续追歼逃敌。

15 日拂晓，十四军攻占三水。

正当陈赓兵团疾速追歼逃敌的时候，林彪电令陈赓并直接下达命令给各军，主要内容是：如广州之敌逃窜，我不要追击。……

陈赓认为此命令难以执行，立即让通信科长戴其萼接通三个军长的电话。

陈赓给三个军长说：“追击敌人总不会犯错误，仍按我们原部署执行，

继续追歼逃敌！”

三个军长和陈赓的意见一改，都表示继续追歼逃敌。

16日，十四军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二军三十八师占领高要。

十四军追歼敌三十九军一部，迫使敌一三师4000余人起义，并查明了敌人主力向阳江方向逃窜。

陈康立即决定，由李成芳指挥十五军四十四、四十五师，十四军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三军三十八师，昼夜兼程向阳江追击，合围逃敌。并命十三军主力向茂名前进。

李成芳为争取时间，将六个师编成三个纵队，大胆打破了各师的原建制。这种编组方式，大大加快了向恩平、阳江进军的速度。

李成芳此举深受陈赓赞扬：“成芳干得漂亮，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办事就是要多动脑子，发挥主动性。”

为避免林彪干涉，陈赓兵团的追歼行动，一直没向他报告真情。

17日深夜，陈赓收到毛泽东电示，否定了林彪不许四兵团追击的命令。接着，叶剑英报中央军委并发四野司及陈赓的电报也来了，

建议陈赓兵团向南追歼逃敌。

24日，四十二师攻占阳春，至此，陈赓兵团经10昼夜的追击，终于将从广州逃跑的敌第十二、二十一兵团，三十九、五十、七十、二十三军残部抓住，对敌形成了东西北三面包围的态势。

25日黄昏，四兵团对阳江之敌发起总攻。战至26日中午，全歼被围之敌近5万人。

10月27日，陈赓到达广州。在广州，阳江、粤桂几次战役的间隙，陈赓曾在广州作短暂的停留。11月11日，广州市人民欢庆解放，迎接人民解放军，举行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次大游行是在阅兵式后开始的，陈赓陪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一起检阅部队。

羊城的10月，鲜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花香。陈赓感慨万端。25年前陈赓在这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他戎马生涯和投身革命的起点；陈赓想起了许多，想起了国共合作联合北伐的壮举，想起了广州曾有过的血雨腥风，想起了蒋先云介绍他入党的动人情景……想到这些，陈赓的视线有些模糊了，望着远处的黄埔岛不由得感叹道：“江山如故，昔人何在哉！”

九、粤桂大围歼

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不如二野、三野对调。刘伯承：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毛泽东：我可没有偏心啊！

阳江围歼战充满动人的故事：战斗英雄张玉生一人抓住 200 多个俘虏。解放军一个班俘敌一个师。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爬行着俘虏了 30 多个敌人。

白崇禧声东击西发动“南线攻势”，林彪判断失误和陈赓发生分歧。郭天民把给军委的电报写成了批判稿。毛泽东致电林彪：照陈赓前提部署。

广州解放以后，第四兵团诸军继续南下粤桂追歼逃敌。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祖国西南边陲，欲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次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的连同非正规部队和后方机关学校在内的总兵力仅剩 150 万。这些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在大陆的最后挣扎。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蒋介石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

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桂军阀，负隅顽抗。

为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部署：

- 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区）；
- 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
- 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
- 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各省；
- 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在中央军委作上面战略部署时，曾征求各野战军主管的意见。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

刘伯承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

“我可没有偏心啊！”毛泽东见状呵呵一笑，对中央军委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作了解释：“三野的老底于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轻车熟路，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49 年 7 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的战役行动，就是中央军委进军华南、西南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当时，中央军委部署，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五兵团部队，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中央军委还决定，当时位于陕川边的一野部队及华北十八兵团等部，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在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其退往康滇的后路切断时，即由贺龙、李井泉率领，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该敌，并迅速占领全川，布置春耕，开展地方工作。

随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进，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党中央为了适时加强对大西南党政军的领导，适时地开展地方工作，在二野出击大西南之前，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西南局共有委员 24 人。

在中央军委下达向大西南进军的次日，即 7 月 18 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后勤工作等问题。

根据前委会议研究的意见，二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

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由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

一、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 and 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的和深入的克服存在着的骄惰、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的坚决前进。

二、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那里“好”那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三、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贯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是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

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外，必须以极认真负责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

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7月26日，为了解决好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刘伯承司令员亲临三兵团，对该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他又在二野直属队党代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党代表会议，是代表共产党员的会议，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

针对某些干部开始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乐的情绪，刘伯承尖锐地指出：“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免得使我们犯错误。二野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大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无法接受工作与进军西南的任务。”

他告诫说：“我们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和农村的土改工作，国民党的统治区的地下斗争的配合而得来的，更不可以为枪杆子打出来的了不起，个人了不起，这是军人非常可怕的现象，要经常警惕。否则，小则犯错误，大则不可设想，更甚可看到张国焘之流的榜样。”

在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之前，经过在部队认真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批判，使部队的艰苦奋斗正气上升，居功骄傲，违法乱纪的歪风受到压制和打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提高了广大党员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性，也使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就保证了部队进军西南，建设西南的伟大使命的完成。

8月19日，刘、邓发布了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

甲、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乙、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会川问题。

丙、各部队之行动部署：

1. 五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四团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邻阳、湘潭之线，争取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

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

2. 三兵团附特纵之炮九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目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地，协同五兵团作战。

3. 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战，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 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

5. 三、五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具体的布置，并报告本部备查。

6. 特纵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丁、本部拟于10月底移至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

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

9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向湘西、鄂西开进。三、五兵团按预定方案，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向集结地疾驰。

9月7日，刘伯承从郑州动身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

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诞生，并向世人宣布：第二野战军正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执行解放西南华南的任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刘伯承作为开国功臣，并排与毛主席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次日，赶到徐州，登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西进列车。10月23日，刘、邓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三、五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作战目标。

当刘伯承司令员踏上西进的列车时，陈赓率领四兵团正在向广州逃敌进行勇猛追击。

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晚，四兵团各路大军未进广州城，即向广州西南方向前进。

15日晨，十四军部队进占三水县城；十五军部队占领佛山。

十四军占领三水县城之后，继而又占领高要，卡住这个水江、西江的汇合点，就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

被我紧紧追击的国民党军中，有许多是自江西中部一直被赶到南海来的；另外一些，则是从粤北被击退下来的。这些逃敌，长期处于恐惧、疲困、

悲观的逃亡中，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他们只得绝望地哀叹：“只有投降才是活路！”

我军占领三水、西南镇时，逃至三水东南西冈头的一三师，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自知逃跑无路，15日下午，我军正要围歼这股逃敌，敌师长曾元三派出洽商投降的代表，由西江对岸乘一只小船过来。敌方代表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完全接受解放军和平条款处理。”次日，敌师长曾元三过江来作进一步商谈。18日中午，敌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即率领一三师师部及第三八、三九两个团，共计4000余人，遵照我军司令部的命令，渡过西江到达指定地区，集中投降缴械。

16日下午，我一一八团于三水战斗结束后，迅速渡过西江，尾追向高明方向逃窜的敌第三十九军军部及一四七师残敌。17日晨，一一八团率四个连的兵力，在松柏坑与从金利圩向高明逃跑的敌十七师遭遇。我二营六连从左翼迂回堵击敌人退路。

我六连迅速抢占了松柏坑及其西南高地，将敌人压到沟内，发起攻击不久，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

我三营八连、九连直插新庄，残敌在我猛烈打击下，已无路可走，敌四四一团团长姚涤民即率部1200余人，举着白旗向我投降。

在我军猛烈追击下，向高明逃跑的敌九十一师1700余人，被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17日晚，被我粤中纵队在鹤山西北的宅梧圩挡住逃路。纵队一面对敌阻击劝降，一面与野战军联系，一一八团即派团政治处副主任率领三个连的兵力，协同纵队代表前往，对该敌施加压力，劝其投降。该敌已经知道一三师向我投降的消息，在我军重围之下，由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率部向我投降。

我一二团经腰古圩向阳春方向追歼逃敌的时候，与敌军1500余人遭遇。20日9时许，我一营迅速袭入敌人驻地，勇猛向纵深发展，协同一一九团三营一部，俘敌600余人；我顺公路追击残敌，在小河口地区，又俘敌200余人。

此时敌人战斗力已经很弱，兵无斗志。解放三水县城那天，某团宣传队员，赤手空拳就捉了敌军39个持枪荷弹的俘虏。某团二营七连进入芦包镇搜索，我战士只甩出了一颗手榴弹，便迫使120多名敌人向我投降。更有趣的是，战斗英雄张玉棋单人冲入敌军阵地，一下子领回来200多个俘虏兵。

残敌经我军昼夜穷追，蜂拥混乱，据俘虏称：敌军主官在和我军接触前，大多已先行溜走，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残敌之间，亦有争相夺路、吵骂殴打以致相互开枪者。成群结队的散兵四处乱窜。19日，我军由高要渡过西江，20日晨在高要以南的小河圩，截获敌第六十三军满载弹药的大船六只。同日中午，我军又在新兴以北截获该敌两个师的辎重。

据十四军报告：广州逃出的敌人，除第六十三、一九军等向西流窜粤桂边境外，敌第二十一兵团经佛山向阳江方向撤退，第十三兵团残部经高要向阳春方向撤退，第三十九军经高明向阳江方向撤退。余汉谋已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市。情况表明：广东敌军主力是企图逃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这时，敌军已远离我200华里以外。

在陈赓授权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的指挥下，十四军全部、十五军一部，兵分三路，对逃敌实施平行追击。

23日晚，部队经过多天的强行军，已实现对该敌的战略包围。此时，以四十二师和四十四师一部组成的右路军，已进到阳江以北30里处的双捷圩，其先头部队已前出江电（阳江至电白）公路北侧的瓦窑头（双捷圩西南）、大寨（双捷圩东南），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敌军西逃雷州半岛的公路已为我军切断；以四十一师及四十师一部组成的中路军，已追敌进至阳江东北40里处的合山圩地区，并继续向阳江迫进，以十五军四十三师、四十四师组成的左路军，进抵恩平，继以150里的强行军向阳江疾进；作为此次大追击第二梯队的三十八师，已进至阳春以北地区。总之，至此，我军已对阳江地区敌二十一兵团4万多人，形成西、东、北三面包围。

经过连续两天多外围作战，26日拂晓，我各路部队开始向阳江之敌发起总攻。

总攻开始后，我十多支突击部队直插被压缩包围在阳江平冈圩的敌人心脏，将其割裂。敌混乱不堪，成千成百地被我军活捉。

晨8时，被围的敌军全部被打乱，敌我相互拥挤交错。而侥幸漏网从平冈圩以南海路逃走的少数敌军，因其仓皇抢海船，纷纷被挤落海中，4只大船被我军击沉，船上2000多名敌军亦沉落大海。战斗在12时胜利结束，被围之敌约4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溺毙万余人，俘3万余人。

阳江围歼战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敌军逃往海外的企图。

阳江大围歼战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无比的机智、顽强和勇敢，出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广州解放以后，十五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刘子林，已经升任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三营副营长。在往阳江的追歼过程中，当他带领前卫连快要到达台山西南方向的那扶圩时，碰到了粤中纵队的一个分队，从中得知敌保安第四师驻扎在那扶圩。

在那扶圩外有一片高地，敌人在此设立一个排哨。刘子林带领部队经急行军，抢占了敌人排哨两边的高地，遂向排哨冲击。这里的30多个敌人，当发现刘子林等冲到跟前时，来不及打枪，就一个个当了俘虏。

通过对俘虏的审讯，得到了敌师长关中岳的住址、夜晚的口令等情况。

这时，主力还在后面，我一个营面对敌人一个师。刘子林根据了解的敌情，大胆地向团参谋长建议，由他带领一个班摸到敌人师部去，逼迫敌师长投降。团参谋长根据敌人慑于我军声威，批准了刘子林的建议，并派团组织股长李向明、参谋赵忠信跟他一起前往。

刘子林带了12名战士，每人一支冲锋枪，由俘虏作响导，向那扶圩的寨门挺进。

刘子林等一路通行无阻，到敌人营房后，直奔敌师长关中岳的住房。当关中岳和他的参谋长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一排冲锋枪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们的胸膛。

刘子林威武地逼视着敌人，大声说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是个保安师，是打还是缴枪？”

敌师长关中岳言不达意语无伦次地说道：“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

关中岳在刘子林的枪口下，通过电话召来了两个团长。经过刘子林等的教育，敌人自知固守已告绝望，关中岳和两个团长答应全部投降。

黎明时分，刘子林的第三营进驻那扶圩，成排的俘虏徒手走出那扶圩。

我军未费一枪一弹，便把敌广东保安四师 2700 多人全部缴了械。

10 月 25 日，我十三军三十八师进至白沙圩地区，奉命沿岗头、廉村直插九江埠，堵歼被围敌军。

26 日 3 时，一一二团九连一举击退廉村凉亭高地敌五十军残部。当三营进至良村西南 467 高地附近的时候，遭到敌人火力拦阻。我即以一排向 467 高地发起冲锋，又遭敌机枪扫射，前进受阻。

此时，七连“洛阳英雄班”战士张聚富奋不顾身，即经侧翼断岩扑向敌火力点，身负重伤。他在腹部中弹、肠子脱出一尺多长的情况下，仍忍住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敌人的机枪往下压。我冲击分队乘机而上，一举歼敌一个班，攻占了高地。战斗英雄张聚富，为拔除敌人的火力点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我七、八连攻占了 463 高地及其以西无名高地。

4 时，敌人从我营右翼拼命突围，其先头敌人遭我一、二连顽强堵截，突围未成，后续一个团的敌人处于进退维谷中。我二连及警卫排趁机由右翼侧出击，活捉敌 800 余人。

5 时，敌先头一个营，又向我一一二团指挥所翼侧迂回，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突围，并切断了我们指挥所与二营凉亭高地的联系。三十八师侦察连奋勇迎敌，第二营也及时发起冲击，激战至 7 时，敌伤亡惨重，向海边仓皇撤退。我军追至平岗圩，与敌激战，至当晚 12 时，阳江被围之敌全部被歼。此役中，仅一一二团一个团的战果：俘敌副团长以下 1873 人，缴获山炮 3 门、迫击炮 20 门，轻重机枪 77 挺，长短枪 419 支，枪榴弹 100 余个，电台 1 部，报话机 3 部，电话总机 3 部，单机 15 部。

10 月 25 日，逃敌第一七团在阳江鸭掌寨村后起伏的山岗上，摆成一个椅子形的阵地，妄图依靠飞鹅岭和猪头山两个制高点和其中的一个平山包为屏障，掩护整个刘安琪兵团残部向海边逃跑。我某团六连接到命令：“钻进去！挖断敌人的心腹阵地平山包，而后拦腰斩断！”

六连从鸭掌村左侧扑进椅子圈，必须经过一处泥坑地，而泥坑地的前沿密密地长着荆棘。

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了进去。坑中的稀泥深过膝盖，泥坑处又没有丝毫隐蔽物，敌子弹呼啸而来。机枪第二班战士王有光光着血淋淋的两脚，从第一排跑到第三排的前头。战士林文金被打伤了一条腿，指导员让他下去，他说：“我爬着也要爬到山头上完成任务！”第七班只剩下了郭云法一个人，他向第八班班长说：“八班长，我听你指挥，让我给七班争光报仇。”……这样的气势敌岂能不心胆俱裂。

在阳江大围歼战中，指战员们创造的奇迹是很多的：某团二营，仅以一人轻伤的代价，生俘敌军 2600 人。有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在艰难的爬行中。也俘虏了 30 多敌人。26 日，某团一营机枪射手张英奇，挟着一挺轻机枪和一颗手榴弹，一个人就捉来了 83 个俘虏和五匹牲口，而且一个人还把这一批胜利品带回了 20 里以外的司令部。另外，第一连六班战士李中科一口气捉了 110 个俘虏，22 匹牲口，他同八班的李河清一共捉到 240 人。第一连这天俘敌总数是 705 人。

阳江地区追击作战，歼敌第五十军、三十九军（欠一个团）、广东保安第二师全部，以及敌第十三兵团团部、二十一兵团团部、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九军、三十二军、二十三军、七军、广东保安第四师、第五师、西江指挥第三纵队、广东保安第六团等各一部，共 4 万余人。其中

生俘敌第五十军政工处长金意之、三十六师副师长李成中、参谋长徐正法、一七师参谋长白国杰等以下官兵 30300 余人，毙伤及溺毙敌 1 万余人。另有敌第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条牟龙光、三十九军九十一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等以下 6000 余人向我投诚。我军解放了三水、四会、高明、高要、新会、南海、台山、开平、新兴、恩平、阳江、阳春等 13 座县城。在我军声威下，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逻联合舰队的官兵 500 余人，率舰艇 11 艘向我军投降。

经过广东战役，到 11 月初旬，除了海南岛、雷州半岛南部及其它一些滨海地区以外，全省大部解放。白崇禧集团则退居广西老巢作最后的挣扎。

白崇禧逃回广西老巢后，忙着搜罗残部，扩充兵员，企图背靠云南、四川支撑，依托十万大山，与我军周旋。

白崇禧此时的兵力有：第一兵团司令黄杰指挥的第十四、七十一、九十七三个军；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指挥的第四十六、五十六两个军；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指挥的第五十八、一二五两个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指挥的第一、一三两个军。此外，还收编了余汉谋部流入广西的第七十、二十三、六十三、一九四个军残部。这样，他共有正规军 20 万人，地方部队 10 余万人。

广东余汉谋垮掉后，在中南这块版图上，只剩下白崇禧这支孤零零的队伍了。

10 月的一天，白崇禧把他的亲信张文鸿找来说：“你在龙州住过很久，又在那里读过书，同学、朋友一定不少。我准备派你率四十八军开任龙州部署，防备共军的左翼威胁，以巩固后路安全。必要时，我准备退向越南，如果法军敢阻拦，就解决他们。”

白崇禧在广西东北地区，构成了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和桂江南岸布防的防御体系，以黄杰与刘嘉树两个兵团集结于桂林及以北地区，负责节节抗击，破坏交通线，阻止解放军入桂；以鲁道源兵团集结于龙虎关、荔浦；以张淦、徐启明两兵团集结于恭城、阳朔地区。并准备视情向柳州、南宁撤退。

针对白崇禧这种摇摆不完的防御态势，中央军委决定以九个军、30 个师共 40 万人及人民武装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役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下实施。

11 月 5 日，林彪下令发起广西战役。

与此同时，决定陈赓率四兵团指挥所从广州迁至茂名指挥作战。参谋们向他建议：“反正有线电话架不通，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指挥，何必非移动指挥所。”陈赓说道：“你们不要进了城就不想走了，叶参座可以在广州坐镇指挥，我却不能，我身份不同，再说靠近部队，指挥也方便。”

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当日，陈赓兵团向廉江和信宜以北开进。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解放了贵阳。

白崇禧见向云贵逃跑已不可能，而右侧背又受到四野西路军的极大威胁，误认为我军南路兵力薄弱。准备乘我北路未动，西路距其尚远之时，集中主力，吃掉陈赓兵团向廉江方向突出的第十三军，控制粤西南滨海地区，打开逃向海南岛和越南的退路。

11 月 11 日清晨，白崇禧向副官吩咐：“电令黄杰，除留一部警戒外，速率第四十六、七十一、九十七、十四军主力，向柳州、南宁一线秘密集结。

电令徐启明，率部火速沿湘桂路节节抗退，要破坏交通线，强行把沿途五公里范围变成无人区。”他又道：“电令刘嘉树南撤，抢占百色，以策应南线作战。”白崇禧又亲自拟定了一份电文，命令张淦，速率部向博白、陆川一线秘密集结，准备歼灭南线的解放军，夺取雷州半岛，掩护主力向海南岛转进，为了迷惑林彪，他又电令鲁道源兵团，准备在岑溪以东佯攻，掩护“南线攻势”行动。白崇禧还电示张淦：“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之关键，胜者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者涂地……”

林彪发现白崇禧调整部署后，决定诱敌至桂南集结后再行围歼。11月16日，林彪向各兵团下达了在粤桂边界地区歼灭白军主力的命令。

18日，四野北路兵团展开全线攻击，于22日解放了桂林。

此时，白崇禧看到北方共军进展迅速，再不开始向“南线攻势”行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在南宁急令张淦率第三兵团向玉林、北流线赶进，令鲁道源第十一兵团主力向榕县附近集结，进行佯攻，以配合张淦的行动。

11月23日，鲁道源率先向我东路兵团四十三军发起佯攻。

林彪听说东线四十三军遭敌攻击的消息，误以为白军主力改变了主攻方向，急忙电令陈赓第四兵团，留十三军三十九师在廉江阻敌向雷州半岛方向进攻，调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

陈赓和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都不同意林彪这个部署。他们认为，白崇禧的目标肯定是雷州半岛。如果此时把四兵团主力北调，白崇禧趁机大兵冲压下来，在此处仅留一个师是堵不住敌人的。即使全歼了鲁道源兵团，也会使白崇禧军队的大部溜掉。不如留下兵团的主力堵住白崇禧部的逃路，待四野的主力赶上后，使鲁道源兵团和白军的主力都变成瓮中之鳖。当即，陈赓致电林彪，建议更改原计划。但林彪固执得很，回电陈赓：“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计划立即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

郭天民是个急性子，一看到林彪的回电，立即给中央军委发电，陈述四兵团的意见，他在电报中写道：“留下我们一个师守廉江，势必将白军放到雷州半岛去，敌会据比向海南岛逃走，这无疑于放走敌人……”

陈赓看了郭天民起草的电文，笑着直摇头：“老郭，你这个稿子完全是批评性的，感情太盛了，我们还是用建议的语气，我来写吧！”

陈赓在电文中说：我军必须牢牢控制住雷州半岛，如被敌所占据，势必从海上逃跑更加容易。建议我兵团占据廉江，控制沿海出海口，完全截断敌人的海上逃路，如原计划不能改变，可否“用四十三军及十一军合歼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而以十四军、十三军两个军钳制敌三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

24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四兵团“仍照陈赓前提部署，……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

“毛主席英明，真理在我们手里！”郭天民看了毛泽东的电报之后特别激动。

“老兄，不要那么激动，这里有参谋们，要照顾点影响。”陈赓友好地提醒他。

2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陈赓：

“白崇禧于23日令其所部十六个师向廉江、茂名之线攻击，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为此，陈赓所率十三、十四、十五、四十三四个军，除一个军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侧背外，主力不要深入广西境内，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散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贵州、贵县、玉林之线。白军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程子华兵团即应分路南下，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林彪见电后，只好修改了原定计划，调整了作战部署。

李宗仁看上去确是恪尽职守的代总统。在南京被解放军攻占时，李宗仁是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中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在广州也是如此，在解放军攻占广州的前一天，他才踏上飞往重庆的座机。

广州被解放军攻占，重庆又成为国民党政权苟延残喘之地。

李宗仁到重庆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败亡，他这个“当家人”的日子也随之更加难过，蒋介石复职之说纷纷纭纭。以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为首的各方面说客，经常奔走于李宗仁的门下，为蒋复出游说，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亲自充当劝进的角色。

李宗仁指着吴忠信大骂：“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是谁死乞百赖地劝我勉为其难？不是你是谁？我出来主政，蒋先生却在幕后处处掣肘，现在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你们又要我来劝进。告诉你！我没有这个脸！”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被李宗仁一顿训斥，再不敢当着李宗仁说劝进的事。而在此时，掌握川康地盘实权的张群，策划了一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民意代表”200余人的劝进闹剧。李宗仁视而不见，硬顶着不辞位。

自从白崇禧开始向蒋介石倾斜之时，也巴不得蒋介石出来主政。但碍于和李宗仁几十年的关系，他不忍再火上加油。

但时局日蹙，广州陷落，陈赓兵团和四野数十万大军紧追着不放，二野的刘伯承亦称不日将率军进剿西南。在李宗仁来到重庆不几天，白崇禧也飞到了重庆。见了李宗仁。白倒也直来直去，对李宗仁说：

“德公，时局危极，你我不言而喻。从这十个月来看，老蒋不愿撒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再长此下去，情况势必更糟。以兄弟之见，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转变很震惊，问道：

“健生，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不必这样含含糊糊！”

“德公，您太疲乏了，又患胃疾，我想请德公此时休息一下。”白崇禧硬着头皮说道。

李宗仁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让老蒋出来复位，就请吧。但我定要维护国家名器而坚持到底，绝不让步。”

“德公，您误解了兄弟的意思。你我相处几十年，弟从无恶意。”白崇禧撂下这几句话，起身径自离去。

李宗仁事后得知，白崇禧为了调和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已向吴忠信提出了初步妥协方案，即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仍任副总统；但因车患胃溃疡病，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白崇禧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李宗仁知道，以他和白崇禧交情，只要白能混得下去，则无论到什么时候，白也会请他回来坐第一把交椅。现在川康危急，大西南已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宗仁左思右想，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和秘书长邱昌渭找来，交代一番后，便飞往昆明去了。

李宗仁在昆明盘桓的那几日，心境恶劣，胃溃疡日甚，常常出血不止。不久，程思远由重庆飞抵昆明，向李宗仁报告，白崇禧所提的妥协方案没有被蒋介石采纳，吴忠信转告程思远：“白健生任行政院长的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并声言：“蒋总裁即将到重庆视事”。

紧接着，云南省主席卢汉来探望李宗仁。李宗仁过去和卢汉曾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且都被李宗仁打败成了俘虏，后又被李放了，虽未结下旧怨，但也无深交。但李宗仁知道，卢汉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处心积虑在寻找发泄的机会。

卢汉见李宗仁此时已走投无路，便悄悄地献了一计：“总统，看样子，蒋介石马上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蒋介石如何被宰割的问题，而是自身的安全问题，因为看来卢汉已经不稳了，很可能这位云南王要投共。作为向共产党的进献礼，卢汉逮不住蒋介石，会不会将他这位代总统抓住交给共产党呢？李宗仁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看来昆明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

但他此时到哪里呢？看来还得回桂林，尽管人民解放军即将三路入桂，但也只有去逗留几日，再作筹划。

卢汉探望李宗仁的第二天，李又回到了桂林。

李宗仁回到桂林，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徐启明和程思远等，立即前来谒见。

待李宗仁坐定，白崇禧说道：“目下共军四野陈兵湘西，陈赓兵团则由广州向南路进军，企图围歼我华中部队于桂柳之间，形势紧迫。老蒋要复位看来已成定局，我们何去何从，亟需从速定夺。”

李宗仁心里清楚，他们找他来，是要他作最后抉择的。他无力地靠在沙发上，扫视了一下在座诸人，说道：“诸位有话只管说吧！”

“鉴于目下之形势，我看似有两途可供选择。”李品仙接着说道：“其一，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德公将总统府迁于海口，不与蒋合作，自力更生，独立领导反共救国事业。其二，德公暂时出洋，西南残局由健公妥筹善后，以待时机。”

在座的看得清楚，让德公再举大旗，反蒋抗共，另图一方天地已不可能，于是，大家都沉默不语。

沉默一阵之后，李宗仁缓缓说道：“值此国家危亡的关头，我本应与诸公和乡土共存亡，但不幸身患重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决于近日赴美就医，如留得一命，则将来尚有为国效死之机会。我赴美之后，善后事宜一切由健生处理，望诸公好自为之！”

李宗仁的话，倒是让白崇禧听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眼下如果既反共又反蒋，只有加速灭亡。广东与广西本是唇齿相依，现在广东已失，广西亦很难支持下去，要想保住桂系这十几万人马，不靠老蒋怕是断难行事。因此他同意李宗仁赴美就医，由老蒋出来领导，以缓和内部矛盾，多得几日

喘息的时间。于是他说道：

“德公赴美就医，看似消极之举，实则不然。当年西南反蒋，德公驻节广州，我则经营广西，形成一个有力的格局。抗战一起，老蒋不得不把我们请到南京。现在，形势虽然险恶，但我们尚有十几万能战之大军，德公赴美期间，可就近察美国之形势，广结朝野人士，争取美援，如此我们这步棋就可以走活。”

白崇禧又说道：“我们北代的时候，不是穿草鞋出广西的么，今日还可以穿草鞋上山啊，广西到处是山，到那时完全可以和共军打游击，我们人熟地熟，占地利人和，德公在美争取到美援，时局一变，我们又可东山再起。”

黄旭初说道：

“打游击怕不是出路，共军是打游击的老祖宗，我们哪里能比得他们，还是另图筹划吧！”

“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全部上山恐怕也不易于机动，此事可否让保安团队和民团担任，正规军需有一暂时去处为好。”有人不赞成地说道。

“当然，”白崇禧挥了挥手，似早已成竹在胸，说道，“我们就近可退入海南岛，以海南岛为基地，再其次亦可退入滇、黔固守大西南。”

李宗仁听着白崇禧喋喋不休的言词，倒觉得白不再是以前那位精明强干、料事如神的“小诸葛”了……

“德公在赴美就医之前，可否飞一次海口，与陈伯南和薛伯陵具体谈一谈华中部队退往海南岛的计划。”白崇禧对长时间沉默的李宗仁请求道。

李宗仁长叹一声：“我尽力而为吧！”

1949年11月20日，晨，南宁机场。

跑道上，李宗仁的专机“天雄号”已经发动。地勤人员已将舷梯架好，几名警卫和侍从人员肃立在舷梯两侧，等候代总统李宗仁登机。

在机场候机室里，李宗仁和白崇禧相对而坐，默默无语。两人相处几十年，今天要分别，而这一别，不象其它任何一次的分别，可能彼此再不能相见，两人都万分伤感。

“德公，按预定的时间，专机要起飞了。”白崇禧抹一抹泪痕，慢慢地站起来，看看手表，已是上午8点钟。

“天雄号”专机预定今晨8时由南宁直飞香港启德机场，李宗仁在香港稍作停留，然后将飞往美国纽约就医。昨天晚上，程思远已先抵香港，为李宗仁赴美预作安排。李宗仁神色黯然地站了起来，泪眼扑簌地望着白崇禧，没有说话。

“德公，你还有何吩咐？”白崇禧似乎觉得李宗仁还有什么话要说。

李宗仁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抱着白崇禧的肩膀，恸哭起来

在候机室的高级客厅里，一阵悲伤的唏嘘之声。

“健公，”李宗仁止住泪水，用他那发抖的手，使劲摇着白的肩膀，说道，“有句话我已说过好多遍了，但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台湾不可去，不可与老蒋为伍！”

这是李宗仁积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认为对白崇禧最真诚的忠告。

白崇禧凄然一笑：“德公，我记住了。您多保重吧！”

李宗仁使劲地握了握白崇禧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座机奔去。

“天雄号”专机奔离跑道飞向蓝天。

李宗仁走后，白崇禧还在做着“南线攻势”的美梦，殊不知，毛泽东早已在他前面布好了圈套，等着他去钻呢。

白崇禧令其主力第七、四十八军同时动作，准备先占茂名，再占化县。令第五十八、一二六军从右翼向廉江、化县攻击。11月25日，白各部主力进至信宜地区，没想到在这里碰上的不是共军的一个军，而是整个陈赓兵团的主力，“反攻”受挫，敌我形成对峙局面。

陈赓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集中兵力首歼敌第七军主力。以第十四、十五军主力向敌第七军侧后攻击，以第十三军钳制敌四十八、一二六军。

27日，四兵团向敌军发起全线反击，张涂见势不妙，唯恐被陈赓吃掉，遂率部向博白方向溃逃，企图由钦州、北海向海南逃跑。我四兵团乘胜追击，揭开了粤桂大追击战的序幕。

正当我四兵团追击之时，白崇禧见我后方空虚，有机可乘，派喻英奇率一万多人，于28日夜攻占了廉江城。

十三军副军长陈康，率军主力离开廉江西进已有一天多路程了，闻听廉江被占，怒不可遏，当即回师廉江。陈赓原打算只派个小部队在廉江钳制偷袭廉江的喻英奇部，大部仍继续西进。但陈赓从报话机里听到陈康正给三十八师下达回返的作战命令。

“唉！送到口里的肉，就让他们去吃吧！”郭天民说。

“这不行！这样的后果是吃了一块猪肉却丢了一头猪！”陈赓说。

由于陈赓的报话机距十三军较远，十三军的报话机距各师近，所以陈赓虽听见陈康和各师通话，但就是呼叫不通。

“不要呼叫了，陈康办事干脆，这次先斩了连奏也不奏，他们走了，还是赶快叫李成芳吧。”陈赓对机要参谋说道。

继而陈赓给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下命令道：“你们必须每天走160里路以上。公路少，你们就人休息路不休息，不要考虑前队、本队、后卫，部队饿了就闪开路吃饭，让后面的部队前进，总之，要交互前进，充分利用道路。”

任务布置以后，陈赓有些担心，每天走160里路究竟行不行？他让参谋们注意收听报话机，了解一下各师长接受命令后的态度。当得知李成芳各师接受任务都很坚决，他才放下了心。

十三军返回廉江的部队，不顾连续行军400多里的疲劳，夜里立即向敌军发起攻击。敌人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发现已陷重围。仓皇应战。12月1日晨我军向敌发起攻击，15时战斗全部结束。敌第三二一师及伪粤桂挺进纵队在城南40里外地区，被全部歼灭。敌“粤桂边剿匪总指挥部”中将司令兼三二一师师长喻英奇、伪“粤桂边挺进纵队”司令曹英被活捉。廉江县城为我收复，敌军全部被歼灭，共俘敌6000余人。

向钦州前进之十四军，第一天行军就超过了150华里，第二天路程又超过了160华里，部队一个劲地向前赶，结果比白崇禧部早半天到达钦州附近，并立即形成对白军之包围。

12月6日上午6时，渡过钦江的陈赓所部包围了钦州之敌，17时发起总攻，23时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12000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野炮42门。

陈赓部十四军之四十六师于6日拂晓直出小黄圩、大寺圩地区，截击大量敌军，俘敌近4万人，并与四野部队胜利会师。

陈赓部十五军，按计划向博白前进。开始，先头部队对敌军布置的阻击

部队，总是歼灭了再前进，这就大大减慢了前进的速度。

“你们应该用小部队处置敌之阻击，主力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再不快前进，敌人就溜掉了！”陈赓对秦基伟说。

“你们再不快进，敌人就溜掉了！”秦基伟立即转达各师部队。

各师接令，尽速前进，遂解放博白、陆川诸地。

博白解放之后，陈赓要求秦基伟部集结，继续西进占领上思一带，截住黄杰兵团逃向越南的退路。

但恰在此时，林彪却电令秦基伟部就地剿匪。

“这又搞什么鬼呀！我们是路过部队，没有兼管军区的任务，怎么叫我们部队剿匪呢？四野的部队可以剿嘛！现在应是抢时间让十五军西进才是。”

秦基伟一看电报，气就来了。

但秦基伟还是服从命令，率十五军就地留下剿匪。

白匪主力被歼后，在钦州地区侥幸漏网的敌黄杰第一兵团及十兵团残部，拼命地向越桂边的上思、宁明地区窜逃，准备逃往越南境内。

白崇禧部在败亡之际，曾打算，纠集残部到十万大山里打游击；后又打算率其残部进入越南境内，与法国军队相呼应，保住残部，待机再举。

在钦州、南宁大围歼中，白崇禧主力几被消灭殆尽，仅剩黄杰等少数残部。

此时，白崇禧的计划是：第一兵团所属的十四军、九十七军和七十一军残部约万人，先由广西进入越南北部的谅山，配合法国殖民军，在谅山、道河口、海防一带，予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出其不意地袭击。为了掩护自己面目起见，进入越境的白敌残部，将归法国的傀儡保大政府的国防部长阮文春和越南国民党人武鸿卿指挥。如果最后仍然无法在越南立足，则准备经越南海防渡海到海南岛海口。

在我军稍后缴获的白崇禧于28日发给他的华中长官公署的一份密电中，就是这样计划的，该电称：“为将来发展生存计，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为总司令，徐启明为副司令，谭何易为第三军副军长，姚槐为第二军副军长，军师人选尽量由越方推荐，原任军师长可暂任副职，以资号召。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求胡志明主力而攻略之。若敌军（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尾随攻犯，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

早在11月9日，毛泽东就已电示林彪、陈赓：广西作战“除十三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由百色退越南的道路外，四兵团着重切断白匪退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逃往越南。”

为把敌军全部歼灭在大陆上，不给敌人喘息余地，陈赓即令十三军副军长陈康，以三十七师沿海岸经防城向东急进，以三十九师向上思急进，以三十八师则经上思东北、明江以南前进，追歼黄杰残部及堵截该部逃往越南的道路。

12月8日晨7时，三十七师进占防城，遂以一部东出，黄昏进占龙门港，歼敌2000余人。9日下午15时，三十七师主力进抵东兴以东地区，歼敌保安队百余人；18时占领东兴县城。10日由防城向西北山地搜剿前进。

三十九师8日解放上思县城，歼敌县保安团全部及七十一军一部，俘敌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以下3100余人。9日进达上思以东地区，沿途俘敌800余人。10日拂晓进袭上思以南的那当圩，歼敌第六十四军军部和一个团大部。11日进至平富圩清剿。

三十八师亦于9日晚间进至上思附近，沿途俘敌千余人。12日进至上思西南20里的那桃，13日进至明江东南的蓬口地区，歼敌四十六军残部数百人及广西保安团一个整营。14日继进至明江以南，歼敌第五十八军一个连。

按照原来林彪的部署，四野同时派出部队一起和四兵团追击企图向越南逃窜的黄杰兵团。但当陈赓部十三军追至边境时，发现四野设有派出部队。陈赓部虽紧追慢赶，也只抓住了逃敌的尾巴，歼敌6000余人。后来，林彪派出的部队，也未追上逃敌的主力。结果黄杰兵团1万余人逃入越南。而如果让十五军西进，就可以提早两天堵住逃敌退路，黄杰兵团就会被歼于国境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2月14日，历时34天的广西战役结束。此役全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及直属部队三个兵团部，12个军部，25个师另15个团，歼敌两个兵团和10个师的大部，共172900余人。

当时《长江日报》对广西战役的意义曾有如下评论：“广西战役胜利结束，桂系匪军以及华南蒋匪残余的歼灭，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因为我国大陆上，再也没有一支像桂系匪军这样驽悍的反动武装了。对于华中南来说，今天，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是我华中南地区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李宗仁赴美一个月以后的白崇禧，并没有记住李宗仁对他的忠告，去了他原先曾答应不去的地方——台湾。

李宗仁走后不久，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白崇禧的十几万桂系精锐，在强大的解放军进攻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被解放军打得稀里哗啦。白崇禧只好实施他退往海南岛、退往越南的计划，因为滇黔他退不了了，卢汉率部起义，昆明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尽管李宗仁走前，受白崇禧之托，曾专程奔走海南一趟，与陈济棠协商，要求华中部队退往海南岛，但陈济棠一直不松口。最后白崇禧只好请蒋介石出来说话，经过讨价还价，陈济棠才勉强答应。条件是：帮助陈济棠守护雷州半岛。

但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彻底打破了白崇禧的梦想。逃到海南岛的部队不多，逃到越南的也只有黄杰兵团一部万余人。桂林失守以后，白崇禧飞到了海南岛，还险些为陈赓兵团活捉。

桂林不守，南宁易主，海南岛也不可能是久留之地。李宗仁去了美国，他白崇禧以后将安身何处！

正在他难择退路之时，他的广西老乡，陆军副总司令罗奇从台湾来到了海南岛。

罗奇见了白崇禧说道：“健公啊！总裁到台湾后，对健公思念倍至，真可谓食不甘味，夜不安榻。因此，特命我来海南拜见。临行前总裁特地说道：‘请转告健生兄，我请他到台湾来组阁，由他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军事指挥权我全部交给他。’健公，这可是总裁对健公的信任呀！”

白崇禧再一次对蒋介石产生感激之情，说道：“感谢总裁的厚爱！”

罗奇说完，打开他挟在腋下的一只小黑包，取出一张单据，交给白崇禧，说道：

“健公，这是总裁命我携带来的400万银元和500块金砖，给华中部队发放军饷。”

现在白崇禧仍然需要钱，退入越南的部队和留在广西山上打游击的部

队，都急需钱！他非常感激蒋介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还想着他，他愉快地在单据上签了字。很明显，他的心已飞向了台湾。

恰在这天，程思远送走李宗仁，从香港飞往海口，秘密在天主教堂会见了白崇禧。程思远从贴身的衣服里取出一封信给白崇禧，说道：

“这是德公临飞美前留下的一封信，嘱我到海口一定面呈健公。”

白崇禧接到这信，心中涌起波澜，德公在去美国之前还不忘关照我！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打开，信纸上只有寥寥一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不可去台湾！”

看完李宗仁的信，白崇禧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简直有点恼恨李宗仁：你走了就走了，何必留一封这样的信给我！

白崇禧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去台湾，他确也担心蒋介石找他算帐，不去台湾，他又不甘心到海外过寂寞的生活，因此想来想去，皆无良策。

以后几日，蒋介石又连连来了几封电报，催他赴台组阁，电文亲切，充满感人之意，罗奇又整天来向他游说纠缠。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人，闻知老蒋要白赴台组阁，对他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原来他们不过把他看成是一位落魄的桂系头目来借地盘栖身的。从前，桂系势力煊赫之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李、白不得不怀敬畏之情，而今桂系已败落，前来求他们收容，陈济棠等可就再也不买李、白的帐了。因此，白崇禧逃到海口，对陈等的态度也不难察觉，大有寄人篱下，乞人收留之感。现在李、白的势力虽已败落，如果老蒋要重新启用白崇禧的话，则桂系仍有复起之可能。陈济棠等为着将来的利益着想，此后便对白一反冷落为热情，甚至薛岳还特地邀请白驱车同去巡视他在海南经营的“伯陵防线”。

“鬼不迷心窍的人不会走错路。”当时李宗仁在美国就这样讥讽白崇禧。

白崇禧一心想着权，想有势，最后上了蒋介石的大当。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怀着侥幸、不安、反共复国、振兴桂系的心理，在已犹豫数日之后，应邀从海口赴台组阁。

白崇禧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德公，一个是介公。但白自到台北以后，经常念叨的长官变成了一个。蒋介石给他的并不是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允诺，而是把他幽禁于台北，作了张学良第二。从此，在中国军阀混战史中名声赫赫的小诸葛，湮没无闻；桂系势力，在国民党的派系大辞典中，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白崇禧被“软禁”在台湾，蒋介石还不甘心，还要以“谋叛”的罪名惩治这个“历史罪人”。白到台湾不久，蒋介石便密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授意查办。毛人凤对手下的人安排任务时说：“领袖认为老妹子（当时台湾保密局奉命跟踪监视十余名敏感的政治人物，白崇禧是其中之一，代号叫“老妹子”。）可能谋叛，你们去进行调查。”

当年的“小诸葛”一直受到蒋介石的监视，虽然多次设计谋害未成，但最终仍未逃脱蒋介石的魔掌。1966年12月1日夜，白崇禧暴死在自己的住所。有人发现他赤身裸体死在卧室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统统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曾有过一段极痛苦的折磨。后来，台湾军统特务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披露，这是他受蒋介石之命，关照药店在药剂上做了手脚，下了猛药，要了多年郁郁不得志的白崇禧的老命。

十、关门打狗

割据西南，蒋介石的最后梦想。关起门来打狗，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方针。兵不厌诈，刘伯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稳定军心，蒋介石硬着头皮住重庆。垂死挣扎，胡宗南、宋希濂彻夜不眠筹良策。迂回作战，杨勇兵团突破黔东防线。打开通道，一三八团勇士斩断“鹅翅膀”。

为了逃命，敌士兵只好拉在裤子里。抢时间，刘伯承规定了部队行军的里程表。战争奇观：铁脚板和汽车轮开展拉力赛。

中南地区白崇禧的军队被歼之后，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主要麇集西南一隅。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区，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 200 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极为险要。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的西部和南部，长达 3000 余公里，是我国西南的门户。西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公尺以上，系藏族聚居区。整个西南五省区，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山陡路窄，崎岖弯曲，交通极其不便。云、贵、川三省，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历来为我国兵、粮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由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势特点和政治、经济条件，蒋介石企图把西南建成“反共基地”，盘踞川蜀，开拓滇康，支撑一隅，等待时机。于是，在他引退后，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遂提出了以四川为中心，建都重庆，背靠云贵两省，“割据西南”的计划。

白崇禧的部队被歼之后，在西南地区，逃集在此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共六个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共计 37 个军约 90 万人。

蒋对割据西南早已盘算好了。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诸山脉是一道共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于封锁，可以割断川黔两省与内地的联系；西南地区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以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基础；西南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兵员和军粮都有保障；地处边陲，接壤数国边境，便于取得外援。因此，蒋决定大力“建设西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决定把退集在西北、西南的残部，统统组织起来，沿川陕、川湘鄂边区，层层设防，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以“固守西南”。蒋介石计划：以胡宗南集团在川陕边区的部队扼守秦岭、大巴山，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布防川湘鄂边区，扼守川东门户。如果上述计划落空，退往云贵，再不能存身时，则逃往国外。

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1949 年 4 月，他派心腹王陵基接替了邓锡侯的省主席，要他看好成都这个据点；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则由亲信张群坐镇。王陵基顽固骄矜，张群老谋深算，圆滑善变，且二人均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然而，蒋介石还是放心不下，8 月 24 日，携长子蒋经国

由广州飞往重庆，亲自布置反共大计。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说：“今日重庆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之使命。”

蒋来到重庆，住进了抗战时期曾住过的山洞陵园，以示与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负责守卫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来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的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蒋介石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晓。蒋介石看完将领们的上书后说：“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

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为了稳定军心，硬着头皮住了 28 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但好些人已经感到蒋介石不再具有以前的威望了。事后来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

就在蒋介石来重庆之前，“保卫西南的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曾在汉中与蒋做过彻夜交谈。胡、宋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通至滇、缅、泰边境。为考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要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但蒋介石拒绝接受胡、宋二人提出的方案，蒋认为：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将完全丧失其国际地位。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笼络。

蒋介石决意经营西南，想保持一个偏安之局，但在解放军方面，已决定向西南进攻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部署是：杨勇兵团，由湖南直趋贵州，然后插入川南；陈锡联兵团，则向湘西进击，然后插入川东；周士第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陈赓兵团解放两广后，迂回云南。可见，解放军总的目标，都是指向四川，以粉碎蒋介石负隅顽抗之企图。

关起门来打狗，这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彻底消灭国民党残部的战略指导思想。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策略，置内陆之敌于不顾，直插沿海、沿边地区，首先把国门封住，堵住残敌退向国外的路，然后逐个歼灭之。这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

只不过不同的是，打白崇禧是公开的大迂回、大包围，而打胡宗南，在最初阶段，则是暗中大迂回、大包围，这主要因为作战对象不同。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入川，把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 14

个军约 16 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以北面作重点防守。

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 23 个军约 30 万人，控制于巴东一带，其中川湘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八个军约 20 万人，控制于巴东、恩施、威丰之线，作为西南防守的前进阵地。

另外以孙震部三个军约 4 万人，控制于巫山、万县之线，屏障川东北，其余兵力则散布于川滇黔各地。

显然，蒋介石把重点布防在川北。

要想堵住敌人逃向国外的退路，就必须直插川滇黔之西南部，并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把国境的大门关上。

既然敌人兵力的重点布防在川北，而且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多次对秦岭之敌发起佯攻，不但吸引了胡宗南的兵力，而且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误认为共产党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因而在川南、滇、黔方向，敌人的兵力相对空虚。

于是，刘伯承以假对真，避实就虚，绕开敌人的主力部队，直插敌人后部退路，首先关上大门，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

刘伯承为了让蒋介石进一步相信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而不是在川南或其它地方，故意做了些手脚。

刘伯承在 10 月 23 日从徐州西下，当他乘坐的火车路过郑州时，还特意下火车，参加了一个群众大集会，又是讲演，又是喊口号，并若有其事地宣布，他率二野大军正在入川途中。

次日，中共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刘伯承在郑州活动的消息。

与此同时，以作进军川北行动的二野领导机关和第三兵团，正经津浦、陇海铁路，公开乘火车西进，而且故意制造声势。

这就更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认为解放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川北无疑。

岂不知刘伯承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此之前，他早已派杨勇第五兵团，乘四野进行衡（阳）宝（庆）战役及广东战役的机会，在湘西隐蔽集结，随时准备向川西南迂回包围敌人。

在刘伯承坐的火车到达武汉时，看到自己的策略收到预期的效果，高兴地对部下说：

“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

当蒋介石、胡宗南专心防守川北的时候，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在兵团司令杨勇的率领下，已于 9 月 4 日，从江西上饶出发，开始秘密由湖南向贵州进军。

当时在贵州境内作战的，除了五兵团之外，还有三兵团的十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四兵团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以及滇桂黔边纵队等武装力量。

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给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占贵阳及黔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州、江津地带，并控制上述地带及其川南地区，使宋希濂集团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聚歼或利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敌人，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步解决全川问题。同时，又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由湘西入黔，于 11 月 15 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 11 月 25 日攻占毕节，12 月 10 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区，完成战役迂回，配合三兵团主力在川东的作战，在进行战役迂回中解放贵州，以堵住敌人的退路。

五兵团进军川黔的作战部署是：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至晃县、玉屏，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市，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十六军向三穗、镇远、黄平进攻，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十七军解放贵阳等地；十八军为兵团的第二梯队，尔后与十六军一起参加解放成都战役。

根据刘、邓的指示，五兵团在6月份开始，在上饶地区进行备战整训。在整训期间，兵团党委进行了多方的准备工作。在思想上，教育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军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观念。物资方面，本着既要保证必须的补充和供应，又要注意节约的精神，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人员方面，除补充了大量新兵，充实部队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提出的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在新区城乡建立人民政权的需要，为加强领导力量，选调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和从冀鲁豫老区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班子，为解决干部不足，还从京、沪、杭、闽、浙、赣等地动员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训练，随我军进贵州开辟地方工作。

五兵团十六军是解放军西进贵州的一支主力部队，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参谋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王实。

10月上旬，十六军在四野组织的衡宝战役的掩护下，由萍乡、醴陵，经株洲渡过湘江，进至衡阳、邵阳地区，继又利用友邻部队经湘西南调为掩护，隐蔽地西进，于10月底进到湘西之黔阳、洪江、会同、洞口地区，准备向贵州进军。

当时，防守贵州的敌十九兵团何绍周部，判断我军向贵州进军时，主要沿湘黔公路西进。即以其四十九军的两个师，分别部署在湘黔边的新店坪、晃县、玉屏和黔境内的三穗、镇远、施秉地区。另外一个师驻黄平、旧州为预备队。又以其八十九军驻贵阳作为机动。敌人的作战部署，是企图利用黔东的险要地形，成梯次大纵深的防御态势，重点卡住湘黔公路晃县、三穗、黄平一段，与锦屏西南之敌一起组成黔东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

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根据野战军首长的作战意图，决定首先突破黔东防线，打开大迂回的通路后，再向敌纵深挺进。

十六军遵照兵团的作战意图，制定军的作战计划：四十六师沿托口镇、瓮洞、瓦寨、三穗方向，直插敌三二七师侧后，协同十七军歼灭该敌，尔后沿湘黔公路西进；四十八师由洞口向天柱、剑河方向进击，并负责对南面之敌警戒；四十七师为二梯队，随四十六师跟进。

11月3日，部队开始向贵州进军。

四十六师部队前卫一三八团，于4日渡过湘黔边之清水江，占领瓮洞、邦洞、天柱后，继续向西急进。正当敌军把其注意力放在对付我沿湘黔公路西进的友邻部队时，四十六师突然前出到敌军重点设防的晃县、玉屏右侧。敌慌忙以一个团进至瓦寨，欲阻止我前进。但我前卫团主力已迅速绕到该敌侧后，该敌惧怕包围被歼，被迫仓皇由山路向西南逃窜。四十六师将其掩护部队歼灭，继续向三穗疾进。敌四十九军恐三穗被我占领后，其在三穗东北地区部队的后路被我切断，即赶忙令其向西撤退。敌第一线防御即行瓦解。我乘机攻占三穗、镇远。7月，我军先头部队抵达敌人在黔东的第二道防线要点镇雄关。

镇雄关是黔东的门户，也是我军西进贵阳的必经要道，因此，敌人设重兵把守，企图利用险要，阻挡我军西进。

镇雄关要隘的西侧，有一处更加险要的地势，名叫鹅翅膀。鹅翅膀由两

个 800 米左右的高山组成，山势陡险，难以攀登，两山犹如天鹅飞起时展开的双翅，紧紧护卫着镇雄关隘口，故得名鹅翅膀。在鹅翅膀的前面，有一条岸陡谷深南北横向的相见河，又象护城河一样拱卫着鹅翅膀要地。湘黔公路东西走向穿过镇雄关。穿过镇雄关的公路在不到 2000 米长的路段之内，有 16 个急转弯，三次通过险桥过河。地势之险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被我军粉碎以后，敌人立即加强了镇雄关的防守。敌四十九军、二四九师七四五团，在鹅翅膀、刘家庄、黄土坡等地均构筑阵地，进行坚守。敌人在鹅翅膀阵地派了一个加强营。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利用天险隘路，重兵把守，阻我西进，并掩护敌之主力向后撤退；如果关口坚守不住，即炸毁相见河上的险桥，迟滞我西进。因此能否迅速夺取鹅翅膀阵地和保住隘口通路，已成为十六军及五兵团主力部队能否适时西进贵阳，以至完成关闭国门战略性任务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尹先炳军长和王辉球政委考虑，若从正面强攻，不但会增加伤亡，而且容易导致敌人在难以防守时炸毁隘口，这样就会使我军的车、炮和辎重分队难以通过。因此，指示四十六师，一定要采取奇袭的手段，迅速拿下鹅翅膀要地，保证我军大部队顺利西进。

攻取鹅翅膀要地的任务，由四十六师一三八团来完成。一三八团根据军、师首长的指示，先是以三营从公路南面，绕经鹅翅膀南侧，插入到敌守鹅翅膀加强营的营部驻地刘家庄，从鹅翅膀要地后面进行偷袭。但在途中被深谷陡壁所阻，无法前进，只好返回。

南面偷袭不成，一三八团决定在鹅翅膀阵地北侧寻找突破口。令五连从公路北侧向鹅翅膀右面山头的侧后穿插。如果穿插成功，到时和正面向敌人进攻的部队，一同向敌人发起攻击。

当夜，五连在连长伍富同带领下，照当地一位老乡指示的道路，冒雨前进，先从镇雄关村子西北侧向北，沿着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行军，抵进到鹅翅膀东北约四里处的唯一山寨——梅子山。而后折向西行，翻过一座高山后，再沿险峻的陡坡，下滑进相见河谷。涉过冰冷的相见河，秘密地绕到控制鹅翅膀隘口的敌人一个连的侧后，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因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从这个地方攻击，所以猝不及防，一下子被赶出了阵地，我五连一举攻占了隘口及其附近的制高点。

我正面部队见五连偷袭成功，也立即从正面发起攻击。此时，双方交战的枪声，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声震山谷。正面阵地上的敌人，前后受攻，误以为我主力部队已到其侧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全线崩溃。我军一鼓作气，攻下了鹅翅膀隘口阵地。

敌鹅翅膀关隘被我军攻占，使整个黔东的敌人防线溃散，我军向贵阳进军的大门被彻底打开。

在鹅翅膀西面黄土坡地区之敌团主力，听说鹅翅膀被我军攻占，即慌忙扔下大批弹药、给养向西逃窜。同时，施秉、黄平、旧州等处守敌，也闻风向贵阳方向撤退。敌人只顾逃命，也顾不上破坏相见河的险桥。

敌人关隘已破，十六军即令四十六师，对逃敌进行穷追猛打，迅速攻占了台江、凯里等地。并与四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汇合。被我军抓住的敌俘虏说：“你们追得太狠，我们有了大小便都不敢停下来，只好拉在裤子里。”

在连续急行军九天的情况下，为了截住逃敌，迅速攻占贵阳，十六军首长命令四十六师，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用我军的双腿和敌人的

汽车轮子展开赛跑。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的先头部队，于 14 日晚抵达贵阳近郊。贵阳守敌在我军迫近贵阳之前，已弃城逃跑。15 日，四十六师解放了贵阳城。

贵阳守敌何绍周部，13 日撤离贵阳后，向盘县、毕节方向逃跑，并企图在毕节、织金、贞丰构设新的防线，阻击我军继续西进，掩护其主力向滇境退却。同时，退入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部，在三兵团的攻击下，也有向滇境退却的可能。

早在四十六师攻占贵阳之前，刘、邓首长就电示杨勇、苏振华：

1. 贵州敌人已决定放弃贵阳，何绍周已令四十九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待援。八十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退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西进。李弥第八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咸宁一个师。罗广文率一一一军正向遵义前进，其一一一师 9 日在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 16、17 日达遵义。罗兵团之一一八军、四十四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濂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十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2. 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经过三天，即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

(甲) 留贵州的十七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位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月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

(乙) 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西及黔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断。

(丙) 杜义德第十军，计时应于 17、18 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兵团毕节一路，筠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

(丁) 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调查。3. 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

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杨勇于 14 日电令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占领贵阳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其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队加快赶至贵阳，协同十六军入川作战；令十七军军长王秉璋，率十七军留驻贵阳。

十六军抵达清镇后，接兵团命令，继续向黔西、毕节进击。

21 日，刘、邓首长再次电示五兵团，指出：

“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就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

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
在电报中，刘、邓首长对各军行动规定了时间表：

十六军于28日可到毕节，12月2日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三天。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泸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人于11月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左右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十一、十二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

根据野司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十六军于21日开始向黔西、毕节进击。

十六军四十七师以一四一团为先遣支队，在师参谋长薛宗华率领下，于当日黄昏进至鸭池河。

鸭池河是我军进军黔西的必经之路。河面虽然宽不到100米，但落差大，水流急，河中有不少乱石，急流撞在上面，掀起层层白浪。河两岸多为悬崖绝壁，一般高达1300米，难以攀登。据当地人讲，历史上除贺龙指挥的红军在这里强渡过一次外，军阀混战多次强渡均遭失败。在我军到达之前，西逃之敌已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河西岸设防。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在各要点已构筑堑壕、地堡等工事，重点控制河西渡口和后面山上的公路，企图阻止我军西进。

部队到达鸭池河之前，军参谋长杨俊生曾率领参谋人员到岸边做实地侦察。经过侦察得知，在渡口往南走二、三十里，到河的上游白猫河，河开始发叉，形成三、四条支流，水较浅，岸坡较低平，且可以从此绕向黔西。因此，军首长决定，先派一支部队在此渡河。从左翼实施迂回，这样不但可以切断黔西之敌的退路，迅速占领毕节，而且可以避免从正面强攻，增大伤亡。

一四一团进至白猫河东岸以后，首先组织火力压制对岸之敌，同时利用携带的渡河器材开始渡河。敌人在此处防守薄弱，部队迅速渡河去，抢占桥头堡，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对岸之敌随即逃跑。

四十七师渡过鸭池河后，迅速向西急进，以两天半时间，连续跨过四条河流，前进270余里，于24日占领了黔西通往毕节公路上的羊场坝，切断了黔西之敌西逃之路。25日拂晓，当四十七师先遣支队抵达定东北山垭口时，守城之敌毫无察觉，该团一直摸到敌人宿营地，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在睡梦之中即上了西天，敌四十九军参谋长饶启尧被俘获。28日占领毕节，切断了敌人经毕节逃往云南的退路。

十六军占领毕节的当天，得兵团军情通报，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已于南川山以北地，被我军歼灭3万余人，其残部正由綦江向宜宾方向撤退。要我军迅速渡赤水向纳溪进击，堵往宋部之退路。

尹先炳、王辉球迅即将部队分为两路，向赤水河急进。

左路四十七师，由毕节出发，连翻几座大山，穿过天险燕子口，连续行军170余里，前卫一四一团于次日12时，顺利占领赤水河大桥。四十六师随四十七师前进。右路四十八师，由羊场坝出发，翻大山，走小路，次日中午在瓢儿井场突与敌四十九军残部遭遇，迅速将敌全歼后，继续北进。全军于

29日通过赤水河，开始向四川境内进军。

30日午夜，四十七师前卫一四团进抵叙永。当时敌人正在叙永宿营，判断我军尚在百里之外，最快也要在次日中午才能赶到。

一四团于12月1日1时，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和拿武器，我们战士的刺刀已经逼到胸前，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我仅以伤五人的代价，歼敌2500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萧以觉。十六军比野司首长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占领叙永。

占领叙永之后，部队继续向西进击。5日，左右两路部队分别抵达长江南岸之江安、纳溪，比野司首长规定的时间提前五天到达该地。

12月6日，刘、邓首长电示十六军：“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最多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

根据野司和兵团首长意图，军首长认为当前的关键是攻占乐山。为尽快实现此目的，作了如下作战部署：四十七师沿白花场、观音场、乐山方向，首先强渡岷江，攻歼乐山地区之敌，尔后进占峨眉。四十八师沿邓井关、贡井、荣县、竹园铺，在板桥溪偷渡岷江，插乐山侧后，协同四十七师歼灭乐山之敌，占夹江，再向雅安前进。军指挥所率四十六师，沿王宝镇、乐山方向跟进。

四十七师前卫一三九团，9日在板桥坝、中和场歼敌2000余人。14日夜该团抵达乐山附近的瓦厂坝。迅速查明乐山、岷江东岸之敌为三三五师两个多团在此地设防坚守，该敌已在此构筑了两天工事，大佛寺山及其东侧部署一个团；在北面的伍家坝附近布置一个团。

四十七师当即决定，以一三九团担任主攻，首先歼灭大佛寺山之敌，而后再向北发展；一四一团从右侧向伍家坝之敌迂回，协同一三九团歼敌。

15日6时30分，一三九团首先集中全团炮火，猛烈轰击大佛寺山之敌，三营九连郑法成英雄排，在排长王克力的带领下，跳入三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岷江支流，不顾敌人猛烈炮火射击，直扑对岸，用抵近射击和手榴弹消灭敌人，迅速占领了大佛寺山制高点。此时二营也东面攻上来，对该处守敌进行夹击，敌两个多团被迫向我投降。到16日中午，乐山之岷江东岸及渡口，完全为我军所控制，全军于当日夜渡过岷江。

占领乐山后，为了迅速切断敌逃向康、滇之退路，四十七师连夜渡过青衣江，向退守峨眉之敌奔袭，于17日将其包围歼灭，占领峨眉。四十八师16日占夹江，17日上午占洪雅。四十六师进至夹江。19日，十六军主力进占名山、舟先选稜、夹江地区，至此，我军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往康滇的道路。

十一、活捉“鹰犬”

请君入瓮，共产党把国民党的战犯关进了“白公馆”。往事如烟。宋希濂曾是中共一个不够坚定的党员，和阵赓同乡、同学，私交深笃，对日军作战颇为英勇，屠杀共产党也不手软！内战爆发，蒋介石给他的官越来越大。宋希濂有感而发：30年一轮回，这是定数。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车到山前没有路，宋希濂掏出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请君入瓮”这个典故，说的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两个酷吏，一个叫来俊臣，一个叫周兴。他们设计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枉杀了许多好人。周兴外号叫“牛头阿婆”。常常自夸逼供的办法如何如何巧妙，说“凡被告之人，只要送到他的手里，不招供者极少。审讯时没有一个不自称是冤枉的，处死之后，也就没事了”。

后来有人密告，说周兴与人共同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逮捕并审讯周兴。来俊臣以为：周兴对于办案是个内行，要他老实招供，怕非易事，必须有新招方能使周兴招供。于是，来俊臣想了个主意，请周兴到他府上喝酒。酒过三巡之后，来俊臣说道：“今日请周兄来府上小饮，因小弟有一事相求……”来俊臣还没有把话说完，因周兴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告发之事，便兴冲冲地打断来俊臣的话，说道：“有事尽管讲，你我不必客气！”来俊臣接着说道：“今有区区一件小事需向周兄请教。近日在下捉到一个犯罪之人，因该犯狡猾顽固，种种刑具都已用过，但还是不肯招供。不知老兄有什么新办法没有？”来俊臣说罢，周兴手捋着山羊胡子，想了一会儿，得意地说：“这个容易，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用一只大瓮，四面架起，用烈火烧烤，烧到内外甚热时，将囚犯放进瓮去。……嘿嘿，看他招不招供！”来俊臣听罢好笑道：“哦，这办法的确不错！”立即叫人抬来一只大瓮，四周烧起炽烈炭火。不一时，大瓮已烧得炙热烤人。来俊臣于是把脸一翻，指着瓮对周兴道：“你图谋不轨，已被揭发，我奉密诏办你，现在，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立时跪地求饶，当场认罪。

后来人们经常使用这个成语，借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

事有凑巧，在刘、邓大军大西南征战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类似有趣的事情。

在重庆市郊有一座骇世听闻的“白公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的“不轨分子”的。象张学良旧部副军长黄显生就是长年关押在此的一个。在这里，国民党特务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残忍地屠杀了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被关押的全部人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重庆大屠杀。

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但抵不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被打得落花流水，生俘国民党将军数百名。这些“高级俘虏”就被关在了本来是他们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这主要也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况且，即使有意让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体尝一下他们

给共产党人建造的牢房的“舒适生活”，对他们也并不算过分。

刚刚被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生俘的国民党“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宋希濂中将，被俘之后，就被关押在这里。在此和他作伴的还有刚被俘不久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后来接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曾扩情等一批国民党战犯。

宋希濂被送往白公馆之前，曾受到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的接见。

当时五兵团司令部设在刚刚解放的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

在宋希濂被俘的第二天，即12月20日早上，宋希濂刚吃罢早饭，在他的关押处所，来了一辆小车，说是兵团司令员要找他去谈话。宋希濂看见实枪荷弹的战士要请他出去谈话，顿时心里紧张起来，他从自己在国民党中几十年的经历，判断这“谈话”凶多吉少，感到已经死到临头了。象他这样一个与共产党为敌几十年，数不清的共产党人死在他的手里的战争罪犯，一旦被共产党捉住，还会不杀掉？特别是由他亲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翟秋白，更是罪不容赦！

宋希濂想到死，心里反而平静下来，跟关押在一起的部下们一一握手道别，昂首上了派来接他的小汽车。

小车不是把他拉到荒沟野外，而是到了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宋希濂想，大概是先审后决，共党还想让我留给他们一些活材料，拿定主意一个字也不说，反正就是一个死。

下车后，一个小战士把他押到一间还算明亮的屋子，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军人，身穿普通战士的服装，正在阅读文件。

小战士把宋希濂带到这个年轻军人面前，对宋希濂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兵团司令杨勇。”

宋希濂一听小战士的介绍，心里大吃一惊，发呆地注视着杨勇司令员：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杨勇看见宋希濂进屋，放下手里的文件，客气地站起来，微笑着说道：“坐下谈，坐下谈。”

宋希濂虽说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国民党军队的要员，但看到杨勇温文有礼的姿态，使他越发觉得不安，一下子失去了大将军的傲气，规规矩矩地坐在了小板凳上。

“宋将军，”杨勇仍然微笑着说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一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里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已经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下，杨勇又接着说道：“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渡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的话使宋希濂深受感动，但他仍久久一言不发，直到临走前才答道：“宋某连日奔命，心力交瘁。杨司令宽宏大量，谆谆施教，我已聆听，容日后再行领教。”

两日以后，宋希濂就被送到了白公馆。

杨勇的会见，使宋希濂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他从杨勇司令员的谈话里

感觉到，共产党对他不会以血还血，会给他一条活命。但他一想到国民党监牢里囚犯们的生活，仍不寒而栗。

杨勇司令员对他说把心安下来，可他怎么也安不下来，过去的事情，象电影的画面一样，在脑海里闪来闪去，赶都赶不走，特别是他经手屠杀瞿秋白的那一幕，在此时更使他浮想联翩……

那是 1935 年初，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取得“胜利”。宋希濂率领他的三十六师，对“围剿”红军出了大力。同年 5 月，他率三十六师驻扎在福建长汀。

红军在反第五次“围剿”失败以后，主力北上，闽浙赣地区留下六七千人坚持战斗。4 月间瞿秋白等人在向福建上杭的转移途中。被福建保安十四团包围，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牺牲。

有叛徒密告，被俘人员中，有共产党巨首瞿秋白。保安团如获至宝，对俘虏个个严刑拷打，让供出瞿秋白。瞿秋白自称“林琪祥”，说自己是红军里的一名文书，已经是一身病，要求取保开释。但由于他的气度不像普通士兵，江苏口音又重，保安团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但叛徒并不认识瞿秋白。瞿秋白死不改供，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琪祥”。保安团无计可施，只好把他投进大牢。后来，被俘人员中，认识瞿秋白的郑大鹏也叛变自首，向敌人当面指认了瞿秋白，瞿秋白没有再行否认。

瞿秋白身份确认后，敌人立刻上报驻长汀的三十六师。1935 年 5 月，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宋希濂处。

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以后，宋希濂进行了一次“军法审讯”。

对瞿秋白审讯之后，宋希濂认为，对这样著名的共产党要犯，不能象对待一般“犯人”那样残酷，要以柔克刚，用理来说服他。如果瞿秋白能够悔过，那就会为蒋校长立一大功。

于是，宋希濂给瞿秋白去了手铐脚镣，还派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生活待遇上，享受师部人员的待遇。并吩咐看守人员，对瞿秋白要给予特别照顾，尽量满足瞿秋白提出的要求。

这样过了几天，宋希濂把负责看管瞿秋白的吴松涛叫去，问道：“瞿秋白这些天有什么情况？我吩咐你们的事做得怎么样？”

吴松涛哭丧着脸说：“还能怎么样？这些天他要这要那，我们这些人成了他的佣人啦！他要的书一本本都给他找来了，笔墨纸张也都给他了。还给他弄来了印石刻刀，还得防他自杀，这几天他简直成我们伺候的大爷了！”

宋希濂笑笑说：“他平时都干些什么？”

“还不是干些酸文人的事！刻个图章，要不就读什么诗，或是写写划划，也不知涂抹个啥！”

宋希濂点点头：“这就对了。你想办法让人把他写的东西给我搞点来。”

宋希濂此时也难以忘记，在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而瞿秋白已经是一个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曾读过瞿秋白的文章，那建立理想社会的激扬文字，曾在自己的心灵里引起过震撼与共鸣，也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到广州进了黄埔，又听过他多次的精彩演讲，当时知道他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如今，以前这位自己尊敬的理论家，居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这世界上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十多年，自己则是飞黄腾达，从一个充满理想的中学生，一步一个台阶，才 27 岁就当上了堂堂国军的三十六师师长。尤其是民国二十六年，断然与共产党分道扬

镰，投身“蒋校长”以来，更可谓平步青云，第二年就被派到日本去学习军事。回国后，从一个普通的参谋，晋升为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参加过中原大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又参加了平息福建事变，在第五次“围剿”中又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逼迫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切，都使自己成了“校长”的心腹爱将，可谓前途无量。如果自己不是八年前当机立断背离共产党，今天的下场也许不会比瞿秋白好多少，想到这里，宋希濂不仅为自己的聪明抉择而感到洋洋得意，又为瞿秋白沦为阶下囚感到惋惜。

晚上，宋希濂端坐在书案前沉思。案头上，一边放着南京东路总指挥蒋鼎文催问瞿秋白招供情况的电报，一边放着瞿秋白写的一些东西。他反复吟读着瞿秋白写的一首词，这是一首咏梅词《卜算子》，其中写道：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宋希濂似乎要从瞿秋白的词里读出一点儿回心转意的意思来，但他左看右看，看不出瞿秋白有丝毫被软化的意思。怎么办？上边又催得紧，看来只好亲自与瞿秋白进行正面交锋了。

第二天，瞿秋白被卫兵带到了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很热情，一见瞿秋白进来，立即起身，笑着说：“请坐，瞿先生。我是宋希濂，三十六师师长，前些天刚从外边回来。这几天过得好吗？”

瞿秋白轻蔑地说道，“蒙宋师长关照，生活还能有差！”“那就好，那就好！”宋希濂装出没听出瞿秋白讥讽的话，说：“对任何人均一律实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搞残酷的阶级斗争！”

瞿秋白冷冷看了宋希濂一眼，说直

“宋先生说奉行‘人道主义’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我倒很愿意将此话转达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死在你们屠刀下的无数同志和千千万万的国人冤魂！不过呢，宋师长，他们怕不会相信你的话吧！你们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出动军队几百万人次，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也是实行的‘人道主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你们拿着枪不去对着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的日本强盗，反倒来打工农红军，请问宋师长，这是实行的什么主义！”

宋希濂听罢，面红耳赤，强作镇定，引开话题，继续说道：

“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由上边制定的。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服从命令。如果上边叫打日本，我也会不遗余力。可是你们共产党在国内到处煽动叛乱，分田地抢财产，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抗日。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当兵以后又走了不少地方，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我看每个县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只有几十亩的地主，可是他们都是祖上辛辛苦苦，节衣缩食，攒了几个钱，购置了一点产业。跟城里的资本家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可是你们却向他们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你们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你们背叛了‘三民主义’，不顾中国国情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以前读过瞿先生的书，听过瞿先生的讲话，对先生很敬重。希望瞿先生能认清国情，复归‘三民主义’。以瞿先生的才干，是必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宋希濂说完，瞿秋白大笑，然后陈说共产党的见解。

宋希濂理屈词穷，只好又把瞿秋白送回牢房。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的“特急”电，令

宋希濂“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呈报。”

6月18日，宋希濂下令，将这位曾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枪杀于福建长汀。

在宋希濂被俘之时，陈赓正率四兵团在云南境内作战，在作战间歇之间，陈赓特意从云南到重庆白公馆看望了宋希濂这位同乡和昔日的同学。

宋希濂听到陈赓要来看他的消息，又是高兴，又是惭愧。高兴的是陈赓不忘旧情，身居高位还不忘来看他这个落魄之人。惭愧的是自己和陈赓走了不同的道路，陈赓为人民打江山，成了胜利者，当了共产党的云南军区司令员，而自己甘为“校长”鹰犬。如今成了阶下囚。

这一天，重庆的雾特别大。宋希濂被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正好陈赓有事出去，宋希濂面壁而立，等候陈赓的接见。

不一会儿，屋外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宋希濂把脸扭向门口，是陈赓，那剃得发青的胡茬和脸上的微笑，他一下就认出来了。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未动。

陈赓走进屋来，立刻同宋希濂热情地握手，说道：“你好啊！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会来看我。”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道。

宋希濂稍思索了一下答道：“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看我。”

“对，那次是我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一晃就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

宋希濂忐忑不安，浑身觉得不自在。这一次见面哪能同上一次相比！

陈赓从上午9点一直和他谈到下午4点，中午，陈赓让厨房做了酒菜，边吃边谈。

“酒味道怎样？”陈赓给宋希濂斟酒。

“不错！”宋希濂点头。

陈赓不善酒，只是用嘴唇沾沾表示下意思。他一边给宋希濂的杯里斟酒，一边说：“我没福气，你敞开喝。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可以坐在一起了。对过去的事，不要有太大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是好的。”

宋希濂有些微醉，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惭愧呵，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罪人。”

“宋老弟抗战是有功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围攻土肥原师团，远征滇西。我看你是有功有罪。不过，你自己也可以总结总结，争取以后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

陈赓临走前，还特意嘱咐陪他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在生活上要适当照顾，我看可以和所长的待遇一样，吃小灶。”

陈赓的接见，使宋希濂心情有所好转，使他对共产党的战犯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宽怀大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感受。也更使他怀念起昔日和陈赓同窗共读的那段美好岁月……

宋希濂和陈赓都是湖南籍，且同是湘乡人。1907年，宋希濂出生于湘乡溪口镇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1921年，宋希濂14岁，在省城长沙考入了长郡中学。1923年，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之后，

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决定筹建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各地的进步青年，到广州参加报考。1923年冬的一天，长郡中学宋希濂的国文老师熊享翰（湖南益阳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湖北汉阳被捕牺牲）把宋希濂叫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对他说：“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富有爱国热忱，现在广州派人来湖南招收一批青年，去参加军官学校，你想去吗？”

宋希濂立即回答：“我想去。”

于是宋希濂手持熊老师的介绍信报了名。过了几天，在长沙育才中学进行了初试，获通过。

也就是在育才中学，宋认识了同来参加报考军官学校，进行初试的陈赓。随后，两人结伴同行，到广州进行正式考试。1924年1月，他们经过旅途多次波折后，来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没有人接待，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考试的有关事项，他们只好租了间客栈，住了下来。

他们在广州一住就是一个来月，仍没有考试的音讯。所带盘缠有限，不免着起急来。当时在宋希濂和陈赓住的客栈里，还有一些也是来广州的青年，在此情况下，大伙儿就推荐陈赓等为代表，找到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湘军将领程潜，请求帮助解决困难。程潜当时正在主持操办另一个陆军讲武学校，便要求让陈赓、宋希濂等。到该校入读。他们就都到了陆军讲武学校。

陆军讲武学校尚未开课，有一天，陈赓、宋希濂一同上街闲逛，忽然看见了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两人看完后商量了一下，决定报考。

招生规定考生年龄要18岁以上，宋希濂当年实际只有17岁，但按虚岁计刚好18岁。3月29日考试，4月28日张榜公布，宋希濂、陈赓榜上有名。1924年5月5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入学，宋希濂编入第一队，陈赓被编入第三队。

在学校里，宋希濂和陈赓是同乡，也是好友。陈赓年长宋希濂四岁，有什么事情，宋希濂总找陈赓商量。陈赓那时是军校中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宋希濂非常佩服，从心里为有这样的挚友和同乡感到自豪。

同当时的许多学员一样，除了孙中山之外，宋希濂的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廖仲恺和蒋介石，认为他们一文一武，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有一天，他把他的想法给陈赓说了，陈赓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革命党和一个革命武装，才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年纪尚小的宋希濂没太懂陈赓的话，但也没有争论，因为他信任陈赓。

1924年10月，周恩来到黄埔任政治部主任，首次到黄埔讲演，会场上挤得满满的。宋希濂有事去晚了，就慢慢往前挤，想听清楚、看清楚些，正好挤到陈赓旁边，陈赓有意问宋希濂：“怎么样，周主任也是个栋梁之材吧？”

宋希濂脱口而出：“当然了，而且他是年轻的栋梁之材，漂亮的后起之秀。”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宋希濂被分配到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当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为排长。陈赓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第二期入伍生队任副连长，不久升任连长。

1926年初，宋希濂参加第二次东征，部队驻潮州。有一天，陈赓突然来到了宋希濂的面前。两人一年未见，宋希濂是又惊又喜，急忙抱住陈赓的肩膀，大声说道：“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陈赓笑嘻嘻地说：“老弟，想我了吧！只要不死，走遍全国都能见面，更何况小小的广东！”

两人叙谈了一阵，陈赓突然问他：“老弟，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希濂在军校时，集体登记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时允许跨党，不少同学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宋希濂以前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见现在陈赓问他，也就不加思索他说道：“共产党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有周恩来这样的栋梁之材，有你和蒋先云这样的佼佼者，我宋希濂为何不愿意！”

这时，只见陈赓以严肃的表情说道：“共产党是革命组织，要本着这个宗旨和目标加入。而不单看组织里有没有自己所佩服的人。”

这样，宋希濂由陈赓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部队上谣言纷传，搞得人心惶惶。此时，宋希濂的部队仍驻潮州，并已提升为营副。宋希濂入党不久，开的会不多，对共产党的知识知之不多，部队上谣传共产党的坏话，宋希濂心中有些紧张。他想去身居领导职务的党员问问情况，但却发现所有原来公开身份而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均已不知去向，宋希濂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宋希濂的跨党身份并未公开，也没什么人找他的麻烦，他什么话也不说，静观时局的发展。同时，他给已调回黄埔的陈赓悄悄地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弟已提升副营，军务繁忙，但身体健康。只因近日风云突变，气候异常，弟不甚适应，常常云雾重叠，风向不辨……望兄能及时告知，弟应如何适应这种天气。”

还没有接到陈赓的回信，宋希濂被调回了广州，升任新编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一营营长。这支部队是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之后组建的，军官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这时宋希濂心里揣摸，国民党已成气候，这么多军队实际上都被国民党掌握，特别象蒋校长兵权在握，对自己颇为赏识，如此这般，又何必自找“中山舰事件”之类的麻烦呢？

正在他对共产党的观念动摇之际，家里给他来了一封信，信显然是家人口授，由不知是哪个文人代的笔。信中说：“……近来湖南乡间刮起一股狂风恶浪，泥腿子舞刀弄枪，抢钱分地，甚至于抓人游街、砍脑壳，简直无法无天！父虽不是收千百亩粮钱的大豪绅，亦心惊胆颤，已于日前奔赴长沙，与你兄同往。据云湖南乡间痞子造反，均为共产党背后驱使所为。汝父念及儿在革命军中做官，可曾参加什么党，信奉什么主义？昨日家中来人，云我家中钱物亦被痞子洗劫一空。望儿深知，鸡鸣狗盗，打家劫舍，古来有之。要治国平天下，盗贼历来属格杀之列。若共产真的鼓动痞子造反，则如同盗贼耳。儿不只是不要误入歧途，还要为治国平天下效力……”

宋希濂本来对共产党就无很深的认识，其父来信把共产党骂得一钱不值，更使宋产生了对共产党的怀疑、失望，决心脱离共产党。

在这不久的一天，宋收到了陈赓的一封信，约他到越秀山茶楼见面，他心里发虚，但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赴约。

两人见面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之后，陈赓突然表情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几个月没有同组织上联系？你在部队作了跨党登记没有？”

宋希濂开始支支吾吾，含糊搪塞，但看见陈赓不满的表情，还是把心一横，说道：“我不打算跨党，也没有登记。但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同志，还是一个朋友，我都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宋希濂把话挑明后，两人陷入沉默。在此之前，陈赓虽稍有察觉，但想不到这个同乡好友，几个月之内，思想转变如此迅速，态度如此坚决。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陈赓起身而去。

不久，陈赓调离广州，离穗前，他又给宋希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参加或退出任何组织，都是自愿的，别人勉强不得……如果死神找不到我们身上，我们都还将亲身经历中国现阶段革命历史的巨变……”

他们两人可能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越秀山茶楼一别，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起点。从此，二人为着迥异的目标，努力发挥着各自的智慧和胆略，为各自的理想奋斗，最后一个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一个成了新中国的一名囚犯。人生实在是一部充满离奇故事的书……

宋希濂经过多日的沉思，心境逐渐平静下来，抑郁沉闷的情绪有所调整，开始对他的前半生进行反思，也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渡过自己的后半生。他陆续交了自己的战争罪行，特别注重交代了近日与解放军作战的罪行，交代了他被一三九团生俘的过程……

抗战八年，小日本被赶出了中国，百年来中国人首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举国欢庆。但人们的笑声还没有落地，蒋介石又把中国拖入了全面内战的火海。国共双方，始则小打，终则大打。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宋希濂作为蒋介石的一员爱将和国军中的中坚，其头上的官衔也在不断升迁。1946年10月，宋希濂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代表委员长坐镇新疆。

宋希濂虽然心在万里之遥的边疆，但两眼却盯着内地的国共之战。不久他即发现，随着国军战报上的一个个“辉煌”胜利，国军却越打越被动，“共匪”却越“剿”越多。眼见得东北失利、华北失利、西北失利、中原失利，“校长”在战场上的“爱将”也越来越少。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还在新疆“闲置”的宋希濂，一纸调令，独镇新疆的宋希濂立刻调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并兼任十四兵团司令官，手中有四个军的兵力，驻扎湖北宜昌，进可支援中原、华东，退可为“校长”保全西南半壁江山。国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军大败，眼看江南不保。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蒋介石又给宋希濂加官晋爵，任湘鄂赣绥靖司令官，指挥两个兵团六个军共14.5万人马。蒋介石虽不断给爱将宋希濂加官晋爵，以鼓励士气，但宋希濂在解放军面前怎么也发挥不出当年打日本智慧和胆略，被解放军追着打。多亏宋希濂的腿脚还算麻利，短短几个月，十几万人马，被解放军吃掉了一个整数，1949年8月，宋率残部几万人逃往川东。此时，宋又被任命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名义上他手里仍有两个兵团共六个军另四个师。

退到四川以后，宋希濂精疲力尽，锐气全无，因而完全放弃了和解放军作正面交手的思想。在8月下旬，经过征求胡宗南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兵撤滇缅，伺机再起”的全面撤退的作战方针。但蒋介石坚持主张“坚守四川，保住西南”的战略，让宋希濂和胡宗南与共军一战到底。

蒋介石否决了宋希濂的意见，也决定了宋希濂的彻底失败。

11月1日，二野三兵团开始向川东南的宋希濂部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四野部队也从鄂西和湘西，向宋希濂部进行钳击。

宋部残兵败将，本无意和解放军再战，结果一触即溃。

到11月15日，解放军就差不多吃掉宋希濂集团的四个军。宋希濂指挥第二十兵团主力第二军、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军，以及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一

一八军残部，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

彭水县位于乌江的东岸，四面皆山，是川东货物的集散地，曾经很繁华。因而，轮渡和木船以前很多。

但是，当宋希濂抵达彭水时，才发现江面已经没有了一条船。

这倒不是共产党把船弄走了，而是他自己的绥署后勤机构，将几十条民船征用，载着行李、物资开往下游去了。

直到 16 日上午，宋希濂部才弄到一些船。但溃退下来的部队又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县城全是溃兵，老百姓已经逃避一空。

宋希濂把指挥所设在彭水县东面的一个古庙里，每天看着乱哄哄的部队渡河，心里懊丧透了。

17 日上午，宋希濂和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一起渡过了乌江。

渡过江之后，宋、陈二人坐在岸边，象看热闹似的看着部队继续渡江。

宋希濂似有感而发，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 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快 30 年了，看来也该完蛋了。30 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

陈克非是黄埔五期的，也叹了口气说：“这也是改朝换代的一劫啊！”

在部队渡河接近完毕的时候，宋希濂对陈克非说：“上午接到电报，说蒋经国在今天晚上要到江口来，可能老头子对我们什么重要指示，你也去见一下，就在我那儿吃晚饭。”

陈克非虽然从没见过蒋经国，但此时也无雅兴看“太子”的尊容，不以为然地说道：“总统有什么要事，何至于派他的儿子来！”

宋、陈回到江口绥靖公署临时司令部时，蒋经国早已来了。

蒋经国此次来，给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各捎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给陈克非的信上，开头来了个“克非吾弟”，然后写道：“勘乱以来，匪顽未止，皆因我军将士未能以雷霆万钧之力为锤击。更未以金汤百仞之固施堵歼。”最后给陈克非鼓气：“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尺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

国民党气数已尽，军心早散，这不是蒋介石挥几下“御笔”就能够挽救得了的问题。正当陈克非向蒋经国表示“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时，二野几路大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宋希濂残部急追而来。

宋部钟彬十四兵团在二野三兵团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迅即溃败。陈克非的主力第二军，稍加抵抗，也被隔断失去掌握。宋希濂率残部赶紧向西逃跑。

宋希濂上车后，司机开不动车，原来吉普车的一个轮胎破了，宋赶紧派人到前面截住陈克非的车，换上了陈克非吉普车的备用胎，才得以逃脱。十五军军长刘症为了快些逃跑，等不及自己的车外出回来，坐上陈克非的车，急忙西逃。

23 日上午 9 时，宋希濂率残部连滚带爬逃到了白马场地区。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正准备停下来喘口气，弄点饭吃，但立即接到报告，说后面追的解放军相距只有六七里地了。宋希濂一听，哪还敢吃饭，命令部队立即开拔。

这一口气，跑了十多个小时，天黑时到达南川。趁天黑，宋希濂让残部停下来喘口气。

宋清查了一下剩余的人数，老弱病残加在一起，还有七八千。趁部队休息，宋希濂立即把带在身边的几员文武大将召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逃路。

宋身边还剩下的几员大将是：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刚接替军长职务时间不长的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宋的参谋长罗克甲、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陈定和“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等。

这些败军之将，坐在一起，议论了半天，也找不出上好之策。

有的说：“退到重庆去，蒋介石还在重庆，有他吃的，就应该有我们吃的。”

但马上就有人反对：“听刚从那边退过来的人说，蒋介石已有命令：凡前方退下来的部队，一律不准经过重庆，凡不听令者，杀无赦！过都不让过，怎么还能退到重庆。”

立刻有人又接着附和：“就是你退到重庆，国防部还能放过你，这不是自己找上门送死吗？”

宋希濂也不赞成逃往重庆，但他主要是担心无颜见他的“校长”，让别的将领揶揄。

接着又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彻底战败了，光跑也不是出路。到了这个时候，顾命要紧，什么脸面不脸面，共军不是说优待俘虏吗？主动投降，还能弄个宽大处理。”

这种意见也没有获得通过，特别是刚当上一二二军军长的丁树中，更是极力反对：“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当，现在说不杀头，那谁知道以后杀不杀。就是不杀头，让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过。听说连张治中在北平都是软禁着的，更何况我们？”

丁树中，原名丁昌，原来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所以他极力反对投诚。

此时，宋希濂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与张治中有交往 20 多年，关系颇好。在张治中赴北平前，曾答应以后会写信给他，但宋一直未收到张的来信，情况不明，他也不主张向共军投诚。

最后还是继续逃跑的意见占了上风：“走，不管一切地走，实在走不了再说。只要能脱离共军的追赶不被歼灭，一切都好说。”

于是又讨论往哪里走，最后选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步，先到西昌；第二步，到了西昌以后，休整一两天，再继续往西走，逃到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当然，这些人当时的心里很清楚，只要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视情况逃往国外就容易多了。只不过在他们讨论时，没有直接说出这三个目标。

这个逃跑的思路，实际就是在 3 月下旬宋希濂向蒋介石献策的国军生存之路。

他们认为七八千人抱在一团，行动不便，目标太大，要先分散，逃掉了，再集中。最后商定：队伍分成三个纵队行动，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三人分头率领。并规定：其它两个纵队，要每晚用无线电向宋报告部队到达的位置；为了保密起见，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即与国防部及其它电台切掉一切联系。

计划已定，各路人马即开始自主行动。

24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前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训话，说明今后前途未卜，凡不愿继续西行者，可发薪三个月，自由遣散。结果，当场遣散了200多人。同一天早晨，宋又派办公室主任陈定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处长冷培元，将存放在重庆的三千多两黄金，如数运往綦江。

宋希濂的司令部，此时只剩下两部吉普车，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各乘一辆，宋希濂只好随部队徒步向綦江西逃。

当他走到南川附近的时候，和已逃到这里的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兵团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相遇。

“宋总，您率部队这是走向何处？”陈克非首先问道。

“哦，这……”宋希濂不愿告诉陈克非实底，竟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说。稍停顿了一下，宋搪塞陈克非道：

“我先到涪陵找钟司令，看看情况后再说。”

陈克非是宋希濂手下的主要将领，他为何不愿以实相告呢？

原来在8月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陈明仁曾给宋希濂发一电报，要求宋希濂一同起义，但遭到宋的拒绝。事情过后，宋没有将此事向蒋介石秉报。但不知从什么地方，蒋介石得知了这件事，对宋产生怀疑，立即派他的内侄毛景彪（时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进行调查。毛景彪一到重庆，首先和蒋介石的同乡、宋希濂的部下、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通话，询问宋希濂近日的作战情况以及生活诸方面的问题，陈一一作答。毛并且让陈“今后随时上报宋的有关情况”，陈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毛、陈的这次通话，恰巧被司令部情报人员监听，并如实作了记录，上呈给宋，宋希濂得知蒋介石在后面搞小动作，大为不满。宋认为蒋介石不信任他，在黄埔系里还要搞“同乡会”，不但从此对陈克非时有提防，就是对蒋介石也开始不满。这次西逃，他宁愿逃到国外去，也不愿到重庆找蒋介石，这恐怕与8月间发生的事也大有关系。所以，宋希濂没有向陈克非如实告诉他们昨日晚商定的西逃计划。

陈克非、刘平听说宋要去涪陵找十四兵团司令钟彬，都劝他不要去。宋则问陈、刘：“你们打算如何行动呢？”

陈克非说：“我们想先去看罗广文，看他有没有什么高见，然后再作决定！”

“那好吧，现在这个局面，我也不好和你们一起去看他了，咱们以后再联系！”

宋希濂说完，也就各走各的路。当日黄昏，宋希濂徒步逃到綦江附近的三溪镇。

25日，宋希濂司令部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冷培元，把3000两黄金从重庆带到了三溪，宋即拨给冷100多两，让他作遣散重庆办事处人员之用，剩下的作为冷的生活费。同时，宋给妹妹写了一封极伤感的信，让冷到重庆后即刻转交。因为当时宋的妹妹、妹夫均住在重庆。

26日一大早，宋希濂率部离开公路向西急逃。宋率领的这个纵队，主要是司令部直属队人员和军政干部的学生，有几千人。宋给这个纵队制定的逃跑路线是：綦江—李市—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高家场。每日行程约70华里，一路尚称顺利。

12月6日中午，宋希濂一行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对岸，正欲

前行，突然先头部队派人向宋希濂报告：“报告总司令，前面江岸有人阻拦我们过江。”

宋希濂一听大吃一惊，前面难道有了共军不成？于是停住脚步，急忙问道：“什么人阻挡我们过江？”

“他们自称是红帮的大刀队！”

宋希濂一听是红帮的大刀队，松了一口气，对来人说道：“赶快派人与他们交涉，最好不要发生冲突！”

“是！”前方来人跑步而去。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宋希濂走到离岸边还有几里地的地方，前方又有人跑步报告：“报告总司令，经过交涉，红帮大刀队还是不让我们通过，而且把我们派去交涉的人也给杀了！”

宋希濂听后勃然大怒，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小小的大刀队竟也敢欺负我们，便大声喝道：“给我消灭他们！”

大刀队本是一帮乌合之众，虽有干多人，但枪械不多，经不住宋希濂残部一阵猛打，纷纷逃去。

宋部在上下游分两路渡过江，黄昏时分到达牛喜场。

宋在这里决定休息一天，因为连日来急于逃命，整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饱，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再说，宋残部带的现金很少，只有一些黄金，买东西极不方便，预定第二天派人到宜宾去用黄金兑换些现金，以供急用，然后再走。

宋认为共军不会很快追来，一吃罢晚饭，便倒头睡去了。

宋正在熟睡，忽然被人用力椎醒。宋赶紧坐起来，原来是警五团副团长堂侄宋展翔，正神色不安地站在跟前，忙问：“半夜三更，有什么事？”

宋展翔精神紧张地说道：“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同乡，一直和我关系很好，现在郭汝槐部当副团长。刚才他送来急信，说郭汝槐命他这个团前来牛喜场监视我们。部队半夜已经出发。我那个同学认为，此次行动郭汝槐不怀好意。”

“那个副团长在哪里？”宋希濂急问。

“他为了给我们送信，特意随尖刀排策马同行，送完信就立即回去了！”宋展翔答道。

宋希濂心里思忖：“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很可能是受蒋之命，来解决我们的。不管是真是假，这时只能当作真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宋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3点多钟，估计郭汝槐的部队要到6、7点钟才能达到。他一边急忙穿衣服，一边吩咐宋展翔：

“通知部队赶快起床，抓紧时间弄点饭吃，赶紧上路。”

天色微明时分，宋希濂残部离开了牛喜场。此时，天空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天色昏暗，宋部人马，跌跌撞撞，艰难前行，形象十分狼狈。

宋希濂哪里得知，郭汝槐此时不仅正在积极策划率部起义，而且他早已是共产党的人了。

郭汝槐，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抗战之前，在国军中是一位并无多大影响的人物。抗战以后，他逐渐引起国军同僚们的注意和妒嫉。

抗战开始，在松沪前线，他时任旅长，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引起爱招揽人才的陈诚重视。此后，节节高升，一发而不可收。

1946年9月，他升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国军的部队编制。同年又升任总参办公厅主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次年，任国防部要害部门作战厅少将厅长。

他既是陈诚爱将，又颇得委员长欢心，他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武官，赴美三人军事考察团团员；被美国军方誉为“少年将军”。渡江战役之后，为确保四川，蒋介石特擢升郭汝槐为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和川南叙泸警备司令；辖泸州、宜宾、乐山、自贡、资中计四个专区一市43个县。

就是这朵“黄埔之花”，这个在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大员们的派系中游刃有余，一致都称好的郭汝槐，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准备打内战之际，就走向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营。

原来郭汝槐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蒋介石迫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槐堂兄郭汝栋，清除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当时郭汝槐在该军中任营长，于是郭汝栋就把郭汝槐送到日本留学。此后，郭汝槐便与组织脱离了联系。1945年5月，通过伍廉儒介绍，在重庆和董必武取得联系，并向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

在重庆，他同中共秘密建立了联系，随时递送重大绝密情报。当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军展开进攻时，他将国民党军队的参战人数、部队番号、开进路线等情报及时传送出去，使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一举被歼；当“常胜军”杜聿明率蒋军50余万，在徐州与共军展开殊死的淮海大战时，蒋介石指示郭汝槐将“作战计划书”，找人写成工整的楷体。当郭汝槐将楷体写成的“淮海大战作战计划书”送给蒋介石时，复件同时送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在淮海大战犹酣，国军败局已定时，杜聿明冒着枪林弹雨，乘飞机回到南京，要求总裁批准他的紧急撤退方案。

蒋介石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杜聿明的撤退方案。参加会议的，有陈诚、白崇禧、顾祝同、何应钦等军事作战决策人物。杜聿明也在座。当然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槐，也是此种会议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会上，敏感的杜聿明前思后想一联系，捕捉到一些郭通共的蛛丝马迹。杜聿明当即站起，请总裁给他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

杜聿明话一出口，先惹恼了其他几位作战决策大员，立即给杜聿明一顿抨击，认为杜聿明的撤退方针，确如郭汝槐所说，是一个“只顾自己逃命”的错误方针，应坚决予以否定。

蒋介石见此，便令杜聿明：“不准突围，等待援军，违令者，以军法从事！”

杜聿明立即奔赴前线，明令即将突出重围的15万部队：“停止突围，就地待命，违令者，斩！”“就地待命”，是坐以待毙也！

解放军如潮水般往上涌，把杜部铁桶般围起来。

不几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战报，称：邱清泉被当场击毙，杜聿明被生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悉数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宋希濂率残部于12月5日，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之前，宋希濂曾派人到宜宾，和驻在该城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槐联系，要求过江后进宜宾，再向西行。宋希濂为了讨好郭汝槐，并派人送去了宋视为宝物的绥靖公署唯一的一部电影放映机。

郭汝槐收下了放映机，派参谋给宋希濂送去通知：奉顾总长电话指示，宋可带少数警卫人员进城，其余部队人员概不准入，伺宋进城协商后，再行决定，云云。

宋认为郭汝槐不给他面子，遂堵气率残部，绕过宜宾北岸高地，整整比直接通过宜宾多走了1天半的路程，于12月6日中午，到达牛喜场。

如果宋希濂进得城来，能不能出去大概就由不得他了。

就在郭汝槐拒绝宋残部入城的次日，二野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追击宋希濂部到此，郭汝槐悄悄打开绿灯，让解放军畅通无阻，穿宜宾而过，解放军以较快的速度最后歼灭了宋希濂部，这是后话。

郭汝槐在宜宾以东的高家场诱捕宋希濂未成，即于6日晚，又派了一个团的精兵，前去偷袭，又因内部泄露消息，使计划落空。因为当时郭汝槐尚处隐蔽之中，还不能“明目张胆”行事，故使宋希濂又多跑了几天的路。

宋希濂率残部逃离牛喜场后，于18日下午到达高家场镇附近，正在行进途中，宋的副参谋长罗开甲，从前边跑来，对宋希濂说：“总座，宜宾方面刚才有入送来消息，说郭汝槐已经叛变投共，现正在准备迎接共军入城。”

宋希濂听到这个消息，深感处境更加不妙。慌忙让罗开甲通知部队停止前进，他要给部队讲话。

罗开甲把部队集合在一个古庙里，总共还有2000多人。

天色阴暗，冷雨靠靠。宋希濂手柱着用树枝做成的拐杖，有气无力的走上一块门板，在昏暗的烛光下，看了看会场，声音嘶哑着说道：

“诸位将军、诸位弟兄：现在的处境，即使我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必须承认，在军事上，我们是彻底失败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大家，前面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党统治下过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只要有一分钟的生命，就要与共军战斗到底！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苦，走的可能是羊肠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饿肚子。即使这样，还要赶路，如果情况紧张，有时一天可能要走一百多里路……”

说到这里，宋希濂有些说不下去了。古庙之内一片抽泣之声。

宋希濂继续悲凄地说：“我宋某的为人，平日大家是清楚的。现在大难当头，我更愿与大家同生共死。但现在处境恶劣，前途未卜，你们如果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并分发银两，作旅途费用，自谋活路。”

就这样，宋希濂给其残部讲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愿意走的，分发些遣散费；不愿走的，又分成两拨人马，继续向西前进。

12月14日下午2时左右，又经过五天五夜不间断的行走，宋希濂部逃到川东的犍为县清水溪镇。

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盛的市镇。宋即命残部在镇外就地休息，生火做饭，同时派人进镇再用黄金换些银洋。

宋部有的把饭刚做好，有的还正在做，派到镇里换银洋的人员慌慌张张跑了回来，一直奔到宋希濂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总……总司令，不……不好了，共军离这里只有四、五里了，镇里的人正在四处奔逃！”

这消息对宋希濂犹如晴天霹雳。他说了声“来得好快！”丢掉饭碗，向

部队打了个招呼，便一溜小跑向北逃去。

向前跑出五、六里路，已听到从清水溪方向传来的枪声，宋希濂估计是解放军在清扫清溪的地方团队。

从12月14日到12月6日中午，宋希濂残部背后的枪声未曾断过。解放军在后边追得紧，宋希濂残部也就跑得紧，这股解放军甩掉了，接着又被其他解放军部队咬上。就这样，若即若离，两军远时相距七八里，近时则有三四里，一连几天几夜，不敢睡大觉，不能吃饱饭，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司令部机动车辆早就丢完了，原有的几十匹马，大部分被饿死，有的坠下山崖，行李辎重更是所剩无几，一味逃命，其狼狈之状，惨不忍睹。

12月18日深夜，宋希濂率残部逃抵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

沙坪原是宋事先约定的三个西逃纵队的汇合点。在宋率领的这一路到达此地时，由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率领的另一路，已先于宋六小时抵达此地。由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率领的另一路，已永远不能和他们汇合了，该部已于15日深夜在铁炉场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丁本人去向不明。

宋抵达沙坪不多时，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也率领1000多人，到沙坪和宋希濂汇合，而且还带来几十辆卡车、辎重、服装及食品。

罗文山的到来，对宋希濂来说真可是雪中送炭，宋仰天长叹：“天不灭我也！”

但宋希濂实在是高兴的早了点，岂不知此时，第二野战军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一三九团，由徐仲禹团长率领，已紧紧地背后咬住了他们。

如前所述，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的任务，本来是西进川康边界，防止宋希濂部逃往滇缅边境的。当四十八师一三九团西进到峨边县附近时，并不知道前面发现的敌人是宋希濂残部，反正是见敌人就打，还管他是哪一部分！

宋希濂与顾葆裕、罗文山汇合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原来预定的下一站——高场镇方向急逃。

徐仲禹率领一三九团，也马不停蹄地在后面紧追不舍。19日拂晓，一三九团追到新场附近，与担任后尾掩护的罗文山等1000多人相遇，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部投降。

一三九团解决罗文山残部后，继续向前急追。19日上午10时左右，在金河口追上了宋希濂

此时，宋残部1000多人正在从大渡河的南岸向北岸渡河，正当宋希濂刚渡到北岸边时，北岸山间东西两侧，突然枪炮声大作，一三九团已把宋希濂残部团团围住，并发起攻击！

宋部遭到突然袭击，立刻大乱，已渡到北岸的，狼奔豕突。没有渡到北岸的南岸宋部，也四处奔逃。

但不管是北岸的敌人，还是南岸的敌人，都在解放军机枪的射程之内，要想逃跑已实不可能。这些敌人到此时已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经不住解放军一阵猛烈扫射和冲杀，没有被打死的，便纷纷举手投降。沿着岸边东逃西奔的敌人，也很快被解放军打死或俘获。不到半个时辰，宋部2000多人，即被悉数解决。

解放军开始向宋残部敌人突然发起攻击之后，宋希濂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急忙顺着河北岸向东逃奔，但没跑出半里远，即被解放军堵住，然后掉

转向西跑，西边的解放军也压了过来。北边是高山，南边是大河，宋希濂已走投无路。

这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仰天又是一声长叹：“天灭我也！”说完，顺手从腰间拔出美国造小手枪，对准太阳穴……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宋希濂要扣动扳机之时，他的一个警卫，一下子扑了过来，夺下了宋希濂手中的手枪。

宋希濂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宋希濂刚被俘时，解放军一三九团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宋希濂，他的部下也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审问他时，他说：“我叫周伯瑞，司令部军需。”

在第二天被押往解放区的途中，宋希濂和几个来信策划逃跑未遂。路上碰到了一位解放军干部。这位解放军干部，原是宋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曾差点被宋希濂枪毙。真是冤家路窄。宋希濂再不好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向押他的解放军承认：“我就是宋希濂。”

后来，这位国民党的著名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改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幸的一年。……不，应该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1959年12月，宋希濂被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释放。1961年2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选为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国探亲，后旅居美国。1982年8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宋希濂被选为首席顾问。1984年，参加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1988年4月，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

宋希濂在美国多年，广交朋友，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大量事情。台湾控制的报纸大骂宋希濂为“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台湾作家李敖著文说，宋希濂在青壮之年，实则为国民党做鹰犬，也为做鹰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国民党不借旧情，竟指他为中共鹰犬，于理不合。宋希濂十分感谢这位素昧平生的作家的公正评语，在后来出版自传时，便给该书起名叫《鹰犬将军》。

十二、春城不曾寒

卢汉春城起义，数十名国民党军政大员成为阶下囚。

刘伯承急电陈赓：昆明军情紧急，令火速驰援！李弥的老婆掀开她的旗袍。毛泽东给敌人布置了一个更大的口袋。

“红军团”血战无名山于曹天戈插翅难过元江桥。敌军一个老军官垂头丧气他说：不中了，交枪吧！

1949年12月中旬，陈赓四兵团刚刚完成广西作战，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喘口气，即接到刘、邓发来的急电：昆明情况紧急，着即派部队火速驰援卢汉部！

情况是这样：卢汉本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在解放军胜利进军形势的影响下，经过秘密准备，于12月9日，突然逮捕国民党在云南的大批高级官员，宣布起义。被逮捕的国民党官员中包括蒋介石的心腹张群、国民党中央保密局云南情报站站长沈醉、蒋军第八军军长兼云南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保密局云南情报站副站长徐远举、周浩等数十人，还有一大批从成都经昆明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家眷。

12月11日，《云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而且在当日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云南广播电台并反复播送李弥、余程万等人的讲话，他们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

但事情并不简单。

卢汉是利用一个会议拘禁这批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这个会议是卢汉强迫张群召集的。

张群被拘禁后，卢汉也想让他在拥护起义的通电上签名。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从心里表示支持。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甚不满意。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便与你们一起行动，望请卢将军原谅！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放我走，我将会感激余生。我出去以后，今后也决不再问政事，要到海外做寓公去。”

由于张群的花言巧语，11日下午，被卢汉释放。

而李弥、余程万等人，则在暗中积极策划阴谋行动。

12日上午，由李弥发起，在被拘禁的人中，余程万、李树藩、李弥、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沈醉七人，结拜为“患难兄弟”，欲与卢汉对抗到底。

13日下午，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在副军长彭佐熙率领下，开始从昆明市东南方向，向卢汉守城部队发起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团，也与卢汉的部队发生战斗。

就在同一天的上午，李弥的老婆要求看望李弥，得到卢汉批准，并请她做李弥的工作，希望李弥通知部下停止进攻，听候改编。李弥在其老婆离开拘禁地之前，给其部下写了一封信，要求部下放下武器，让老婆带到大板桥正向卢汉部队进攻的李部补充团。

当日下午，李弥老婆又转回李弥的拘禁地五华山，给李弥带来李部的一封信，信上表示接受李的命令，停止军事进攻。但信上也表示，希望李弥早日返回部队，以统领全军，改编问题方能顺利进行。李弥看完，当即将此信托人转交给卢汉。

与此同时，李弥的老婆掀开旗袍的下摆取出一封密信，悄悄地交给李弥。信上的内容和上封信完全相反，说李部正在进一步准备，将以全力向昆明发动进攻。

14日，余程万向卢汉“建议”，让允许其师长石补天出去传达命令，表面上说是要部队停止进攻，实则是让他们加紧进攻。

卢汉同意了余的“建议”，放走了石补天。石补天下午又返回五华山，向卢汉说，只要释放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军即可停止进攻。

在第二十六军、八军向卢汉部队进攻的同时，潜伏在昆明的国民党特务，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蒋介石得知卢汉宣布起义，即命令空军对昆明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轰炸，每次三至五架，经常不断。

原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谋汤尧，也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乘飞机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卢汉部队发起进攻。

15、16两日，余程万、李弥，先后被卢汉释放。他们临走时，嘱咐其他仍被拘禁的拜把兄弟，说让他们“再坚持一下”，等他们打进昆明，再行“搭救”。

余、石、李被释放之后，立刻指挥部队向卢汉守军发动了更具规模的进攻。

卢汉在昆明的只是一些地方部队，全部加在一起，总共有一个军左右，装备较差。第八军、二十六军几万人多路进攻，昆明危在旦夕。卢汉火速派人送信，向解放军紧急求援。

陈赓接到刘、邓首长火速驰援昆明的命令后，立即派出第四十九师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向昆明急进。因为当时解放军缴获了敌人大量的运输工具，陈赓命令，尽量集中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将四十九师从贵阳向昆明运送。

当时四兵团的整个部署是：以百色地区的三十八军主力，经剥隘、富宁、砚山，直插金平、马关、河口地区，断敌退路；以桂滇黔边纵主力，配合卢汉所部坚守昆明，并配合我军主力围歼作战，同时由贵州境的四兵团一部，由平彝向敌八军、二十六军侧后进击；以十三军主力经南宁、百色、富宁、文山，向开远、蒙自地区兼程急进，首先控制蒙自机场，断敌退路，配合四野部队全歼残匪；兵团主力十四、十五军分别进驻昆明、滇西及滇北地区，接收及解放云南。此外，组织云南边纵各支队，积极袭扰敌人，破坏道路，迟滞疲惫敌军，配合主力作战。陈赓要求部队：继续贯彻毛主席先兜后歼，大胆迂回的作战方针，发扬我军艰苦顽强、勇敢机智的优良作风，取得全歼残敌的胜利。

我军五兵团四十九师接到驰援昆明命令后，分别由毕节、安顺两地出发，昼夜疾进，连续解放昆明东北和以东的霁益、曲靖、陆良三座县城。

12月22日，将敌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残部，李弥的第八军第三师及陆军总部宪兵团歼灭在曲靖、霁益地区。

此时，毛泽东为了使我军能够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和截断敌军逃入越南的退路，命令驰援昆明的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不再向南急追，以麻痹、

滞留敌人；又令驻百色的四野三十八军主力，就近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断敌逃入越南的退路；又令四兵团十三军，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于国内的作战计划。

在我军各路大军紧急驰援昆明的同时，卢汉将军率领所部与敌人开展了激烈的战斗。

从当时昆明内外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敌人处于明显的优势。因此，李弥、余程万等异常猖狂，认为在他们的陆、空进攻下，昆明即可被攻破。

12月18日，敌人向昆明发动总攻。

在敌人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卢汉将防守云南的部队缩短战线，加强纵深配备，以昆明为中心，英勇抗击敌人，始终未让敌人攻占昆明。

在保卫昆明的战斗中，卢汉调动了昆明所有的战斗力量，除了部队参加作战外，所有的警察也参加了战斗。

在敌人向昆明猛烈进攻时，昆明的地下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组织各界群众建立“义勇自卫大队”，积极参加保卫昆明的战斗。他们除担任护厂、护校工作之外，尚有数万人直接参加到城防保卫战之中。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堆沙包，挖战壕，筑碉堡，修造枪支，清查匪特，保护国家财产。城外农民还冒险通过火线，报告敌军情况；还有人将敌机空投下来的文件袋送进城来。

19日，敌军对城防核心阵地发动猛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成百上千的敌人进行波浪式冲锋；到晚9时，敌军组织了敢死队，企图打开几个缺口，攻入城内。装备很差的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精神鼓舞下，也增强了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对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20日，敌军攻势更加猛烈，第八军攻击重点为昙华寺、大树营地区，二十六军攻击重点为五里多、吴井桥一带，企图攻入塘子巷小火车站，但都遭到了昆明守军的坚决抵抗。

蒋军围攻昆明城久攻不下，害怕这样相持太久，会遭到解放军的夹击，在20日夜被迫向滇南蒙自、开远方向撤退。

云南蒙自县，地处云南南部，因蒋军在此建有蒙自飞机场，不论是从空中或是陆路，敌军都有外逃的方便条件。在歼灭云南敌军的过程中，控制蒙自地区，截断敌人逃往越南的道路，就成为我军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

这个艰巨的任务，陈赓司令员交给了能征善战的十三军指战员。

三十七师被指定为十三军进军云南的第一梯队。1950年元旦，三十七师不顾粤桂大围歼征战的极度疲劳，自南宁附近开拔。

三十七师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挺进，每日的行程不断增加，120里，150里，180里，220里；休息的时间不断减少，六小时，四小时，二小时，最后就干脆日夜不停地前进。疲劳和瞌睡如同恶魔一样纠缠着每一个人，只要前面传来“就地休息”的命令，那怕只有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都会倒地睡着。

桂西人烟稀少，滇南多高山峻岭，征途非常艰难。战士们身上背着四、五十斤重的枪支、弹药、粮袋、背包，每向前走一步都感到十分艰难。

经过14天的昼夜进军，三十七师急进200里，在1950年1月14日，完成了从桂西到滇南的远程大奔袭。与此同时，四野的两个师也从百色地区沿边境隐蔽跃进千余里，进占了中越边界上的重镇河口，并抢占敌军在红河中游刚刚架好的一座浮桥，切断了敌军逃往越南的道路。

此时，因李弥破坏和平“有功”，反共坚决，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除指挥他的第八军五个师外，第二十六军的三个师也归他率领，共有兵力约6万人左右，盘踞在蒙自、个旧、开远、建水一带。尽管只剩下小小的一块地盘，孤零零的两个军，已是穷途末路，可李弥仍决心与解放军“最后决战”，以实现蒋介石“确保滇南、控制昆明，左右川康，建立西南反攻复国的陆上基地”的梦想。

在此之前，蒋介石特电邀李弥赴台湾，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关于八军的出路问题，蒋介石提出：一是留在云南，

二是撤往海南岛，三是撤到台湾，这三个方案，由李弥自行选择。李弥为了表示自己蒋家王朝的忠心，立即表示：“滇南战略地位重要，我熟悉云南的情况，愿意留在云南，为将来国军反攻复国建立游击基地。”

会议根据李弥的要求，经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批准，在破坏云南和平中李弥的好搭档，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继续坐镇蒙自和李弥共图大计。

会议还决定，把现在云南的第二十六军。用飞机分批撤往台湾。

李弥从台湾回来后，当天夜里通宵召开军事会议。开会期间，与会的高级军官，缺乏李弥的勇气和信心，感到前途暗淡。特别是当谈到二十六军即将撤往台湾，第八军将孤军留下来时，大家更是伤心至极。

会议正开到紧张之时，忽然传来情报，报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逼近蒙自，会场当时大乱，要求撤军之声，立时占了上风。李弥和汤

尧面面相觑，神情恍惚，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有人又报告，说并不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而是当地的“土共”扰乱。大家这才安定下来。继续开会。根据李弥的意图，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

一、第二十六军撤走后，八军接防蒙自，固守飞机场，主力东移，以逸待劳，转守为攻，在芒村、文山、马关一线，与共军进行决战。打胜之后，在滇南安定一个时期，补充训练，壮大反攻力量，然后夺取昆明，向川康发展，逐步扩大基地，直至收复大陆全部失地。

二、如果在文山、蒙自失败，八军主力迅速向元江以南撤离，严守元江，控制滇南边疆。

李弥认为，元江两岸，全是高插云霄的悬崖绝壁，水面狭窄，水流湍急，一挺机枪便可控制相当长的江面，使共军的突击部队连头都抬不起来；加之，共军从中原转战云南，连年苦战，未及休整，是强弩之末，李弥认为他们是可以打胜的。

三、如果被共军突破元江防线，八军就撤到中缅边界的南峽、车里、沸海三角地区，退可守，进可攻，昆明、百色，甚至重庆都在其威胁之下。

总之，李弥认为，不论是哪一种方案，他们在滇南都将大有作为。

当李弥正在召集他的高级幕僚开军事会议之时，其部下先是报告陈赓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到蒙自附近地区，后又予以否认，说是“土共”（指我“边纵”）扰乱，其实这就是陈赓兵团第三十七师，此时已经抵近蒙自。

在三十七师抵达蒙自地区的前两天，敌二十六军已开始撤往台湾。余程万躲到台湾不敢回来，由逃到海南岛的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进行遥控指

挥。

在运走了第二十六军直属队一部之后，军心动摇，部队陷入一片混乱。汤尧、彭佐熙等人也发现，就靠这几架飞机，要把全军都空运到台湾时间不允许，于是，汤、李为了“稳定”军心，则强制把官佐的家眷，一并先运往海南岛作抵押品。这一措施，立即遭到各级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因为高级军官的家眷早已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了，于是纷纷抵抗、阻拦家眷运往海南岛。彭又下令，要军官们“深领上峰厚爱”，速速交出家眷，如有故意玩忽匿藏不交者，务必以违抗命令论处。但“紧急命令”仍无济于事，敌第九十三师二十七团，在两天中携带家眷逃跑了五个正副连长。彭佐熙见此状危急，又下令：“如有再事违抗者，就地枪杀。眷属不走者，同律。”第二七九团第一连副连长，逃跑未遂被捕，和他的老婆双双被处死。接着又连续处死一个排长，二个连长和一个营长。第九十三师带家眷的下级军官，全部被关在屋子里，门口由团级干部轮流站岗看管。全军尉官以上的老婆孩子，统统被送往蒙自机场，这时哭声震野，有的女人觉活路无望，便投水自尽，……弄得敌军兵营里惶惶不安，叫骂声不绝。

三十六师抵达蒙自之后，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研究决定：趁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迅速绕过敌人外围警戒部队，把进攻矛头直指蒙自机场，首先封闭敌人的空中逃路，打乱敌人的部署，尔后协同兄弟部队，把敌人全歼于蒙自、个旧、建水地区。

周学义、雷起云和已由一一一团团长提升为副师长吴效闵，分别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后，即命令一一一团绕道石洞，主攻蒙自飞机场；一九团绕道东山，直插黑龙潭，配合一一一团行动，并向北警戒开远方向可能来援的敌八军。

各部队按照命令，立即行动，迅速绕过了敌军的警戒部队。

战士们看到三五成群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轰鸣着落向蒙自机场，知道这是从台湾飞来运送敌军逃跑的。大家都急得猛跑，不休息，不吃饭，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当晚8时，一一一团进占机场周围附近的一家寨、黑龙潭等村。

这天晚上，是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交接防地的前夕，防务空虚，毫无战备可言。第二十六军的官兵都在捆绑行李，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到台湾去。刚刚进入蒙自的敌第八军四十二师官兵，正在找房子、寻铺草、支床铺、架电线，准备第二天接防。据后来被活捉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供称，当天夜晚，他和八军、二十六军的一些军官、家属，还在蒙自县城的戏院里看京戏。

正在汤尧等看京戏时，一一一团在副师长吴效闵的率领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悄悄向敌人的飞机场逼近。

月亮冉冉升上树梢，时间到了。一一一团团长傅一宗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命令：“开始行动！”

三营营长安玉峰，立即率领300多名突击队员，趁着月光，越过沟渠，涉过稻田，穿过坟地，分成几路，神不知，鬼不觉，摸进了敌人的飞机场。

当八连六班长常华堂，带着尖刀班向敌人的机场纵深摸进的时候，迎面碰吧了敌军的巡逻分队。敌人的巡逻兵，约莫有二三十人，正顺着飞机场跑道向这边走来。

带队的军官，手提左轮手枪，左顾右盼，前后张望。走着走着，他

忽然发现机场边沿的草地上有人影隐约逼近，立即停止前进，猝然向晃动的人影大声喝问：

“什么人？”

“自己人。”常华堂机敏而熟练地应声答道。

“口令！”

“我们白天上山巡逻，刚刚回来，怎么会知道口令……”

“他妈的，连口令都不知道，你们巡逻个鬼！”那个军官一边骂，一边挥起手枪说，“不准动，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打伤了，你们要负责！”常华堂尖刀班的勇士们，一面吱唔着、应付着，一面趁势扔过去几个手榴弹。敌人巡逻兵还了一阵子枪。拔脚便逃。

突然的枪炮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了沉睡的敌军官兵。顿时，机场上的敌人乱撞乱碰，哇哇乱叫，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有的仓皇起飞，有的慌忙起飞后在高山上撞毁；有的还没来得及起飞，驾驶员就被我军战士从驾驶舱中拉了下来。

常华堂尖刀班，飞快地朝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冲去。端起冲锋枪，对准机头就是一梭子弹，机头上的灯一下子就被打灭了，发动机也不响了。常华堂不禁兴奋地喊起来：“打中了！打中了！大家伙——飞机让咱们俘虏啦！”

在英雄营长安玉峰的指挥下，常华堂尖刀班接着冲进了敌人的空军指挥所，相继占领了四幢房子，活捉了200多个敌人。同时，在他们班两侧的突击队，也勇猛地冲进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和一排干房。摆在机场上的一排排山炮、战防炮、迫击炮还没有来得及装上炮弹，就成了勇士们的战利品。钻在平房里睡觉的敌空军地勤人员，有的穿着小裤衩乱放枪，有的在被窝里就当了俘虏。

经过半夜时间的战斗，一一团占领了蒙自飞机场，并乘胜攻进了蒙自县城。同时，一九团也进行了协助进攻，消灭了蒙自城南新安所之敌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两个营。蒙自城周围的敌人，排找不到连，连找不到营，营找不到团，都先后自动放下了武器。鸣鹭地区的敌警戒团，在蒙自解放之后，犹如丧家之犬，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开远之南的大庄。他们只不过比机场的敌人多呆了一夜的时间，次日即被三十八师部队歼灭。

汤尧和他的警卫员，在我军进攻开始后，从剧场里拼命窜出来，坐着吉普车逃到城南机场旁边，想坐飞机溜回台湾，但只见机场里战火纷飞，人马喊叫，已经进不去了，只好扭头向西逃去，暂时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李弥在西昌发现蒙自县城方面的电讯中断，立即乘机赶回，可是蒙自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在上空盘旋了一阵，只好飞向台湾，向蒋介石报丧去了。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蒙自机场，歼灭了敌二十六军大部后，驻在开远的敌人军犹如漏网之鱼，急忙朝石屏、元江方向逃窜。

陈赓命令十三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一分钟喘息机会。他具体规定：逃过红河一线的敌二十六军残部，由四野的几个兄弟师负责追歼；四兵团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协同在石屏、元江、墨江一带截击的云南边纵部队追歼敌八军于元江东岸。

猛烈的追击战又展开了。我军分别沿着铁路、公路和小路，且战且追，昼夜不停，紧紧抓住敌人的主力不放。

指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现在正在和敌人赛跑，看谁能早一分钟得到先

机之利，出奇制胜，同时也和友邻部队赛跑，看谁先和敌人交锋接火，立新功。

1月21日上午，三十七师追出团山口，便是当地有名的元江大坡，一上一下就是140里。上到山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师长周学义向左边的山沟里一看，只见忽明忽暗的火把绵延好几十里，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听到人喊马嘶的声音。

周学义正想弄清楚这是什么队伍时，三个头裹黑手中，身穿蓝布衣的游击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们就是多年坚持敌后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战士，是专门来配合十三军作战的。他们报告说：“左边山沟里的队伍是敌八军军长曹天戈带领的左路纵队四十二师和八军直属队，右路纵队教导师和一七师正在前面逃跑！”

他们正说着，有两个青年民兵也汗流浹背跑过来说：

“曹天戈带领的左路纵队，被带路的向导引到了一条被山河阻隔的绝路。现在向导跑了。他们走投无路，想到附近的村子里抓向导，可是老乡都跑光了，连水井和粮食都埋了起来。他们今晚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在左边的山沟里露宿，忍饥挨饿，等天亮后再逃。”

“师长，打不打？”站在师长旁边的红军团团长顾永武问。

“不打！”周学义说，“我们不仅要超过敌人左路纵队，还要抓住敌人跑在前面的右路纵队，力争在元江东北岸全歼敌人。”

“是啊！打蛇要打头，”师政委雷起云接着说，“我们应该把尾追同拦击结合起来，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最后被我们的铁拳砸得粉碎！”

于是，顾永武团又带着部队向前猛插。

四更时分，部队赶到了营盘山，顾永武和先头营——“夜老虎营”副营长秦三顺上山一看，嘿！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躺的躺，坐的坐，互相拥挤，连路也被堵住了。

顾永武团长当机立断，马上命令秦三顺，带一个连，全部摘下帽徽和胸章，伪装成敌人摸上去。秦三顺叫战士们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只要敌人不发觉，就一直往前猛插。

秦三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骑了敌人遗弃的大红马，戴了顶敌军军官的大沿帽，装腔作势边走边咋呼。

被我军追赶得狼狈不堪的敌军官兵，这会儿只想喘口气，让秦三顺带的一连人过去了。

秦三顺带领部队，迅速占领了营盘山制高点，利用黎明前的黑暗，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同时，先头营的另外两个连，和三营营长牛玉堂带领的队伍，也从营盘山的两侧发起了攻击。

营盘山突袭，我军抓了很多俘虏，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其中有一门美造五七炮。

为了摆脱我军的追击，敌八军右路前卫一七师和教导师领导机关，竟不顾他们后边的大部队，在逃到元江西岸后，炸毁了元江铁索桥。接着，被我军追赶到江边的敌右路纵队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眼看滔滔江水，无处可逃，急得在沙滩上东奔西跑。一部分溃兵妄图从江边的一条深沟逃跑，被守在沟口的一九团三营战士们一个一个捉住，接连活捉了七、八百人。

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正被我歼灭的时候，昨晚被我军远远地抛在后

边的敌左路纵队四十二师及敌八军军部，从三十七师师指挥所的右边奔了上来。他们先占领了路通铺，企图跟他们前面的右路纵队会合。

此时，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立即命令一一 团团团长傅一宗，率领部队进行截击，以保证一九团团团长顾永武集中全团力量，大胆使用穿插分割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在天黑前全部肃清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

当天下午，一九团就组织了几支小部队，勇猛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有的一个连就消灭了七、八百个敌人，有的两个班就战败敌人一个营的兵力，有的一个人抓了 50 多个俘虏。天黑前，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被全部歼灭。

就在同一天下午，一一 团也顽强地把敌人左路纵队全部人马阻击在路通铺一线。加之，我们被敌人隔在后面的师直属队和一一 团部，在吴效闵副师长和战斗英雄卫小堂（当时他刚从北京开政协会议回来，在师政治部等待分配工作）的带领下，适时地从敌人背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弄清我们的兵力有多大，就沿着路通铺东北一条杂草丛生的山沟，向元江东北岸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奔逃而去。

敌八军军长曹天戈，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向元江逃跑，企图越过元江。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下令炸毁元江铁索桥，断绝他们逃路的不是解放军，而是他的前卫一七 师师长何进贤少将。

曹天戈得知实情后，暴跳如雷，大骂一七 师。他宣布：过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捉拿一七 师师长何进贤，“以正国法军纪”。

可是，眼前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曹天戈带着工兵、卫士前去修铁索桥，企图过江逃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神速的“夜老虎营”已连夜赶到铁索桥头。共产党员，六连连长张海水率领全连的健儿们猛扑过去，把曹天戈打得落荒而逃，剩下的一些工兵做了俘虏。

曹天戈逃走後，还不死心，又派七八百名士兵抢占铁索桥东边不远的一座无名高山。这座山，平地突起，象用刀削过似的陡峭，山上不长树，全是南方的癞刺金刚、仙人掌和刺藤。它是扼守铁索桥头的天然屏障。

不抢占这座高山，就守不住铁索桥头，敌人就可能会修好桥逃过江去。因此，红军团团团长顾永武命令“夜老虎营”，想尽一切办法攻下这座无名高山。“夜老虎营”营长和教导员，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六连。

六连连长张海水随即带了两个排绕道向这座高山冲击。他们抓住刺藤、癞刺金刚，脚登石崖缝，向山上艰难地攀登。他们到了半山腰，被敌人发觉，机枪子弹、手榴弹倾泻下来。两个班长牺牲，十几个战士负伤，其余的人全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来。

天快黑了，张海水看了看左右，全连能坚持战斗的已经不过 50 来人了。他想，夜战不在人多，而在快、猛、智、勇，就向战士们问道：

“同志们，怎么办？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还占领着这座高山。”

“冲！决不能给我们‘夜老虎营’丢脸！”一个战士大声说道。

一个战斗小组长也坚决他说道：“对，我们一定要攻上去！”

张海水把手一挥，咬紧牙根喊了一声：“跟我上！”

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分三路冲上去，用手榴弹猛炸山上的敌人，占领了敌人的阵地。

但六连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曹天戈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对我进行反扑。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成群结队地向山上拥上来。

张海水立刻组织反击，敌人的两挺重机枪疯狂地进行扫射。我们又有两个班长牺牲，七个战士负伤。

“一定要消灭敌人这两个人力点！”张海水一面喊着，一面冒着密集的弹雨向山头上爬去。

他爬到山顶，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看不到敌人的暗火力点。他又带着部队继续反击。敌人的重机枪又“哒哒”地响起来。

张海水又向山顶爬去。他再次爬到山顶，刚举起望远镜一望，就被敌人的重机枪一梭子打倒。

“敌人的火力点，……就在我们左侧的山头上！”鲜血从他的胸前涌了出来，他仰起头来断断续续他说完这句话。

“连长牺牲了！”

“上去——！为连长报仇——！”

六连的健儿们向前冲击。副排长潘正刚带领两个战斗小组摸上了山头，用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了敌人那两个火力点，打死了那两个机枪射手，活捉了四个弹药手。

这一天，敌人连续向这座高山和铁索桥头疯狂地发动了十几次进攻。“夜老虎营”六连最后打得只剩下了24个人，但仍牢牢地坚守着这座高山和铁索桥头，没让曹天戈带领的近万人马前进一步。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未能逃过元江的敌八军军部和四十二师，被我军分割在荒无人烟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曹天戈及其所属官兵陷入了绝境。因粮食断绝，敌军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地杀马充饥。

此时，我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三十七师在元江东岸红土坡、二塘山一带，可以作战的部队已经不到四个营的兵力了。到处都在战斗，到处都是硝烟弥漫。炊事员、饲养员、公务员、文书、挑夫，几乎都投入了战斗。师、团机关人员也拿起武器抗击敌人的反击。

为了粉碎敌八军军部和四十二师继续逃过元江的企图，彻底消灭这股敌人，师长命令顾永武和傅一宗，带领部队歼灭已被分割，孤立无援的敌八军军部。

顾永武、傅一宗受领任务后，师长严肃地问他们：

“部队能克服当前的困难吗？”

“能——！没有问题。”两位团长回答。

“现在只有战胜饥饿、疲劳，才能战胜敌人！”雷政委接着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顾永武斩钉截铁地回答后，立即率领部队向敌八军军部盘踞的一个山头冲去。指战员们苦战半天，将敌第八军军部的1000多人，全部压缩到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傅一宗率领的两个连乘势扑入沟中，一举全歼了八军军部。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被我活捉，押送到师指挥所。在对曹天戈的问话中，周学义、雷起云得知汤尧也在此处，二人都很兴奋。

在解放战争初期，三十七师在黄河北抓住过胡宗南自封的所谓“天下第一旅”中将旅长黄正诚；在解放战争中期，三十七师活捉过横行中原、镇守古部洛阳的蒋介石青年军二六师中将师长邱行湘；在渡江南下的作战中，三十七师又俘虏了白崇禧的包括粤桂边区“剿匪”总指挥喻英奇中将在内的数百名将校军官，可是，象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他们

还是第一次遇到。周学义立即追问道：“汤尧在哪里？！”

“你的陆军副总司令现在在哪里？！”

“你们看，（曹天戈用手指着北面不远的一座高山说，）正在前面逃跑的那拨人里就有他！”

为了尽快抓住汤尧，周学义结束了对曹天戈的审问。紧接着，三十七师立即又投入追捕汤尧的战斗。

此时，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正带领四十二师由红土坡向二塘山方向逃窜。

原来，在1月16日凌晨，汤尧坐吉普车从蒙自逃出来后，到石屏找到了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他把吉普车丢在石屏城，就跟随曹天戈部队骑马沿山间小路向元江方向逃奔。

我三十七师的指战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汤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师长周学义、师政委雷起云率领师政治机关的干部，到阵地前沿的部队进行动员。

此时，负责游击阻击、迟滞敌人逃跑的边纵部队数百人也投入了战斗。同时，我一一四团和一一一 团走在后面的部队也赶了上来，同三十七师师部等会合，一场围歼战，在元江东岸的红土坡、二塘山地区迅速展开。

激战约五小时，粉碎了汤尧亲自指挥的四十二师的八次反扑，攻占了他们在二塘山临时构筑的全部阵地。被蒋介石称为“骁将”的四十二师师长石健中被当场击毙。五、六千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枪声渐稀，部队开始集合俘虏，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汤尧。他逃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我一一 团一连的战士们看见一股残敌，约七、八百人，都是带着一长一短——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正拚命地越过前面的山包，边打边跑。

战斗英雄郝珍富，立即率领一批战士追了上去，迅速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在第三批俘虏里，有一个面容憔悴、披头散发的妇女，手里提着一个缎面包袱，一看就知道是位官太太。郝珍富提着卡宾枪，走到她的面前。她战兢兢地哭着说：“官长，我们不能分开呀！”

“你跟谁不能分开？”郝珍富问。

“我丈夫……他是个连长……师长被打死了，只要官长高抬贵手，我立刻把他喊过来……”

“好，只要你把丈夫喊过来，我们会宽大他的。”

那个妇女去了不大一会儿，即领过来一个佩带手枪的上尉连长和一个十五、六岁的传令兵。郝连长说：“不要怕，只要你放下武器，我们保证宽大你，还可以放你和你的老婆一起回家。”

“我已经是第二次当俘虏了。我了解贵军的政策，我要争取立功赎罪！”

“好，你真要立功赎罪，我们欢迎。”郝珍富说罢，就命令这个敌连长，派他的传令兵，去通知他的副连长把全连都带过来。

不一会儿，敌副连长带着一批官兵举着枪过来了。但是，还有一股敌人仍龟缩在山梁那边顽抗。

郝珍富命令一个班看守俘虏，一个班坚守阵地进行掩护，自己

带着第三班迅速地冲到敌人的面前，出其不意举起手榴弹，厉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这时，只听敌军一个老军官无可奈何他说：“交枪吧，不中了！”

……不中了……”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敌人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郝珍富把这最后一批俘虏带在一起编队，指定刚才投降的那个连长出来带队，但喊了好几声，他都不敢出来，只是摇头摆手。郝珍富正怀疑他搞什么鬼，忽听站在前边的一个俘虏悄悄对郝珍富

说：“不是他不愿带，而是他不敢带，因为这里头有比他大得多的高级将领！”

“什么高级将领？”郝珍富立即追问。

“陆军副总司令！”这个俘虏仍低着头说道。

“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服装？”

“就在人群里，你找吧，他穿的比我们穿的要好得多，岁数最大。”这个俘虏又悄悄他说了一句。

郝珍富可高兴了。立即带着战士在俘虏群中查找。他发现在最后押来的那批俘虏中，有一个老军官蹲在草地上。这个人穿着深绿色呢大衣，约莫五、六十岁。

郝珍富立刻快步走到俘虏群中间，向那个老军官问道：“你叫什么？”没有回答。

“你是汤尧吗？”郝珍富追问。

还是没吭声。

“你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吗？”郝珍富又大声问了一句。

“是，我就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苍老。

郝珍富一看，他就是刚才那位说：“交枪吧！不中了”的老军官。

郝珍富把汤尧带到连部，连长决定把他押送到师部。汤尧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

连长说：“有马给你骑。”

战士们把汤尧押送到了师指挥所，他没说什么，先跟我们的战士要吃的。

这时，元江东岸的战斗已经结束，元江县的人民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批饭菜。师长叫警卫员给汤尧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盘牛肉炒花菜。

雷政委说：

“这些饭菜都是人民慰劳我们的，现在你们放下了武器，也可分一点了。”

汤尧把两碗饭和一盘菜吃得干干净净，连声说：“贵军宽大……宽大，兄弟我太感谢了！”

饭后，师长叫警卫员把他和他的参谋长杨也可、八军军长曹天戈一起送进了俘虏营。

在元江大战中，只有敌一七 师及教导师一部，在一七 师师长何进贤的率领下，提前过江逃脱。

陈赓司令员和十三军前进指挥所，命令部队立即组织精干分队，穷追逃敌一七 师，不给祖国人民留下一点后患。

三十七师党委决定由周学义师长和吴效闵副师长，各带领两个营急进追击。

此时，敌八军前卫一七 师师长何进贤逃过元江后，正向西逃窜，企图逃出国境。

在边纵和沿途群众的有力配合支援下，部队追击进行得比较顺利。翻过艰险的哀牢山，涉过水流湍急的阿墨江，越过疟蚊肆虐的瘴瘟地区，整整追击了八天八夜。2月4日，终于在镇远县南京街，追上并包围了敌人。经过一天战斗，歼灭了敌一七师1个后卫营。

何进贤见逃路已被断切，下令组织“敢死队”，向我“洛阳英雄连”攻击。

“洛阳英雄连”扼守着一个险峻突起的山峰。这座山象一支巨臂，挡住了何进贤的逃路。何进贤给每个“敢死队员”发放了大量的金银，向我阵地发起了冲锋。

机枪手周继武、刘吉友端着机枪向敌人猛扫。

敌“敢死队员”仍然拼命往上冲，阵地上硝烟弥漫。

“洛阳英雄连”政治指导员王引生，率领勇士们顽强地坚守阵地。连长带着一个排冲到阵地前沿，向敌人反击。机枪射手周继武和刘吉友，再次端着机枪猛扫敌人。

“洛阳英雄连”阵地上的战士越来越少了，连长也负了伤，全连人员伤亡过半，子弹已消耗光了。战斗英雄政治指导员王引生从阵地上跃起，高喊道：“同志们！为了牺牲的同志，为了苦难的滇南人民，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何进贤的“敢死队”向我阵地发起了第九次冲锋，象前八次一样，还是分三路进攻。

“放石头！”周继武喊。

无数大石头顺着斜坡向下飞去，有的直飞而下，有的互相撞击。

何进贤以不足二个团的兵力拖住我们的部队，带着两个团则乘机从南京街的一条山道向西逃跑。我军决定以小部队尾追敌人，以主力部队绕到敌人的前面进行拦击。经过一夜……急行军，在2月5日，我军赶在了敌人的前面，占领了镇远县以西80里的荒草岭和松山一带险要山地。同时，边纵第四团也赶到了，再次包围了敌人。

天慢慢地黑了下來。

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估计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可能会继续发动攻势。但敌人摸不清我军的底细，未敢发动进攻。敌一七师师长派其情报科长，来我军驻处接洽谈判，实则是探听虚实。

周学义将计就计，他对敌情报科长一面说，我们的部队和当地人民武装已经把你们包围住了，一面同意派遣一十九团副团长周峰深入敌一七师师部进行谈判。

周峰带了一名叫郑小保的警卫员，随敌情报科长来到敌方。

当时，我部只有400多人，是由一一、一九团凑起来的。代号是一二师、一一师。敌人误认为我军是两个师的部队。

同时，周峰从了路的敌情报科长那里，了解到敌人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带的家属多，逃出我军的包围圈不容易。另外，敌师长、情报科长等不少骨干分子的妻子儿女均失落在昆明，没有跟上来，所以牵挂很大。周峰在谈判中掌握到敌人的这些弱点，对搞好谈判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敌一七师司令部，敌师长、副师长和团长们正在开会研究对策。开始，敌情报科长将周峰留在屋外。敌司令部的勤务员、警卫员、火夫、马夫……围住周峰，问这问那。周峰乘机向他们宣传我军的政策，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士兵前来询问。敌军官只好把周峰引进一间小屋里。

下午4点钟，谈判开始了。敌一七师参加谈判的有师长何进贤，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还有师参谋长刘启凡。师长何进贤首先开场：

“对不起，兄弟来晚了。不过我们同几个团长经过磋商，大家对这次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不知贵军意下如何？”

“你讲条件吧！”周峰庄重地说。

“条件嘛——”何进贤拉长了声音说：“我们的意见有三条。第一条，弟兄们的意见是到建水去缴枪……”

“这不行！我们首长的命令是就地缴枪。”

周峰没待何进贤把第一条意见说完，就坚决而干脆地打断他的话。

“兄弟们对这里的老百姓顾虑很大……”敌师长说：“我们来时拿着武器，他们还一路打我们，我们回去若是不带武器，他们是会给我们难堪的……”

“这个由我们负责。”周峰笑了笑，说，“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在放下武器，不再给反动派卖命，人民是会宽恕你们的。”

“是，是，是——”敌师长连连点头。“只要贵军提出保证，这一条是可以放弃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二条：不能把我们和家眷分开；要给我们牲口骑；要保障我们的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些是完全可以保障的。”周峰向他们说，“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不虐待，不杀害，不侮辱，不搜腰包，从宽处理，保障安全。这一切，你们军队里的不少官兵，恐怕早在数年前就有深刻的体会了。你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军长曹天戈，现在也享受到这种优待了。这一点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敌师长何进贤接着提出了第三个条件：“这回缴枪要算起义，不能叫投降。”

“不！”周峰严肃起来。“不能算起义，也可以不叫投降。按照过去的惯例，可以称为投诚。”

“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直沉默的两个敌副师长，突然站起来，瞪着眼睛说。“否则，我们宁愿战斗到最后—兵—卒！”

敌师参谋长也插话说：

“我们知道，你们来的人不多，连大炮、重机枪都没带。但是我们还有3000人，有大量的重武器。如果继续打下去，对贵军未必有利吧！”

“是的，你们现在是还有3000人。”周峰笑着说，“可是，诸位都是聪明人，最好还是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在战役之初，你们有6万多人。解放战争开始时，你们的人更多，有五、六百万，还有无数美式装备。最后的结果，我想诸位都清楚！”

“我们只讲今朝——今朝我们有力量突围！”其中一个敌副师长说。

“夸大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好处的。”周峰威严地扫视了他们一眼。“现在，我们部队和人民武装已云集在松山周围，你们想跑掉是不可能的，再退一步说，即使你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侥幸突围出去几个人，你们在这儿的家眷也带不走，失落在昆明的亲人更无法赶上来。那么，你们就会陷入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境，到那时候，你们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听到这几句话，敌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面面相觑。会场上—时格外寂静。

最后，还是敌师长先开口：“哦！好说，好说。请老兄先回去，容兄弟我们再考虑一下，明天……明天……明天答复贵军。”

“好吧！你们认真考虑一下，怎么做才能对你们的妻子儿女，对你们的3000名官兵，对你们自己今后的命运更有好处。”周峰意味深长他讲了最后几句话，离开了敌一七师司令部。

周峰向周学义和雷起云等人汇报了谈判经过，估计敌人可能还要耍花招，于是就把部队调整好，布置在松山阵地上，敌人不缴枪就发动进攻。

早饭后时间不久，情报科长来到我军阵地，恭恭敬敬地向周学义师长行了个军礼，说：“我们师座同意就地缴械——投诚。”

副师长吴效闵带领的两营部队，在追击中和师主力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在追赶敌人时发现，敌二十六军军部和八军流窜人员七、八百人，窜过墨江、澜沧江，正向中缅边界逃窜。

为了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残敌，干部战士们日夜兼程，继续向滇缅边界地区前进，连续九天共走了1400多里路。2月8日凌晨1时来到了南桥。

这里是敌八军和二十六军溃散官兵的汇合点。

3时整，部队赶到南桥城下。吴效闵副师长和一一四团政委赵培宪等研究后，决定先派一个侦察小组摸进城里，捕捉“舌头”，了解敌情；其余部队埋伏在城四围，随时准备进城，歼灭这一股溃散的敌军。

侦察小组很快就带着几十个俘虏回来了。原来侦察小组一枪未放就活捉了敌人的哨兵，让这个哨兵前面引路，悄悄地摸进了敌人的住房。就这样，敌人一个连当了我们的俘虏。

据俘虏们说，他们的一个将军带着七、八百名溃散官兵，聚集在城南龟山的几个院子里，准备坐飞机逃到台湾去。吴副师长和一一四团首长立即决定：二营主攻龟山，配合当地游击队歼灭残敌；一营集中力量，火速占领南桥飞机场。

我军摸到了一所长方形院子的门前，院门紧闭，院里西侧平房有鼾声。

副连长袁耀山低声命令周振忠，先带一个班跳到院子里去。但是，院墙上扎着不少的玻璃碎片，不好跳过去。不知是准扔进一枚手榴弹。

“赶快炸大门！”袁耀山大声喊。

轰的一声，院门被炸开了。勇士们乘着烟雾冲了进去。

100多个惊慌失措的敌人急忙投降，而另有一群敌人从后门逃跑了。

“追！决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吴副师长和一一四团政委都来了，他们命令留一个排看管俘虏，搜查院子，其余的人都去搜山。

天亮时，搜山的战士和游击队员陆续回来，带回了一群俘虏同时，在院里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那天中午，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敌二十六军二七八团流窜的一个营来了个“送货上门”。这股敌人从城东过来时，巧遇我一一四团团部在河边挑水的炊事员老刘。

“你们的长官呢！”一个敌军官大模大洋地问老刘，“我们是二七八团的，来这里会合，过了春节就坐飞机去台湾，你们怎么也不派人来接洽一下？”

老刘一看是敌人，就随机应变地对敌人说：“长官，饭菜都准备好了，你们来了多少人？”

“500多。”

“好，长官，请弟兄们先在这里休息片刻，我回去报告长官来迎接。”

老刘挑起水桶就走，一直走到山洼里，把水桶往地上一丢，三步并作两步就跑上了楼。这时，一一四团政委赵培宪正审问俘虏。赵培宪听完老刘的报告，急忙走到窗口一望，只见敌人有的躺在小河边，有的正往城里走，有几个已经朝山上走来。时间紧迫，赵培宪只好命令哨兵鸣枪通报，他自己也顺手抄起一挺轻机枪打了一梭子。

正在休息的战士们一听到枪声都立即行动起来。吴效闵命令一个连从右边压过去，另一个连从左边压过去，其余的部队在山头上抢占有利地形，向这股敌人猛烈开火，迫使这股残敌放下了武器。

这天正是旧历年的大年初一，我军连续征战48昼夜的滇南追歼战，以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覆灭而告结束。

十三、波诡云谲天府国

张群的心中很不平衡：我们竟让刘伯承、邓小平的雕虫小技蒙在了鼓里。蒋介石大骂李德邻。重庆市郊炮声隆隆，蒋介石在“中美号”专机里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三声枪响刺破军校夜空。刺杀蒋介石的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蒋介石批示：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韩司令在无尽的悲哀中死去！

胡宗南心冷如冰。刘、邓下达“成都围歼战”命令，各路大军迅速收紧“布袋口子”。

1949年11月29日，夜，重庆林园。

解放军的炮声在重庆市郊隆隆轰响。

“爹爹，快走，局势万分危急！”蒋经国从外面急急地走进来，再次催促蒋介石。

“不，不！我要亲自听到炸毁山城的炮声！”

蒋介石的话音刚一落，只听窗外“轰！轰！”两声巨响。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起，电灯熄灭，整个山城顿时一片黑暗。

当蒋介石全神贯注听着这爆炸轰鸣继续下去的时候，爆炸声突然停止了。

“怎么回事？娘希匹的，”蒋介石在黑暗中大骂，“毛人凤搞的啥名堂？经国！……”

“嘀铃铃——”一阵电话铃声。他一把抓过话筒，里面立时传出毛人凤胆怯的声音：“总裁……总裁……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炸毁重庆的方案受阻。原定炸毁的17个单位、520多处目标，只炸毁了四个兵工厂和刘家台炸药库……”

“饭桶！……”蒋介石正大骂，忽然电话筒里送过来一句话，“总裁！共军精锐小部队正向总裁方向穿插过来！”

蒋介石丢掉话筒，喝令侍卫长陈希曾：“快，去白市驿机场！”

蒋介石一行驱车向白市驿方向而去，但情况已经不好了！

整个重庆市已经秩序大乱。路上，人挤车，车挤人，到处都是四处逃奔的人群。

车子行得象蜗牛爬，蒋介石一行被迫下了汽车，跌跌撞撞向机场奔去。

好不容易来到机场，蒋介石钻进了“中美号”专机。尽管白市驿机场戒备森严，蒋介石一整夜未敢下飞机一步。通过飞机上的无线电装置，同成都方面取得了联系。

天色微明，“中美号”专机升空而起。从机舱中望下去，长江、嘉陵江如带。解放军的大炮已开始向白市驿机场轰击……

9个月之前告别了六朝古都南京，不久又告别了溪口、广州，现在又将告别重庆，此时坐在飞机上的蒋介石百感交集。

在半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对重庆充满“希望”，把重庆作为割据西南的“堡垒”和国民党军队“西南防线”的护卫中心。

11月14日，蒋介石“御驾亲征”，偕顾祝同、蒋经国，来重庆进行督战。

蒋介石下榻林园，还没沐浴，便请张群汇报情况。

张群扼要介绍了当前情况，最后检讨说：“刘伯承、邓小平耍滑头，我们竟被蒙在鼓里。现在，他们不仅攻破了西南防线，而且川陕几十万国军南退的道路也被切断，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见蒋介石面有温色，张群马上改口道：“当然，总裁把西南大局的责任重托于我，造成这样的后果，我有愧于总裁的信任。请求总裁处分我，哪怕是砍脑壳，我也毫无怨言。”

“算了，算了，”蒋介石摆摆手，“岳军兄，你对党国忠心耿耿，我是知道的。要说这个责任嘛！”蒋介石的声音变了调，“当初，他以为总统是好当的，结果呢？终于晓得锅是铁打的。更可恶的是，他招呼也不打一声，不辞而别，把这个摊子随便扔下不管，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系为个人利益打算！”

由于重庆地理位置优越，蒋介石事先没有在这里以固定兵力设防。当解放军渐渐逼近重庆时，蒋介石手忙脚乱，赶紧急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一线防线，部队南撤，保存实力。抽调第一军到重庆、江津一线布防，加强重庆防御；命令第十五兵团速抵綦江、南川一线布防，迟滞解放军西进；并令十五兵团之一部抵黔北隘口娄山关布防，阻止解放军北上；令第十六兵团等部沿大竹、广安西移，加强川中防务。蒋介石的企图是：将川境之国民党军向川内及滇、康退却，尽量保存实力，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反攻。

正当蒋介石布防重庆的同时，我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及兄弟野战军部分部队，正按照预定方针，从四面八方方向重庆包围而来。

二野第五兵团主力和第十军，由贵阳、遵义分两路向川南快速迂回，迅速控制了宜宾、泸州、自贡等川南广大地域，截断了川境国民党军南逃的道路。

与此同时，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迅速从川东向南川和重庆方向进击。

到11月24日，按照刘、邓部署的作战方针，我军已将宋希濂集团主力 and 罗广文兵团主力，分割包围于南川以北地区，经数日激战，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的綦江、涪陵、江津等地。蒋介石在川东南的防御被彻底粉碎，重庆已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下。

宋希濂十兵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主力被歼后，重庆外围只有胡宗南集团之第一军和罗广文兵团残部在重庆外围抵抗。

11月26日，刘、邓首长给已进抵重庆附近的三兵团发去指示，要求速歼长江南岸之敌，乘势夺取重庆。命十二军速向綦江地区进击，而后直趋顺江场，准备渡江，夺取重庆。令十一军和四野四十七军速协同捕歼由冷水场、龙潭场向重庆、木洞撤退之罗广文兵团残部，尔后十一军以一部守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渔洞溪，准备渡江，协同十二军解放重庆。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的会合处。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退到这里建都。广州解放以后，蒋介石又把他的政府搬到了重庆。

为了保护重庆城市的工业、交通、市政设施不受重大破坏，刘、邓首长要求部队必须争取时间，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和歼灭。

敌军罗广文兵团残部从我军渡过乌江以来，一直在我追歼之下，已是惊弓之鸟。新调来的胡宗南之第一军，此时尚未遭受我军重大打击，建制完整，有一些战斗力，但敌人已进入最后灭亡的边缘，因此也是士无斗志，不堪一

击。

到 29 日，第三兵团各军已控制了重庆以南 100 多里的长江南岸地区，并做好了北渡长江的准备。

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知道守重庆无望，只得乘机而去。

蒋介石逃离重庆后，胡宗南的第一军也纷纷撤退，逃渝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竞相逃命。

我军于当日夜和次日相继渡江。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驻守重庆之敌即全面瓦解。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

在一个月以后的 1950 元旦献词中，刘伯承司令员说：“从 11 月 30 日起，重庆永远成为人民的重庆，而我们人民大众就成了主人翁了。1949 年 11 月 30 日这一天，就重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2 月 1 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3 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二野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主任，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副主任。

在这值得欢庆的时刻，第三兵团的广大指战员还清楚地记得，早在 1948 年 4 月 28 日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的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豪情满怀地演讲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陪都重庆、首都南京……”

这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一年零七个月，蒋介石的“三都”已被解放军打下。

11 月 30 日上午，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降落在成都新津机场。

这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军用飞机场，离成都约 70 华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击日军，打破陆路封锁，蒋介石动用几十万民工，费时经年，与美国人合建而成。机场南从流县，北至新津五津镇，沿牧马山下一字展开，设备相当齐全，可容各式重型轰炸机起落。成都还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凤凰山机场，虽然距成都远比新津机场要近，但设备等其它条件差于新津机场。所以，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来成都一直均在这里降落。

此日，“中美号”专机一降落，先于蒋到达成都的阎锡山、张群、顾祝同及胡宗南、王陵基、刘文辉等要员，立马向尚未停稳的飞机小跑而去。

但蒋介石并没有径直走向欢迎他的大员们，而是向机翼下面走去。蒋介石看见，“飞机左翼靠近机身处，前后相距约 30 厘米处

有两个子弹击中的窟窿。

蒋介石扭过身，不打招呼，钻进小车，疾速往成都城内驰去。

“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晋·左思）

成都，地处天府之国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会，也是四川仅次于重庆的大城市，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历史悠久、风光旖旎，在汉代，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成都记》载：后蜀国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墙上遍种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成都故有“蓉城”称谓；唐代，更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这里，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特别是蜀绣最为有名，因而又有“锦城”之美称。

岁月沧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成都成为国共两党在大西南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半个小时后，蒋介石一行驱车进入成都市区。今日成都，一去昔日繁华热闹。大街上行人寥寥，路边小店大多是将军把门，甚至有的小店将贬了值的大额金圆券用线串起来，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门之外，风吹过沙沙作响，象上坟的招魂幡。街上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还有一串十轮大卡车，卷起漫天的尘土，车上站满头戴钢盔，手持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士兵。

大街上处处是一种行将末日的凄凉景象。

蒋介石闭上眼睛，想起了四年前在重庆的一次巡街之行。

那时，抗战刚刚胜利，他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代表，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车上，接受重庆近百万人的欢迎。事前，侍卫官们出于安全考虑，无论如何要他坐上防弹车出行，但他听了陶希圣等人的话：“陪都百万市民莫不渴望瞻仰领袖丰采”，便毫无顾忌地坐上敞篷车与广大民众见面。

巡行的路线是：从军事委员会出发，经南区公园，两路口，中二路、中一路、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林森路，沿陪都最热闹的道路巡行一周。

侍卫官们坐在三辆小车上开道。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军服，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站在车上威风凛凛。他一手扶着挡风玻璃，一手不停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虽然车子经过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而且他的前后左右都有卫队护卫，但欢迎的人太多，车队只能慢慢地向前开。老百姓们不停地向他欢呼：“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万岁！”

而今天，重庆怕是此生难回，这次到成都，也只能偷偷摸摸进城。

“委座，到了，请下车！”侍卫官说完，赶紧下车，拉开车门。

蒋介石下榻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这是蒋介石每次来成都都必住的地方。住在这里，容易使他想起在黄埔的那些峥嵘岁月。

成都中央军校，也简称成都军校。坐北朝南，占地300亩，学生最多时曾达万人。校内规模宏大，有可容一师部队进行分列式的大操场。校内有武担山，平地兀起，是全校的制高点。在山脚幽篁翠柏簇拥中，有幢别致的三层法式小楼，取名“黄埔楼”，这是蒋介石的下榻处。

蒋介石来到成都的当日下午，即在黄埔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成都的防守问题。

黄埔楼，装饰得豪华气派。会客室里，有富丽堂皇的沙发、地毯，并配备有供暖设备。

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望着仅剩的几员大将：张群、顾祝同、阎锡山、胡宗南以及王陵基、刘文辉等，他多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拿出令人高兴的打算来。

这些大员，尽管心里都在想，但不管想什么，就是没人有勇气先打破沉默。会场沉默良久，作为现在主持西南军事的最高长官，在这种场合，继续沉默下去对他是很不利的。

“我以为，”胡宗南面露难色，不敢直视蒋介石，说道，“成都地处盆地腹心，无险可守。面临共军南北夹击之毒招，窃以为，应保存最后之有生力量，放弃成都，将主力退往西康省境内，依据那里险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对赶进的共军作叠次打击。以西昌为据点，同共军周旋，实在不得已时，全军经云南退到缅甸境内。”这是胡宗南早有的腹案，在重庆被攻破前，就

和宋希濂一起，向蒋介石面陈过，被蒋介石否决，今天在会议上又提了出来。

其他人并不知个中奥妙，认为是胡深思熟虑之所见，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墨三！”蒋介石转而向顾祝同问道，“你的意见呢？”

脸窄窄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此时已失去当年发动“皖南事变”时傲慢之气，当然，他知道蒋介石为什么此时点他的卯，也清楚蒋介石不希望他说些什么。他看了看脑袋低垂的胡宗南，又仰望了一下满脸怒气的蒋介石，不紧不慢地说道：

“宗南兄的见解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对阵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实力！就西南说来，虽然重庆已破，但我们比共军还占有军事实力的优势。胡（宗南）长官的30万精锐之师；郭汝槐的二十二兵团那三个军，可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加上王（陵基）主席的地方部队。就有50万大军。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空军、海军和刘文辉将军的二十四、邓锡侯将军的九十五军。在这“川西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士气不可泄！不能后退！而应精诚团结，服从委员长指挥，组织好川西决战，给来犯之共军以迎头痛击！”

顾祝同把蒋介石想说的话，表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脸渐渐开朗，一面听，一面不住地点头。未了，他接着顾祝同的话，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道：

“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可不必再言撤退西康，以免动摇军心。”

蒋介石开始点将：

“顾祝同将军，命你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胡宗南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全面主持西南军事。”

“刘文辉将军，命你在十天之内，在西康组织十万民军，与二四军一同开赴成都，参加决战，不得有误！”

“是！”刘文辉口不应心地答道。

“杨森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在十天之内组织20万民军参加决战。”

“成立川西决战指挥部，由胡宗南将军任总指挥，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为副总指挥。五位总指挥合署在北较场指挥部办公，统一指挥川西决战！”

“是！是！是……”

在蒋介石逃到成都的第二天，即通知刘文辉，要到他府上拜访。

半个小时后，大批警卫人员，从军校到刘文辉公馆的客厅门口，全部封锁，戒备森严。

12月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再登刘公馆，进一步征求“川西决战”的意见。

蒋介石到成都的三天内，接二连三召开军事会议，频频召见军政大员，而且在刘文辉等川军诸将的身上更用了不少心思。

当日夜，晚饭以后，疲惫至极的蒋介石拒绝一切来访，闭门入睡。

“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响刺破寂静的夜空，子弹从黄埔楼顶飞越而过。蒋介石被枪声惊醒。

楼上、楼下随即响起嘈杂的脚步声。

“爹爹，你没事吧？”门外传来儿子的声音，蒋扭亮了电灯。

“怎么回事？”蒋介石问道。

“已派人去查。”蒋经国安慰道，“爹爹放心，没事，可能是有人枪走了火。”

蒋介石松了口气：“怪事情！怪事情！军校连连发生怪事情，要追查到底，哎！”

正说间，成都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蒋介石侍卫室主任陈希曾进来报告，说是一位叫张大明的执勤士兵，在武担山上执勤，抱着枪睡着了，糊里糊涂地使枪走了火……

“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摆摆手，“军校里一定有可疑分子。我第一次在军校阅兵，炮车轮胎瘪了气。我第二次阅兵，旗绳断了。我前天刚回来，又有人走了火！”蒋介石越说越气，盯着张耀明：“要彻底追查，据实禀报，哎？”

张耀明岂敢怠慢，立即对张大明进行夜间审讯。张大明虽被打得皮开肉绽，仍高喊冤枉。

张耀明如果这次从张大明身上问不出个把死罪来，他这个校长不当事小，恐怕气急了蒋介石会拿他开刀试问。张大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终于供出了一个“共党分子”。

这个人叫王北池，原是北大学生，后来投笔从戎，考入成都中央军校第27期。张大明说，此人经常私下偷看进步书籍；还爱作诗，诗中有反战情绪。说着，张大明还背了几首作证。

“还有别的人没有？”

“没有了。”

当日夜，张大明、王北池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埋在成都南郊乱坟岗里。

军校内突发的枪声，让蒋氏父子虚惊一场。而军校外待发的炮弹，可是有意者的精心安排。这几炮打出去，蒋氏父子上西天无疑。

成都中央军校院墙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上，散布着几个低矮的窝棚。窝棚距校内的黄埔楼仅有200多米，从窝棚里看黄埔楼，连楼里的人走动都一清二楚。

蒋介石到成都后，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选择了这处暗杀场所。

最先来到窝棚进行观察的是年方20岁的姜永胜，来自大巴山，烈士遗孤。他原是华莹山游击队的一个小队长，有作战技能和经验，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这里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炮打蒋介石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一位叫唐明昌，30多岁，是三人小组的组长。

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叫姜期定，原是刘湘部的一个炮兵排长，后来投向解放军，打迫击炮有百发百中的本领。

蒋介石此次来成都不象以前只住中央军校的黄埔楼，而是行踪不定，住在励志社的时间更多。而且，住黄埔楼对，三层楼房的灯，亮时一起亮，灭时一起灭。

三人战斗小组作了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准备。他们把迫击炮事前已偷偷运到了窝棚先行掩埋起来。计划在等唐文昌向组织上汇报请示之后，让中央军校里的内线，查清蒋介石居住的房间，即进行行动。

但就在三人战斗小组进行观察、计划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窗前伫立观望，无意中发现窗外菜地的窝棚里有人影晃动，引起怀疑，立刻命毛人凤派出一支精干队伍，对窝棚进行搜捕。

当晚蒋介石又住到励志社。毛人凤则率领由数辆摩托车、警车、囚车组成的突袭队伍，包围了菜地和窝棚。

姜永胜守在窝棚，当场被抓，迫击炮从地里挖出。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之后，留下暗哨，在四周设下埋伏。结果第二天晚上，姜期定、唐明昌又按约先后来到窝棚。姜期定被围捕，机

警的唐明昌未落入敌人圈套脱险。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姜期定后，对他们进行秘密审讯，要他们供出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和这次谋杀的组织者。

敌人对姜永胜百般拷打，用尽酷刑，姜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姜期定招供。在毛人凤的审讯亲笔记录有了这样的字样：“……指挥谋杀委员长的人名叫韩子重，他是中共川康军事小组组长……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伍民的大儿子。早在1939年，韩子重就加入了匪党，潜往匪区受训。年前潜回四川，利用父亲作庇护，暗中进行活动……”

1939年，韩子重17岁，是一个有救国救民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出了他去延安的原因：

父亲大人：

……首先我向你赤裸裸地说明我走的原因……事实就是这样，中国社会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统治者对千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和屠杀。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那里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的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时任国民党旅长的韩伍民，从邮局接到儿子的信，不禁热泪盈眶。

韩伍民本是一介书生。1923年，他在杭州纺织专科学校毕业，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在杭州办了个染织厂，梦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希望很快破灭。他决心弃商习武，走军事救国的道路，赴日本陆军大学骑兵科学习。

他毕业后回到四川，虽然当上了旅长，但对国家日衰倍感忧虑，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因此，儿子韩子重回成都从事地下斗争，他虽然未公开表示支持，但内心是不反对的。

韩子重离家以后，先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去到延安。因为缺乏干部，他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一带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成都解放前夕，他又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潜回成都，住在家里，并说服时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处长的父亲，将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等安插在他的部队里。

那天晚上唐明昌和姜期定从窝棚观察回来后，唐在平安桥茶馆向韩子重汇报了情况。唐认为蒋介石可能有所察觉，建议将迫击炮撤走。韩子重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因为他得到了内线的情报，这几日蒋介石确实住在黄埔楼。至于晚上所有的灯开着，这是蒋介石布下的疑阵。只要弄清蒋介石住哪间屋里，取他的性命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因此，他命令唐明昌当晚去姜永胜住的窝棚传达：按计划进行。先稍安勿动，作好准备，一旦内线传出

蒋介石住房的确切情报后，立刻炮击。

当日晚，他与唐分手后，去中共成都临时地下工作委员会汇报。但“临工委”要他立刻将迫击炮从窝棚内撤出。

从“临工委”出来，他又到成都南大桥边的“饮涛楼”会见事先约好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钱毓军。钱家住新津县，离新津机场不远。韩子重向他指示：据内线通报，最近蒋介石要把守卫机场的郭汝槐的一个师调走，让胡宗南的二十七军接替。趁两军换防之际，组织决定把大邑县游击纵队善打夜袭的“猛虎队”拉出来，突袭

新津机场。并命钱毓军火速回到大邑县大飞水原始森林内去找游击纵队司令周耀文，再进行具体筹划。

约见完钱毓军，韩子重又用秘密联络手段，约姜期定第二天上午12时在春熙路“可园”茶馆见面。

结果，第二天中午，毛人凤派一帮特务，跟在叛徒姜期定身后，在韩、姜二人会面时将韩子重逮捕，关进成都娘娘庙监狱。

韩子重被捕后，其父韩伍民立即将韩子重安插在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接到他的家里隐藏起来，后被韩伍民的司机李山出卖，趁韩伍民不在家时，李将三人骗出交给了毛人凤。

韩伍民受蒋逼迫，曾到娘娘庙监狱对儿子劝降，遭到韩子重的拒绝。此后，蒋派人给韩伍民送去飞机票，要他立即携家眷飞往台湾，韩伍民迟迟不动身。蒋顿起杀心，但在最后核定死亡执行书时，又将韩伍民用红笔勾出，批曰：“不枪毙。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韩司令在无尽的悲哀中死去！”

1949年10月9日凌晨，韩子重被杀害于凤凰山，时年27岁。

重庆解放之前，刘伯承的眼光已盯住了残敌猬集的成都。

根据蒋介石、胡宗南的企图和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刘、邓认为胡部在成都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一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此时，经宜宾退往云南的道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只有以西昌退云南一条道路。为不使其敌军逃往云南和国外，将其聚歼于四川境内，刘伯承决心以各路大军的现态势迅速前出，以一部迅速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切断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军的退路。据此，12月6

日，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名义，对二野所属三、五兵团部队及五十军，发布了《成都平原围歼战》的指示：

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

1. 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至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乐山、井研、荣昌地区继续前进，望杜（义德）王（近山）即与尹（先炳）吴（实）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荣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

2. 十八军为十六军的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至五天即向犍为前进。

3. 陈谢（三兵团）准此将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与十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四十七军控制邻水、广安。

4. 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收容站。

5. 已令五十军于12月10日集结垫江待命。

第三、第五兵团部队，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日夜兼程西进。

在我解放重庆的同时，第五兵团主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经贵州迂回四川，12月3日，进抵川南之纳溪、泸州等地，在截断了胡宗南及川境线敌人退往贵州的道路后就地待命。

三兵团主力十一军，按照野司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在潼南进行了短暂的集中，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刘、邓首长的指示，总结了进军以来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分析和研究了胡宗南集团的情况，认为：解放战争以来，胡宗南虽在和解放军作战中连连吃败仗。但此刻，蒋介石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胡宗南。胡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装备也比较精良，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极端顽固，是一个靠和共产党打内战起家的反共专家，在国民党行将灭亡之时，他必同我军作“困兽之斗”，广大指战员必须作好和胡宗南军队在成都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

十三军党委制定了作战方案：三十二师以两个团留重庆守备，以副师长徐学忠带九十四团沿嘉陵江北上，直取南充后继续西进，保障我主力西进侧翼；以三十一师经乐至、简阳，三十三师沿成渝公路，向成都以南、江津西南地区进击。第一步先切断敌人的退路，而后，协同友邻部队会歼胡宗南集团。

为了加速进军速度，十三军党委还决定，除强调部队仍轻装前进外，还将在重庆外围缴获的汽车和国民党在重庆的“西南”和“西北”两大汽车公司的汽车，征调分配到各师、团，乘车前进。

12月9日，三十二师九十四团，在副师长徐学忠率领下，以二营为前卫，进至南充市附近。然后，我军伪装成敌人，先解决了南充市外围的小股敌人。晚上，以同样的计谋，乘夜突入南充市，迫使敌1000余人投降，解放了川北重镇南充。

10日，三十三师九十九团、九十七团在青岗坝将向成都西逃的敌杨森部一三四师全部歼灭。15日，按照计划挥师西进，两日后到达简阳。

此时，敌十八兵团李振部在张液以东山区布防，阻我西进。我即决定留九十四团伪装成主力，迷惑敌人，牵制该敌；主力从简阳经老君场、籍田铺向成都以南新津以西地区前进。19日，渡过岷江，一部占领成都通向彭山、西昌公路，并以一部向新津、邛崃公路之太平场进击。

同时，三兵团十二军也向崇庆、大邑前进。21日，占领邛崃、大邑两县城。十一军进入新津、双流以西地区，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

隆冬的蓉城，已没有了馥郁的花香。

作为多年的对手，胡宗南对解放军的利害，已是屡有体会。以目前之处境，大军只有赶紧退至西康，方有一线生机；若是“打肿脸充胖子”进行“川西决战”，同乘胜而来的百万解放军精锐之师硬打，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为此，他曾几次公开和不公开地在蒋介石面前死谏，请他迅速兵退西康。对胡宗南的意见，老蒋不仅听不下去，反而拍桌子骂他“娘希匹！”实在无奈时，胡宗南又请蒋经国去说服“老头子”，可回答是：等个三、五

天再说。三、五天并不长，可它对共产党来说，可以于的事情太多了。说不定三、五天后，他、胡宗南，还有在做着“美梦”的老头子，已让人家共产党瓮中捉鳖了。想到向西康撤退，就想起了曾和他一起，在“老头子”面前死谏此筹的宋希濂，他已被共军活捉，如果“老头子”听了他们的，何以会至于此？

这时，他想到了他可爱的“小猫咪”机要秘书林娜小姐。

林娜，大学毕业，长得很美，精通英语，24岁。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一概拒绝了。因为她爱着她的长官胡宗南。虽然胡宗南比她大20岁，黑黑胖胖。她知道，长官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要娶她为夫人是不可能的。但长官需要她，这就够了。

胡宗南赶忙给林娜的卧室打了个电话。

顷刻，高跟皮鞋声即在走廊里响起，胡宗南卧室的门开了。

胡宗南看着林娜，心中顿时感到好受了许多。

他吁出一口闷气，非常伤感地说：“……仗是没法打了。我这一生，无愧于校长，无愧于党国。也许，我将战死在这里……”

十四、血色芙蓉

“不战而屈人之兵”。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四项忠告。

“多宝道人”决心已定。“水晶猴”直言不讳：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王陵基打了个呵欠，突然命令司机：车往回开！

周恩来回电：不宜过早行动。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陈希曾一挥手，毛人凤满脸杀气一闪而出。蒋介石连说：“误会，误会！”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就在第二野战军各路大军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同胡宗南兵刃相见时，另一战略的运用，也同时在秘密进行着。

早在11月21日，我军南线部队关闭了胡宗南逃跑的大小门户之后，遵照毛泽东日前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召告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四项忠告说：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以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歼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招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持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军官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可以随时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务、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误，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作无所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

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这一忠告的发出，极大地震撼和推动了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从速抉择，同时，我党在西南的地下工作者，积极策动、协助愿意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使在解放战争后期波诡云谲的天府之国，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活剧。

成都玉沙街，刘公馆。

天近黄昏，刘公馆也已掌灯。

西康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三星上将刘文辉，正躺在他公馆里宽大舒适的牙床上抽大烟。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暖房。幽微的灯光下，可见壁上挂有名人字画。特别宝贵的是一幅张大千画的长轴《川康风情图》；那是大千先生深入康定采访写生后画的一幅精品，为感激刘文辉的照顾和帮助，大千先生离开康定时送给他的。

刘文辉 50 来岁，瘦高，两颊松弛。看他的像貌，很难使人相信，在三十年代曾是四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擅长纵横捭阖之术，因此获“多宝道人”之称。在同蒋介石长期的周旋中，他呼风唤雨，使蒋介石也奈何他不得，不得不常常让他三分，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

三十年代，四川诸多派系被他玩于股掌之间。他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多，地盘不断扩大，终于凭实力当上了四川省主席。为统一四川，问鼎中原，他不顾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打垮了田颂尧，收拾了邓锡侯。之后他不惜亲情，同亲侄刘湘开战。但谁知不是侄儿的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只得逃到了地瘠人贫的西康。他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广种鸦片，发了大财。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他的防地。黄炎培曾去西康一游。归途中愤然赋诗道：“我行郊甸，我过村店，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因鸦片大发其财的刘文辉，养了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让他任西康省主席之职。

西康太远，蒋介石鞭长莫及，虽然刘文辉长有反骨，但对蒋政权并无威胁。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找到了收拾刘文辉的机会。但刘文辉心里明镜一般，让他打日本，是蒋借刀杀人之计。他不象还有民族正义感的侄子刘湘，不管蒋介石千方万法，他也不挪窝出西康。结果是：刘湘惨死，他还盘踞在西康。知情人人都清楚，刘湘是蒋害死的。刘文辉是知情人……

刘湘和蒋介石结怨，始于三十年代初那场“叔侄斗”。

那次“叔侄斗”，是四川军阀史上最残烈，最惊心动魄的军阀大战。蒋介石是刘湘的支持者，帮助刘湘打败了“么爹”，登上了“四川王”的宝座。但此后刘湘不买蒋介石的帐，不卖命帮“中央”打共产党，不让蒋介石染指四川。不仅如此，为了抵制“中央”的压迫，1936年，刘湘搞了个“川、桂、红”计划，联络广西李宗仁和延安的红军公开反蒋，并托中共地下党员王于清给延安送去 30 万大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到 40 岁的“四川王”刘湘，主动请缨出川抗日。蒋欣然应允，立即授予刘湘“抗日救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命刘湘率十万川军驻苏、皖两省。同年秋，日军占上海攻南京。蒋介石命刘湘

率部与日军血战于雨花台。刘湘杀敌心切，川军骁勇，但这支穿着稻草鞋，拿着“老土造”的队伍，终究敌不过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此一役，十万川军伤亡殆尽，刘湘看着弟兄们的尸体，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刘湘知道上了当，便领着几个高参、谋士愤然离开南京。到武汉后，刘湘潜入英租界协和医院，欲回川重整旗鼓。刘湘出走南京后，蒋介石到处派人侦探，得知刘湘消息后，蒋通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刘湘传话，要任刘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条件只有一个，刘不回四川。刘湘回绝。

刘湘为达到回川之目的，放风蒙骗蒋介石，说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暗中叫谋士张斯用五万美金买通协和医院英国人医生毕拉克，让其注入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但此秘计被当时刘湘手下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缙绪得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蒋派人给毕拉克送去十万英镑。五万元美金买的是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十万英镑买的是一种叫做金粉砒酸的无色无味无反应的毒药。毕拉克把这两种药同时注入刘湘的胳膊里，刘湘便长睡不醒了。

刘湘死后，蒋介石亲自为这位抗日将领签署命令，追任刘湘为一级上将，任刘湘之子刘济英陆军中将；并命国家各重要机关隆重祭奠，又从国库中拨款一亿元，在成都武侯祠内举行隆重国葬。

淮海战役之后，“中央军”惨败，蒋介石开始崩溃，也更加看重西南这块退避之地。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电促刘文辉飞赴南京“共商国是”。

刘文辉到了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直接了当的对他说：

“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也是中央赖以反共的基地。中央准备最近迁都四川，在那里同中共决战。中央要借重自乾先生

未雨绸缪，蒋介石先撤了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给了王陵基，接着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刘文辉从西康来成都后，蒋又在刘公馆的对门住了一连宪兵，四周布满便衣，甚至还想给刘家派佣人。

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主席！”侍卫官在门外一声轻叫；打断了刘文辉的思绪。

“啥子事？”他躺在牙床上大声喝问。

“王陵基求见。”

“啥子——？”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他一听王陵基的名子就气，对王陵基是恨透了。

在三十年代初，刘家叔侄大动干戈，双方厉兵秣马。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

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

刘文辉愤愤地说：“不见！”但听着侍卫官的脚步声渐远时，又大声唤道：“慢！请王主席在客厅看茶，我马上来。”王陵基是蒋介石当年的红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能意气用事。

王陵基是衔蒋介石之命而来。

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毕业，又非“浙江同”，但深得蒋的信任。在“川西决战”，建立反共复国基地大业之时，蒋介石把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调来四川，委以省主席职务重任。

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万石，借粮900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持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9日，他下令让军警开枪镇压“要民主，要自由，争温饱”的游行学生队伍，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九惨案”……

蒋介石自来川之后，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此来是传达蒋旨意，通知刘文辉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联合办公”。

刘文辉推托道：“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座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说到这里，刘文辉起身送客。

王陵基从刘公馆出来，又去见邓锡侯。

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正在等待王陵基的到来，因为他刚才接到王陵基打来的电话。

邓锡侯同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比刘文辉年长七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在定陶战役中被解放军击败，被撤职。1948年任徐州“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守西南，又委任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

邓的公馆“康庄”同古色古香的刘公馆大相径庭，西味颇浓。公馆门口虽也是老格式：红漆大门，双狮把守；但一进门，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楼却是一幢很考究的两层楼的洋房。邓中等身材，面皮白皙，爱穿西服打领带。这会儿，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装，坐在中西合璧客厅的沙发上，品着盖碗茶，眯着眼听京戏。

刘湘被蒋介石害死后，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坐镇四川，就让邓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抗战期间，他率子弟兵出川在山西抗击日军时，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

1948年3月20日，蒋介石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四川，向邓提出急调十万石粮食出川，被邓问绝：“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现在，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还有啥子粮食可以调出去嘛？”

同年3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

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国引起轩然大波。邓的副手，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个，要夺权，枪杆子上来取！”话一放出，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饬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曰：“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

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年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

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坐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在绝望之余，两次向张澜问计。

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的是抓牢枪杆

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

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10月29日，邓同刘文辉、熊克武向在重庆的代总统李宗仁再提要求撤换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李宗仁苦笑道：

“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

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倒拐”在四川话里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

“主任，”副官的突然一声报告，打断了邓的思绪。“王主席的车到了门外。”

“让他进来！”邓锡侯“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王陵基见邓锡侯，带着和找刘文辉相同的使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三言两语一过，邓就站起来，把手一挥，说道：“今天就这个样子。送客！”

从“康庄”出来，王陵基丝毫不感气恼，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终于不辱使命，摸到了“多宝道人”和“水晶猴”的底。他相信委员长不会放过他们，而这一点他和委员长是相通的。

“主席，开哪里？”王陵基上车坐定，司机小声道。

“去潘文华宫邸。”王陵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潘文华，原是“四川王”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潘掌握了刘部骨干队伍二十一军。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先后封他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七师长进行倒王缙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会。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蒙骗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猷——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四川省银行投资200万元，潘昌猷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蒋为了营造西南，让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布，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二三五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1948年7月16日，驻守襄樊的康泽兵败被俘，蒋介石指罪潘文华援助不力，又抹去了他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之职。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人物，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职务，还得让他所有。

小车快到潘公馆时，王陵基大烟瘾发作，他一看表，已经11点了！于是命令司机：

“不去潘公馆了，车往回开！”

可能是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

在张群于12月2日找他们面谈时，三人均婉言拒绝。

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四川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话里软中带硬，可谓说到家了。

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

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

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

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

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

事后，胡克林通过刘文辉的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刘文辉送走邓锡侯、潘文华，又和胡克林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细节，向胡克林了解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突然听见侍卫官在卧室门外报告：“主席！”

“啥子事？喊个啥子！”刘文辉道。

“报告主席，事关重大，不能不惊动你。刚才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请你今晚赴宴。”

“说啥子？赴宴？”刘文辉生怕听错了，又问道，“啥时候？啥地点？”

“晚上7点钟。中央军校小宴会厅。”

“晓得了。”刘文辉哼了一声。

刘文辉一种不祥之兆顿生心头。他立刻拨通了邓锡侯的电话，刚到家的邓也得到同样的通知。

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

蒋介石此时设宴，怕凶多吉少。

刘文辉思来想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则更会让蒋抓住口实，公馆对面的宪兵连会即时冲进公馆解决他的性命。

最后他给邓锡侯去了个电话，认为眼前只有去的一路，巧与周旋，躲过此关再说，至于祸福生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下午7时左右，刘文辉按约而行。他一进军校，立即感到一股杀气。身穿黄军呢的中央警卫团代替了往日军校学生警卫队。个个执美式卡宾枪、冲锋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大门口一直排到小宴会厅周围，如临大敌一般。

刘文辉的车刚停稳，邓锡侯的车也到了。二人下了车，便朝张挂着鲜红宫灯的宴会厅走去。

听到门外传令兵报告，西装革履的蒋经国笑容可掬地出外迎接。他引着刘文辉和邓锡侯穿过门口的黑漆屏风，走进一间布置相当考究的宴会厅里边的小餐厅。

在小餐厅里一张式样考究的椭圆形餐桌旁边，蒋介石和张群二人已经落座。看见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进来，张群急忙站起打招呼：

呼：

“啊！自乾兄、晋康兄，请入座，委员长已经等你们一会儿了。”

蒋介石穿一身蓝缎长袍马褂，矜持地抬抬身，挥着手说：“入席吧。咱们边吃边谈。”

蒋介石特意嘱咐刘文辉、邓锡侯坐在他的左右两边。蒋经国、张群坐定，蒋介石首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邹鲢鱼”。

刘文辉诚惶诚恐，以惶惑的眼光望了望张群。张群立刻会意，笑着说道：

“请举筷！今天委员长是专请二位先生的。”

“是啊！自入川以来，因忙于国事无暇招待二位。”蒋介石接过张群的话，微露笑容，说道，“今天特意请岳军、经国作陪，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个意思。都是自己人，随便吃随便谈。”

大家刚伸了几下筷子，张群便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自乾兄，给西康的电报发了没有？”

“岳军兄，啥子电报？”刘文辉明知故问。

“咂，咋搞忘了？调兵的电报嘛，委员长上午安排的。”

“啊！那份电报哇，发了，早发了！”刘文辉随口说道。

此时，蒋介石坐在一旁一声不吭。一听刘文辉问“啥子电报？”他的脸皮立刻拉紧了。待听刘文辉说“早发了。”神色才安然下来。

刘文辉说完，又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两张纸样的东西，说：“这是回电，请岳军兄过目。”说完递给了张群。

回电两份，一份是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璋来的：“全军按令行动，力争

五日内结集雅安。”另一份是西康省代席张为炯来的：“已转令各部落首领民族武装、民军首批于近期开拔。”

张群把两份电报审视了好一阵，然后双手恭敬的捧给了蒋介石。

当蒋介石盯着电报看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急匆匆地进了小餐厅，走到蒋介石跟前，向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闻罢，霍地抬起头，盯着刘文辉，说道：“要他进来。”

陈希曾转身朝门外一挥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步而入。

刘文辉的头“嗡”的一声，似感大难临头。

“完了！起义行动一定被察觉了。发往北京和部队准备起义的电报一定是被保密局破译了。”此时，忽听蒋介石问：

“电文你真的发了？”

“上午发的。”刘文辉微微颤抖着，“咋的，出了啥问题？”

“刘主席”，毛人凤一声冷笑，“中央监控台早就在成都。密译处怎会译不出你们的电文？”

听毛人凤这样一说，刘文辉悬起的心落了地，镇定了一下情绪，说道：“我们上下午的发收电报，你该听到了吧？”

毛人凤点点头。

“你是不懂我们的密码嗦？这又有啥子！”刘文辉一边说，一边从衣袋掏出做成派克笔似的密电码，放在桌上说：“因为事关重大，而今成都又险象丛生，为安全计，我们收发电报都是用自己编排的密电码。”

毛人凤仍不依不饶：“中央监视台有的是电讯专家，全世界的密码都能破译，可是就你们二十四军的译不出来！不知刘主席可否将你们发收的密码原件交出来，让鄙人也开开眼界？”

蒋介石一声不吭，倾听着二人的一问一答，但脸色缓和了许多。

张群的心情也随之释然，因为他曾向蒋介石担保，说刘文辉绝不会叛变。蒋介石一直下不了处置刘的决心，与张群的担保有关。张群平常对毛人凤极受蒋之宠就看不惯，便讥讽道：

“毛局长神经过敏了。来者都是客，毛局长，你坐下说，站客不好打整。”

刘文辉得理不饶人，乘势说道：“毛局长，你不要疑神疑鬼，欺人太甚！”然后委屈地看着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如果看我刘自乾不放心、不顺眼，干脆抓起来算了。等你们弄清楚后再把我从牢中放出来。免得我在战场上是共产党打杀的对象，在党内又是保密局防患的对象，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蒋介石遂向和事佬张群递眼色。

“毛局长不必胡乱猜疑，刚才刘主席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张群大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正是精诚团结之际，西康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又复杂，伤了自己人的心就不好了！你说是不是，毛局长？”

毛人凤无言以对。

蒋介石清楚，在毛人凤未抓到铁证以前，争下去没结果。于是微笑道：“误会，误会。都是自家人，彼此不必介意！自乾、晋康勿多心。来，吃菜、吃菜！”一边说着，一边给刘、邓两人挟菜。

在刘文辉、邓锡侯赴宴的当天夜里，按照预先的约定，当晚，潘文华先从成都去彭县九十五军防地。

但正在他等待夜深后行动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登门造访。

蒋介石派陈希曾，给潘文华送来了要他明日去台湾的飞机票。

陈对潘文华说道：“明天早晨8点整，我来送你去凤凰飞机场，然后直飞台湾。”

“这、这……”潘文华又气又急，结结巴巴地问，“咋个这么突然？”

“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概不知道。”陈希曾说完径直朝门外走，在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撂下一句：

“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呆在屋里安全！”

“这可咋办？”陈希曾的话也证明了他的卫士长伍丁下午的报告，说潘公馆在的巷子里，前后都有一些可疑的人。

潘文华毕竟是身经百战，很快便镇定下来。他思虑很久，想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并立刻把卫士长伍丁叫到了卧室。

伍丁原是岳池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被抓壮丁抓到了潘文华的部队。一个偶然的机，潘发现了这个勇敢机警服从命令的小伙子。潘先调伍丁作卫兵，然后慢慢栽培，现在伍丁已是他的贴身少校副官兼卫队长，也是一个得力助手。伍丁双枪极准，还有一身硬功夫。抗战时，伍丁救过潘的命。潘非常器重这位结实、身手矫健、眼睛明亮的青年军官。前年潘特意将颇有几分姿色的丫环翠秀收为干女，再由太太作媒，让伍丁与翠秀成了亲。出身贫苦的伍丁对潘是感激涕零，经常说，“潘主任，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为了报你的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辈子报不了你的恩，下辈子变牛作马也是要报的。”

潘文华把伍丁叫过来后，一五一十讲了实情。伍丁愿以性命换取潘对他的知遇之恩，欣然从命。

伍丁迅速换上潘文华的衣服，驾驶着潘文华的“福特”牌小轿车，在潘公馆的两扇黑漆大门打开以后，冲出小巷，加大油门，向着成都西南，风驰电掣而去。

潘文华的轿车开出来之后，门外巷子里的特务拦阻无效，立即向毛人凤报告。

毛人凤命令：“总裁命令，追到郊外，鸣枪告警。若潘文华不停车，可以开枪射击。务必生获其人、死见其尸。”

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立即架起摩托，向西追击潘文华的专车。

在特务们向成都西面急追潘文华专车的时候，潘文华在卫士们的簇拥下，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出了小巷，转身向东，扬长而去。

次日晨，在成都至灌县的公路一侧，停有一辆被枪弹打成蜂窝似地“福特”牌轿车。车内有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少校军官。

同一时刻，潘文华安全抵达由邓锡侯九十五军控制的灌县城。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12月6日，即潘文华出走的次日，白天还算安静，到了晚上，张群突然闯进刘文辉的公馆，直奔内室。

张群告诉刘文辉，他衔蒋之命，明天要去昆明，察看云南卢汉方面的动静。他也向刘透露了心中的些许不安，生怕一去难返。张群是有名的孝子，特意来嘱托刘替他照顾居住在成都的80岁的老母。刘文辉慷慨应允。

张群离开刘公馆前，刘文辉突然心生一计，向张提出是否可以借用张的轿车一用。张问用车去向何处，刘笑而未答。因张对刘有所求，也不好拒绝。

送走了张群之后，刘文辉又给邓锡侯打了电话，让邓赴刘公馆一叙。邓

锡侯即赴刘公馆，当晚宿在刘的会客房。

次日晨6时许，张群的副官和司机驾着张的专用汽车开到刘公馆。

刘文辉用自己的司机换下了张群的司机，并给了副官和司机每人一个红包。

不多时，刘文辉、邓锡侯、张群的副官以及刘文辉的副官杨德华和司机等人，钻入了张群的豪华车。

在快开出小巷时，被两个挎着盒子炮的特务拦住。刚才来刘公馆时就被阻拦一次，此时，张群的副官很是恼火，他把挡风玻璃向下摇了几下，伸出脑袋喝道：“张长官你们都不放心是不是？查过来查过去的。”

小特务被吓唬住了。张群是何等人！毛人凤都怕他三分，他们还敢滋事。后面的特务头子见是张群的副官，坐的又确实是张院长的车，便连连赔不是：“对不起，例行公事。”说着扬了扬手，示意放行。

汽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扬长而去。

当日，即12月7日上午7时，刘文辉一行安全到达彭县隆兴寺。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隆兴寺发表通电，宣布起义，电文是：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介石盗窃国柄20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金王横行，貽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估恶不俊，唯利是图。在土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邓政委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垂垂。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刘、邓、潘很快收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复电：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

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欣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本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 德

刘、邓、潘宣布起义后，紧接着又有20几起四川军队来电响应；刘、邓、潘所辖政府也纷纷来电拥护，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甚至跟蒋介石很紧的杨森和董长安，也派代表去隆兴寺，进行过试探性接触。

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当日，曾经力劝李宗仁、刘文辉活捉蒋介石的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

11日，早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槐，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21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与此前后，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

刘文辉出走的当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的盛文（胡宗南的亲信），奉蒋介石之命袭击刘公馆。用15辆大卡车载了两个连的兵力，在盛文部二五四师师长陈岗陵指挥下，将刘公馆秘密包围。

当盛部向公馆内冲时，遭到院内猛烈火力的抵抗，原来是刘公馆内警卫排的人员，在省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的带领下，自觉保护刘公馆的。

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

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倒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

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令人眼花缭乱。

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

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

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

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

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推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揍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件，皆葬身火海。

十五、最后之战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

“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

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

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

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

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

“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

“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

“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死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

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祠，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六个团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

“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

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

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了。”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第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兵团发出重要指示：

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

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

“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

“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第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

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

第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

“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

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司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

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

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

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

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

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

“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午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

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

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

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

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碛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

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顽强奋战。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

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我军指战员讥讽说：“胡宗南真会办事，到处给咱们摆下路标。”

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杨勇五兵团十六军一部向猬集于西菜场东北地区之敌第一、二、三、二十七军等残部发起攻击，俘敌5000余人。我十六军另一部在松镇地区歼敌一部，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以下1000余人。

我十八军的勇士们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义坝、高家场一线歼敌千余人。

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

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往西昌地区。

12月30日，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贺龙将军坐在敞篷吉普车里，率部进入成都，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时，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奔逃。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7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故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来有人告知胡飞到了三亚，蒋大为恼火。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了海南，看到败军之将胡宗南，动了恻隐之心，便给蒋回电从中说和，建议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回台给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王副司令、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问，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胡宗南不敢怠慢，12月28日飞赴西昌。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

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碧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于成都之战前在西昌地区作了一些准备。

1949年10月中旬，胡宗南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其第一师朱光祖团空运西昌经营该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五百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1938年至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半山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即12月29日，在台湾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与他一同逃来的胡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繁等，进行紧急磋商。

他们琢磨了好一阵子后认为，（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甲）在西昌归胡宗南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不到2000人；（乙）蒋介石的亲信西昌警备区司令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2000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由川南逃往西昌的刘孟濂二十七军残部有1000多人，但还没有到达西昌。凭这么一点儿兵力，怎能面守西昌三个月？（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在云南以西的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泸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是先例。

胡宗南来到西昌的第四天是1950年的元旦。本是穷途末路的胡宗南，让李犹龙为他赶拟稿子，要在元旦这天，在西昌和台湾的报纸上发表讲话。他给李犹龙交代，讲话内容要包含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据说胡的这番用意，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受蒋介石逼迫所致。胡不仅要发表元旦讲话，而且还要进行阅兵典礼。

1950年元旦上午九时，阅兵典礼正式开始，胡宗南站在邛海新村门口的

阅兵台上，看着千多人马，不觉悲从心中来：这哪象阅兵典礼，本来肚里有一大堆话要给“弟兄”们鼓鼓劲，看到这个样子训话取消了。

西昌寥寥残兵败将，怎禁得解放军一击，此处的国民党军政大小头脑，没有一个不盼着早些离开这个地方。但胡宗南有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军令压身，想逃也没那个胆，蒋介石再不会给他为党国“戴罪立功”的第二个机会了。胡宗南先让他的副参谋长沈策，赶紧弄出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来。

沈策无策，万般无奈，和胡的那帮军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搞出来个东西，名称是“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大陆方案”。分上、中、下三策，其主要内容是：

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权有的反共力量，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毫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灭；(2)凡撤到西昌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运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绅士，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4)愿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

(一)目的：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但性淳朴，易于驱使和对共灌输反共思想；(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容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干部；(10)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建立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番、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以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15)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

(一)目的：以正国内国际视听。

(下略)

当沈策一伙把这个“三策”方案拟好后，送交胡宗南审阅。胡见方案把“放弃西昌，撤退台湾”为上策，便勃然大怒，指着沈策大骂：

“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是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会枪毙你！以后再也不准提撤退台湾的话！”

胡宗南让沈策制订的作战方案也就一扔了之。与此同时，胡宗南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一是整顿残部，将其嫡部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令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二是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三是重举“西康省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但不久，李弥、余程万部被歼，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过划破产，唯一希望是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妄图指挥西南区的特务土匪武装，借助外国支援，实现其反攻复辟的梦想。

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一部兵力，以南北合击进行西昌战役。北线以第六十二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石棉、冕宁南下，进逼西昌；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路进军，以右路第十五军一部由曲靖经会理、巧家北上，左路以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经盐源、盐边北上。同时，以第六十二军另一部由雅安经天全西进，进军康定、泸定等地区。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于3月12日由云南曲靖地区开进，19日进抵金沙江南岸的战役集结地隆街、巧家地区。21日，分由隆街、巧家渡过金沙江，歼敌江岸守敌二十七军一部。23日，我一三团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马越山、马头山，钻进茂密的森林，突然抢占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乘势突入会理城内，解放会理，歼苏少章师部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同日，我一三一团翻越60里的黄土岭。山陡路滑，战士们互相拉着皮带向下滑，大风将行军锅及背包吹跑，并有两个战士被吹到崖下。部队仍然奋勇前进，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下，战胜了一切困难，抢占了宁南县城。28日上午，我又在会理城郊伏击，歼灭了从巧家撤退下来的敌军一个团。同时，我一三二团等部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在风山歼敌第七十六师一个团的大部。29日我一三一团由宁南前进，抵达西昌以东的七里坝。

六十二军一部于3月12日由温江地区分路开进，经夹江、峨眉，23日克富林、汉源，歼王伯华残部一部，继而渡大渡河，抢占大树堡，跟踪追击南窜之王伯华残部，直指越西、冕宁地区。此时，西昌之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各自逃命。当我主力抵进距西昌30里的时候，胡宗南、贺国光等乘两架飞机向海南岛的海口逃窜，西昌城内一片混乱。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率逃到西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及眷属等约千余人，于当日夜逃走，企图经木里逃到西藏，再逃向国外。

27日晨，十五军一三二团抢占西昌飞机场，歼灭机场守军，缴获飞机三

架，进占西昌城。六十二军一部亦接连解放越西、冕宁，向南疾进。罗列见逃木里道路截断，乃改变主意，向越西、昭觉之间的小相岭、甘相营一带逃跑，企图窜向川南山区开展游击活动。30日至4月5日，南北两路解放军在小相岭、甘相营一带相继截住罗列残部和先期逃跑的唐式遵一伙及由汉源南逃的胡长春残部等数千人，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敌大部被歼，只有少数逃散。

我十四军和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于3月20日分两路自禄丰、宾川出动。北渡金沙江，至4月1日，相继解放盐边、盐源。此时，顾葆裕、张桐森乘隙率残部南渡金沙江，企图向滇西逃窜。解放军遣轻装分队跟踪追击，穷追八昼夜，终于在盐丰（今属大姚）西北将其包围全歼，俘顾葆裕等。

胡宗南、贺国光逃跑后，割据各地的地方势力邓德亮、孙方、诸葛绍武等，因失去支柱，相继投降。我六十二军另一部于3月17日由雅安西进，至24日，相继解放泸定、康定，田中玉残部大部被歼，少数逃散。

西昌战役从3月12日至4月7日，历时25天，胜利结束。解放县城19座。毙伤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游击第二路司令唐式遵、第五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等以下2600余名；俘敌汉源行署主任兼十一军军长单仁安、一二四军军长顾介侯、参谋长陈光文、师长高惠民、独一师师长朱光祖、三三五师师长王伯华、胡匪长官公署少将特派员、少将政治部主任等以下5100余人；投诚2500余人；共歼敌1029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门，各种枪3840余支，战马340匹，汽车11辆，飞机3架。

至此，西康金沙江以东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十六、尾 声

第二野战军结束西昌战役后，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基本完成。至此，川、滇、黔、康四省基本解放。但此时的西藏当局顽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竭力阻止我军进入西藏。第二野战军在完成准备工作后，1950年10月6日，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一部的配合下，在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统率下，率领所辖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政治委员刘振国）、第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政治委员王其梅）、第五十四师（师长魏洪亮、政治委员罗野岗）三个师，受领解放西藏巩固祖国西陲国防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开始向西藏进军。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我军根据协议规定，以第十八军和西北军区骑兵部队于8、9月间分路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指战员们攀登过十余座雪山，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每到一地，不住民房，不借用具，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至11月，先后到达噶大克、察隅、拉萨、日喀则等地，胜利完成了进驻西藏的任务。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第二野战军基本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任务。

从实际的野战军建制情况来看，在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机构就撤销了。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等八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兵团和野战军两级机构随之撤销。

第二野战军和兵团机构撤销之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十军。1950年2月，第十军全部到达川南，以该军机构为基础，组建川南军区，下辖内江、宜宾、乐山、泸县等四个军分区及自贡警备司令部。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员，李大章、彭涛、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师兼宜宾军分区，第二十九师兼内江军分区，第三十师兼乐山军分区。川南军区组建后，即进行剿匪和政权建设。1951年2月，第十军与川南军区分开建制，同时第二十九师调归第十五军建制，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四师调归第十军建制。1952年4月25日，第十军军部和第三十师调归海军，第二十八师调归第二十三兵团，第一八四师调归装甲兵和华北军区，该军番号撤销。

第十一军。1950年1月，第十一军归川东军区领导，军部进驻万县。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曾绍山，副政治委员阎红彦，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第三十一师为军区机动部队，进驻梁山（今梁平县），执行剿匪、筑路、改造起义部队任务。第三十二师兼大竹军分区。司令员何正文，政治委员高治国，政治部主任田维新。第三十

三师兼万县军分区。第十一军补训师兼西阳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政治委员梁歧山，副政治委员唐兴盛，参谋长赵梁才。在此期间，第十一军奉命调3000名战士和各种武器万余支、骡马800匹，支援第十八军进军西藏。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调山东青岛组建海军青岛基地（现北海舰队）。

1951年1月，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分由大竹、万县地区开赴河北廊坊地区集结，奉命重新组建第十一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张廷发任副军长，王汝昭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一八二（原属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全军共3.88万人。1952年10月，新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奉命调浙江杭州组建空五军。除第一八二师改铁道兵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均于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分别调归第十六军、第二十六军建制。

第十二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二军主要担负大西南的剿匪任务，至1950年11月，基本肃清大西南匪患。1951年1月，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第十二军原辖第三十师（欠第一六团）及第三师第一二团脱离本军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十二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4月17日，参加第五次战役。11月，参加金城防御作战。1952年11月底，作为作战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经艰苦奋斗，恢复和巩固了阵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入朝作战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4年4月，第十二军从朝鲜回国。

第十三军。1950年1月前后，第十三军抽调干部、战士1700余人、骡马1000余匹，组成辎重团，调归第十八军，支援进军西藏。尔后，第十三军在云南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3月，第十三军兼滇南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1950年6月，第十三军警卫团调第十五军，并另抽调干部、战士1万余人组成补训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4年5月随第十五军回国。

第十四军。195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第十四军兼云南军区所属滇西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

第十五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五军继续在川、滇、黔、康边境地区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12月，该军第四十三师奉命留驻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第十军第二十九师编入第十五军序列。1951年3月，第十五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瞻。在入朝作战期间，第十五军战功显赫，先后有1.3万多人立战功。特等功臣黄继光、邱少云就出现在这支英雄的部队。第仁五军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军于1954年5月奉命回国。

第十六军。1950年1月前后，该军除第四十八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外，其余部队回师贵州，参加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军部兼遵义军分区，第四十六师兼铜仁军分区，第四十七师兼毕节军分区。1951年2月，第十六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7月7日，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9月，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归第十六

军建制。第四十七师入朝作战，于1952年3月归建。11月，第一八六师改为国土防空部队。同时，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改为第四十八师调归第十六军建制。1953年1月，第十六军入朝作战，至1958年4月撤军回国。

第十七军。1950年3月，该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军部奉命兼贵州军区安顺军分区，第四十九师兼兴仁军分区，第五十师兼镇远军分区，第五十一师兼独山军分区。1952年3月17日，第十七军番号取消。

第十八军。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藏军区，以第十八军进藏领导机构组成军区机关，归西南军区领导，驻拉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昌炳桂，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师、昌都警备区、日喀则警备区、黑河警备区、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及骑兵第一团、工兵第五、第八团、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独立支队、班禅警卫营、第九代本等。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3月17日，第十八军改为西藏军区，原番号即行撤销。

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任，参谋长薛克忠。下辖第五十五师（傅光辉任师长，张明任师政治委员）、第五十七师（张复振任师长，张文彬任师政治委员）。该军建制归第二野战军前曾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50年初，该军转入执行剿匪反霸、建设地方武装等项任务，至1950年6月底，基本肃清所辖陕南地区的匪患。1950年底，陕南军区撤销，第十九军移防西安兼陕西军区。刘金轩兼任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任政治委员。1952年7月，第十九军军部改编为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第十九军及其所属番号撤销。

附 录

第二野战军序例

1949年2月5日，由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2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前委。

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

委员 刘伯承邓小平 张际春陈赓李达

书记邓小平

第二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 张际春

参谋长 李达

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兼）

司令部

作战处处长 姚继明

军政处处长 余非

情报处处长 柴军武

新闻处处长 李永悌

通信处处长 张有年

机要处处长 林桂森

军械处处长 黄以仁

组织部部长 陈鹤桥

宣传部部长 陈斐琴

保卫部部长 卜盛光

民运部部长 李庭桂

联络部部长 杨松青

俘管处处长 袁血卒

编辑出版处处长 胡痴

新华社分社社长 王敏昭

直属政治处主任 唐济盘

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员 段君毅

政治委员 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 刘岱峰 姚继鸣

副政治委员 穰明德

参谋长 姚继鸣（兼）

政治部主任 邓存伦 卢南樵（后）

供给部部长 刘岱峰（兼）李泛山（后）

政治委员 谭映月

卫生部部长 齐仲桓 钱信忠（后）

政治委员 马琮璜

兵站部部长 李静宜

政治委员 萧鹏
运输部部长 郝炬
政治委员 杨杰
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卜盛光第三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 陈锡联
政治委员 谢富治
副司令员 王近山 杜义德
政治部主任 阎红彦
副参谋长 王蕴瑞
政治部副主任 钟汉华
后勤部部长 刘清 胥光义（后）
第十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 杜义德（兼）
政治委员 王维纲
副军长 范朝利
参谋长 高厚良
政治部主任 许梦侠
供给部部长 陈三纪
卫生部部长 孙毅华
第二十八师（由原第四旅改称）
师长 陈中民 张奇（后）
政治委员 姚克佑
第二十九师（由原第六旅改称）
师长 周发田
政治委员 于笑虹
第三十师（由皖北独立师改称）
师长 马忠全
政治委员 鲁大东
第十一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军长 曾绍山
政治委员 鲍先志
副军长 郑国仲
参谋长 杨国宇
政治部主任 刘华清 胥治中
后勤部部长 王子清
第三十一师（由原第七旅改称）
师长 赵兰田
政治委员 周维
第三十二师（由原第八旅改称）
师长 何正文
政治委员 卢南樵
第三十三师（由原第九旅改称）
师长 童国贵
政治委员 高治国
第十二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 长 王近山
政治委员 王近山（兼）
副军长 萧永银
副政治委员 李震
参谋长 萧永银（兼）
政治部主任 李开湘
后勤部部长 王耀显

第三十四师（由原第十六旅改称）
师 长 尤太忠
政治委员 邵子言唐平铸（后）

第三十五师（由原第十七旅改称）师 长李德生
政治委员李如海

第三十六师（由原第十八旅改称）
师 长邢荣杰
政治委员刘昌

第四兵团（1949年2月由陈质兵团改称）
司令员陈赓
政治委员陈赓（兼）
副司令员郭天民
副政治委员刘志坚
参谋长郭天民（兼）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兼）
副主任胡荣贵
后勤部部长赵炳润
政治委员杨世荣

第十三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第十三旅与豫西军区部队组成）
军 长周希汉
政治委员刘有光
副军长陈康
副政治委员廖冠贤
政治部主任 廖冠贤（兼）
后勤部部长 任学恭

第三十七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 长 周学义
政治委员 雷起云第三十八师（由原第十三旅改称）
师 长徐其孝
政治委员南静之张丕绪（后）

第三十九师（由豫西军区部队组建）
师 长黎锡福
政治委员侯德才

第十四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旅与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
军 长李成芳

政治委员雷荣天
副军长王启明
参谋长王启明（兼）
政治部主任朱佩瑄
供给部部长党元成
卫生部部长刘辉儒

第四十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 长刘丰
政治委员侯良辅

第四十一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 长 查玉升
政治委员丁荣昌陈明（后）

第四十二师（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廖运周师和第十一旅一部改编成立）
师 长廖运周
政治委员张子明

第十五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
军 长 秦基伟
政治委员谷景生
副军长刘昌毅
参谋长张蕴钰（后）
政治部主任余洪远
副参谋长张蕴钰
后勤部副长胡孝武

第四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五旅改称）
师 长张显扬
政治委员薛涛

第四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六旅改称）
师 长向守志
政治委员向守志（兼）

第四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七旅改称）
师 长崔建功
第五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杨勇
政治委员苏振华
副政治委员 张霖之
参谋长潘焱
政治部主任甘渭汉
代理主任王幼平
副主任石新安
后勤部部长 吴机章

第十六军（由原第一纵队与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军 长 尹先炳
政治委员 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

参谋长杨俊生
政治部主任吴买
后勤部部长尹痴生
第四十六师（由原第一旅改称）
师 长齐钉根
政治委员范阳春
第四十七师（由原第二旅改称）
师 长李觉郑统一（后）
政治委员郭强
第四十八师（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称）
师 长郑统一
代理师长王晓（1949年8月）
政治委员李一非
姜思毅（后，1949年8月）
第十七军（由原第十一纵队与冀鲁豫部队组成）
军 长王秉璋赵健民（后，兼）政治委员赵健民
副政治委员萧元礼
参谋长刘星
政治部主任裴志耕
后勤部部长王耀华
第四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 长汪家道
政治委员况玉纯
第五十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 长胡华居政治委员卿正兴
第五十一师（由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独立支队组成）
师 长闵学胜
政治委员崔子明
第十八军（由原第一纵队第二十旅与豫皖苏军区队
队组成）
军 长张国华
政治委员谭冠三
副军长昌炳桂
副政治委员 王幼平王其梅
参谋长陈明义
政治部主任郭影秋
后勤部部长夏仲远
第五十二师（由原第二十旅改称）
师 长吴忠
政治委员刘振国
第五十三师（由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师 长 金绍山
政治委员 王其梅

第五十四师（由原豫皖苏军区各军分区主力团
组成）

师 长 魏洪亮

政治委员 罗野岗

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李达

政治委员李达（兼）

副司令员孔从洲

副政治委员谭善和

参谋长赵章成巫金峰（后）

政治部主任张力雄

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1月15日，由中原军政大学改
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校 长刘伯承（兼）

政治委员刘伯承（兼）

副 校 长潘梓年

教 育 长徐立行

政治部副主任 刘华清

校务部部长 武承先

第五十八军（1949年2月由原桐柏军区部队组成，5月
军部及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划归河
南军区；第一七二师改为湖北军区独
立师）

军 长 高树勋 孔庆德（后）

政治委员 方正平

副军长 杨秀昆

副政治委员 张力之

参谋长 张西三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兼）

第一七二师

师 长 杨树根

政治委员李福尧

第一七三师

师 长李定的

政治委员吴罡

第一七四师

师 长何济林

